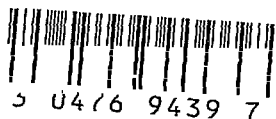


新集

第三卷 第一期 附錄大冊

与



078
602



別冊大附錄目次

- 1 一九三二年的國際政治鳥瞰……彭芳艸
- 2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政治……王禮錫
- 3 一九三二年的世界經濟……方天白
- 4 一九三二年蘇聯經濟的發展……汪洪法
- 5 一九三二年之中國經濟……澄宇
- 6 一九三二年中國農村經濟……伍忠道
- 7 一年來中國文藝論戰之總清算……王集叢
- 8 一九三二年之國內音樂界……張世傑
- 9 編後……編者

08586

一九三二年的國際政治鳥瞰

彭芳艸

1. 法西運動之急進與弱小民族反帝革命之衰落
2. 帝國主義的挑釁與蘇聯的應付
3. 帝國主義間的衝突白熱化及新世界戰爭危機之成熟

一九三二年頻於完結了；在這一年中，使資本主義國家焦頭爛額的經濟恐慌，不但未見恢復，簡直連恢復的朕兆都沒有。雖然牠們也曾使用這樣那樣的政策，舉行過各式各樣的國際會議，或者締結種種的協定，結果適得其反，竟促成危機之無限量的增長。這完全由於資本主義的本身矛盾所

致。然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的蘇俄經濟却在成功的途上更進一步；對於垂死的資本主義，實是一種大的威脅。這兩種經濟形態同時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在世界形勢上所發生的變化，可以下列事實說明：

一 法西運動之急進與弱小民族 反帝革命之衰落

世界經濟危機釀成之衰落，國際資本主義之經濟的連繫之破壞，以及為市場鬭爭之激化，必然地使無產階級日益左傾，農民發生暴動，革命的激潮席捲了世界各國；間接地形成布爾喬亞之獨裁，法西運動之國際化及發揚，以及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Chauvinism)之廣播。而這三者合流的結果，不但加強資本主義世界對蘇俄的挑釁和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尤加強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壓迫。弱小民族的反帝革命在這種形勢之下，便有些萎縮了。

自從墨索連尼進軍羅馬以來，法西斯帝運動本已日漸世界化，尤其歐洲方面。經濟危機之深化，更加強了他們的活躍。德國之國權黨國社黨，奧大利之護國團，匈牙利之農

民黨，波蘭之防衛團，北歐拉坡黨，法國之愛國青年黨，英國之藍衫黨，風起雲湧；而美國之三K黨，觀其戰後的革新綱領，也係十足之法西斯蒂；至於日本之類此團體更多，如國本社生產黨等等，不下七十餘個。在一九三二年中，活躍最烈而影響於國際關係最大者，是日德兩國，兩國的法西斯蒂，現出東西兩半球互相輝之觀。德國的國社黨在議會中已佔多數，勢力發展得希特勒想着非握國家大權不可，雖然施來澈佔了先，但施來澈却是十足的封建的法西主義者。日本的政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已完全落於封建法西之手；團隊磨犬養等之被血盟團所刺，實由於軍閥的鼓動與援助；現時的內閣雖名為超然的，不過是一個幌子，一般封建法西的軍閥隱握大權。德日的情形有一極類似之點，社會法西與封建法西無時無刻不在鬥爭，握大權的却是後者。不管社會法西也好，或封建法西也好，他們的任務，只在增加資產階級之獨裁，壓迫無階級運動，尤在廣傳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而作第二次世界大分割，鎮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叛變。唯其如此，德國才堅決要求軍備平等，法國才呼號邊境安全，英國才有帝國單位的理論，日本才有汎亞細亞主義，意國

才有入口過剩的不平；諸如此類莫不表現出帝國主義之分割世界的要求，與夫牢守其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決心了。在帝國主義正在努力進取的時候，弱小民族的反帝革命，必然受到大摧殘，安南緬甸革命機關相繼被破，印度的甘地久繫監獄，美軍之干涉尼加拉瓜的總統選舉等，於是可以看見拉丁美洲的今年情狀不似去年之混亂，東方殖民地沒有去年的勇武戰爭，帝國主義的武力鎮壓不能不算是一大功。

自然，遠東的或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革命之銷沉者，不全是由於帝國主義之武力鎮壓，尙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我們要明白這個原因，應該曉得(1)經濟危機不止是使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運動猛進，尤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運動發揚，而且因為農業危機之深化的結果，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民益左傾，幾有與無產階級運動合流之勢；所以在這些比較落後的區域，今年比去年更常有暴動發生。(2)這種無產階級與農民左傾合流的暴動或革命，不但危害了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且摧毀了該地之民族資產階級之政治權力；我們統看歷來各方的民族反帝革命，其領導者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工農大眾的混合體

常常是前兩者担任了主要的任務；這些純粹民族革命者，懼於工農大眾革命之威，又懼其政權之被奪，就寧可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爲了本身之利益而法西主義化，（如中國）甘作帝國主義之走狗。在這種分裂的形勢之下，民族反帝革命就不容易爆發；即使爆發，也就容易被帝國主義鎮壓下去。這無須乎解說，落後區域的法西主義化，不是獨立的出路，而是死路，因爲這樣就是替帝國主義當了壓迫反帝革命的工具，雖然落後區域的資產階級能維持其政權於一時，却不會長久的。一九三二年，這些落後區域的資產階級逐漸法西化而投降了帝國主義。

二 帝國主義的挑釁與蘇聯的應付

因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繼續深化，以及因經濟危機而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大眾的經濟鬥爭轉趨於強烈的政治鬥爭形勢，於是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衝突無疑地就達到了更白熱的狀態。普遍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法西斯蒂運動，已經表現出各資本主義國家之仇恨，而特別在牠們的國際行動上，尤其顯得牠們的陰謀與挑釁。蘇

俄的應付方法，仍然不外：(1)竭力使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農大眾經濟鬥爭轉代為政治鬥爭，(2)利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施裨闔手段。

上海戰爭固然是日帝國主義為穩固滿洲的侵奪而意在以上海的侵佔作為中國對滿洲的放棄之交還條件，不過在戰爭的終結時，其中却深含有反蘇聯的意味。如以前所說，日帝國主義之敢於侵犯上海，至少是得到英帝國主義之默許。但英帝國主義只能允許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上海適可而止，不會允許牠多進一步。藍浦生熱心努力調解上海戰爭，其目的是化帝國主義的戰爭，為反蘇聯的戰爭，使日軍得以回師北上，中國得以指揮剿赤；因為那個時候，不但東北義勇軍聲勢浩大，而且中部的所謂共匪正萬分活躍。所以在上海戰爭之後，因馬占山失敗，日軍竟遠達蘇聯邊境，實行挑釁；同時，中國中部軍事急足發展；這對於蘇聯，不能不說是一種大的打擊。

在英國純粹工黨內閣時代，英國的對外方略，是聯美抑制日法而與蘇俄修好；然而自從名為聯立的實為保守黨作中心的內閣成立，其對外方略於是趨向絕對相反的方略。上

海戰爭中之英國的反蘇俄行動正表示出英國之扶助日帝國主義者，除反美外，尤在使日本在遠東作防赤的重鎮。其在歐洲大陸上，英國之與法國結合，與聯日含有同樣的目的。丹腦河經濟會議，假使沒有凡塞爾系統的內部衝突而能成立，那當然是攻擊蘇俄的最好西境前線了，因為沿蘇俄西境的在英法控制之諸國，自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尤其在去年的農民暴動迭見，顯有崩潰之勢，在英法看來，救濟這些國家正等防止赤化之漫延擴大，也正等於加強反蘇俄力量。

英法合作之含有反蘇聯的意味，不止表現於丹腦河經濟會議，尤其表現於軍縮會議與洛桑協定中。丹腦河經濟會議以前開幕的軍縮會議席上，法國所提國際軍案，實質上是加強牠所主持的強盜機關之力量，目的完全在反美反蘇俄；美與蘇俄並不是國聯會員國家，何況更不是國聯操縱把持者，若將全世界之殺人最精最利的武力，集中非和平機關的國聯，無異於全世界都要居於國聯宰割之下，連美與蘇俄也在內，這自然不能使他們的贊同；表示好感者唯有英國，不但因為牠在國聯中與法國站在同等的地位，而且不惜鼓吹援助法國安全主張者，間接在利用國際軍案，達到反美反

蘇俄的目的(自然,英法在軍縮上也有衝突的)。這種形勢必然激起美國與蘇俄的反響,而有使久已斷絕外交關係的美蘇兩國發生復交之可能,所以司丁生之赴歐洲,欲拆散英法聯合而未成功時,美蘇兩國內輿論都一致宣傳美蘇復交。美蘇復交針對英法日聯合的形式,當然是兩國打破僵局的唯一好出路,不管對於蘇俄之制止東西的攻擊戰線,或對於美國之壓迫日帝國主義與拆散英法聯合,都會發生大作用的。雖然蘇俄當時要求甚切,但在胡佛總統之下的美國政府是不容易走這條道路的,並不是爲公,而是爲了私人的仇恨(蘇俄政府沒收其企業全部之仇)。

美蘇復交既然不容易成爲事實,英法聯合却更進了一步,而有洛桑會議的給果。洛桑會議所產生的美國與英法之鬥爭,後面再加分析,至於有關到蘇俄者,就是(1)使德國免除賠款支付之困難,防止之赤化,(2)使反法集團(如意大利等)得以造成一致歐洲戰線以反蘇聯。在紅黑鬥爭線上的德國,日臨於崩潰的深崖。英法帝國主義寧可對德稍行退讓以維持中央黨以至施萊徹之政權,不願希特勒上台,更不願紅色勢力增高,德國紅色勢力正暗示着歐洲的前途。德國還是

反法集團領袖之一，據以往之事實看，牠常與意大利土耳其等以至蘇俄在反對法帝國主義雄霸歐陸進行上或英法平分歐陸霸權進行上相結納，戰債問題正打消這樣結合的好工具，同時，更是滅去蘇俄之反英法的歐洲奧援的好工具，使蘇俄不但被排斥到歐陸以外，且結成一致反蘇聯的戰線。洛桑會議是否真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間一切矛盾消除，當然還有疑問。

英帝國主義在洛桑會議之後，又有還更進一步的反蘇俄的行動，即是渥大瓦會議；聯結帝國為一個整的單位，排斥蘇俄對於英帝國的貿易，無可疑地有所打擊於蘇俄的原料輸出。而且，英國內閣因渥大瓦會議一度分裂，主張自由貿易的閣員辭職，繼之者是保守黨份子，則英政府中的反蘇聯的勢力將愈形增大了，於是英蘇商約之廢棄另訂，就表示出其決心了。

李頓報告書發表，僵局才似乎有了打開之形勢。所謂李頓報告書，無可遮掩地是帝國主義的代表，欲緩和遠東衝突，以中國為犧牲的產物；牠的第一目的是先國際共管滿洲為國際共管中國之起始；第二個目的是以國際共管的滿洲

爲武裝干涉蘇俄的根據地。言詞之間充滿了以蘇俄勢力之南下以恫嚇各帝國主義的口氣，使日本吐出已吞進的滿洲。然而日帝國主義並不想分潤，而想能夠獨佔，所以這報告書發表不久，帝國主義間就起了分潤與獨佔的爭執。日帝國主義爲獨佔滿洲又實行牠的故技，假意地要與蘇俄妥協，而蘇俄也利用日本的狡猾以襲擊醞釀中的帝國主義一致反蘇俄的戰線，久懸未決的漁業糾紛才能解決，日蘇不侵犯條約的謠傳才能盛大。這件事最刺激英保守黨政府之心。

接着蘇俄又遇到了第二個可以利用以襲擊帝國主義一致的戰線機會，就是軍縮會議重開時遇到德國要求軍備平等的困難。法帝國主義口口聲聲地不忘安全保障，她絕不願凡塞爾和約應受破壞；凡塞爾和約若被破壞，凡塞爾系統即瓦解，而法國之歐陸霸權之夢也必然隨之而消失；何況德國軍備一旦恢復，如果復仇之日一至，不難得到反法集團及蘇俄的幫助。英國爲調和德法的衝突費了不少的氣力，因爲牠不願歐洲一致戰線之破滅；美國大選之後，也立刻以戰債問題加強德法衝突，這才逼得法國讓步，一面到得英意等國的允許歐洲不行武力鬥爭的担保，就以原則上的軍備平等權

給予德國了，另一方面又將久懸未行的法蘇不侵犯條約正式簽署了，好斷絕德國之後援。法蘇不侵犯條約雖已簽字，可是同時以反蘇聯為目的的法波軍事同盟條約也延長了。然而這時對蘇俄是有益的，牠因之築成了西境安全堡壘，同時又破壞了歐洲的英法反蘇聯之結合。蘇俄可以用全力去應付遠東的方面；正在這個時候，李頓報告書在國聯討論着，雖以美國催債之力，仍無法使英法讓步，日帝國主義乘機北攻蘇炳文，既可以威脅，又可暗示有武力干涉蘇俄之準備，英法就在國聯席上大為日帝國主義伸張氣焰，中蘇復交於是瓜熟蒂落了。中蘇復交又視為蘇俄對於日本久已企圖武裝干涉的正式答覆，這至少含有美蘇將結合以威脅日帝國主義的意義，日蘇的關係似有重大的發展。在這一九三二年中，帝國主義的一致干涉陰謀時有進行，而因其身所具之衝突過烈，聯合戰線終於未成。在蘇俄西境者有英法之不一致，在東境者，有日美之衝突，蘇俄的外交，多少是成功的。

三 帝國主義戰爭危機成熟

一九三一年的帝國主義間爭鬥的形勢，在倫敦賠款會議

在前，是英美合作援德反法；然而因為法帝國主義對英報復，強迫英帝國放棄金本位，工黨內閣一變而為聯立內閣，而保守黨又在聯立內閣中得勢，於是在國際形勢上起了若干變化。按照以往之例，英保守黨一上台而又放棄金本位，必然一反工黨之親美主義，而甯可對歐洲大陸的法帝國主義讓步，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英帝國主義因為要爭奪世界之霸權，同時，也必然在遠東多少放任日帝國主義，日美正是死對頭。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日帝國主義才敢於爆發滿洲事變，她以為有法國在國聯中的援助，和英國之袖手旁觀，美國是無如之何的。果然在一九三一年為滿洲事變而舉行的國聯會議中，法國之熱烈援助，固然是顯明的事實，英國代表除了幾句憤激之話外，也無什麼積極的主張；憤激之話，不過是警告日帝國主義不要幹得太過火，有害於她的在華權益而已。一九三一年末，英法兩國使節頻頻往返，正暗示英法日趨接近，國際形勢要起大變化了。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發生的上海戰爭中，我們預測的大變化已然顯於表面了。上海戰爭的進行中，激怒得最兇的是美帝國主義。美國內有資產階級指揮的抵制日貨

運動，外太平洋海軍大操的示威；司丁森發表拒絕承認破壞九國公約的宣言（致波拉書）；這一切正表現出美帝國主義方面之劍拔弩張的形勢。然而，美國即使真有作戰的決心，在軍略上或外交上，是不容易操勝算的，就因為英帝國主義站在日帝國主義之後。大戰以後，於遠東方面，英日的衝突極為劇烈，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差不多為日本所奪，尤其是英國的輕工業恨日本最厲；但是，同時，英美為世界霸權的爭鬥也最厲。英國是站在兩途之中，倘若要恢復昔日霸主地位，勢必聯日反美，可以抵制美國對遠東的強襲；上海事變多少含有這種意味。保守黨得勢的英國政府既然決定趨向聯法助日反美的路途，所以駐滬的英軍司令官容忍日軍在公共租界的行動，也允可日軍利用租界作進攻的根據地。這種便利，對於日軍是無價的。日機亂擲炸彈英國半政府機關報泰晤士却認為是日本的自衛行動（讀者試想想假設中國飛機誤擲炸彈於租界，牠會怎樣說法，結果會怎樣）。美海軍集太平洋，保守黨報“就帶着警告的意味說：“列強必然不可對日宣戰！”議會中固然有工黨領袖假意質問上海日軍行動，保守黨大呼“侮辱了友誼的強國”，在這種形式之下，美國東

手無策，日帝國主義的援軍得以繼續向上海輸來，抗日的十九路軍當然被逼得後退。滬戰之如此結束，英帝國主義自然位居首功，駐華英使藍浦生之所以熱心奔走和平者，一方面在援助日帝國主義取得勝利的形式，另一方面在抑制日帝國主義的野心，牠絕不願日帝國主義像對待滿洲似的來對待上海（長江流域是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就是日帝國主義所呼喊的大上海計劃（國際共管），英帝國主義也當然不能贊可。日帝國主義也深知適可而止，不敢過於違反英帝國主義的志願，立刻提兵北入滿洲，從事所謂剿匪計劃了。

上海戰爭爆發之後四天，軍縮會議竟然在遠東砲火中開幕了。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假裝聾瞎而大談其軍縮與世界和平；其實，他們的心中極為雪亮，並且他們甚至於曉得上海戰爭可以導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各為將來地位之優越起見，而提出了利己損人的提案。美國要求限制重砲唐克，限制陸軍防禦人員，和照華府倫敦兩條約減少海軍噸數；英國要求縮小艦型及備砲，而且還主張華府倫敦兩條約到一九三六年終止；日本既主張縮小艦型，還特別要求取消航空母艦或巡洋艦裝飛行甲板；法國竭力爭執軍縮國際化，要以

國聯來控制一切；意德所盼的是軍縮平等；都不相讓，在軍縮會議的第一階段中，竟是現出僵局。各方面的衝突，雖是劇烈，但在劇烈程度比較上，最難以解紛的當是德法的平等迎拒，美日的比例伸縮，至於英法日之間的困難較易解決，並且多多少少的露出了若干合作的痕迹。例如法帝國主義的軍縮國際化案，不但為非國聯份子的美與蘇俄所反對，而且國聯份子的常任理事國意德所反對，日本對於這點並未有什麼激烈表示，而英國輿論公開地援助，英政府的機關報認為那是種聰明的計劃。不過，縱使英法日在軍縮方面有若干默協；這種默協也很薄弱的，我們只能看作攻擊強敵的一種手段。

正在軍縮會議的復活節休假期間，英法更密切地玩了一套把戲，就是丹腦河經濟會議。會議目的，不用說，是英法的合作之下來平分歐洲大陸的市場。關稅的壁壘將歐陸化為無數小地域，東歐的農產受西歐的阻礙，而西歐的商品不容易運銷東歐。而自經濟大恐慌爆發以來，東歐農業國家類於全部破產，羅馬尼亞等國會不斷地發生農民暴動。英法於是就決意利用東南的經濟形勢，打算以優惠關稅的方法統

一歐陸的市場，設立國際放款銀行而作財政的統治，並使東歐爲反蘇俄的屏障與歐洲聯邦之初步的基礎。按地文地理說丹腦河流域應包括德奧匈捷南羅保等國，然而照英法的意見，則限定於奧匈羅捷南五國，這充分表現出英法私心所在，自然不爲德意所樂於接受了。德意堅決要求應受與以上五國的同等待遇，而意國且要求加入保加利亞。因爲這種鬥爭之無法妥協，使丹腦河會議僅僅開幕幾天就擱淺了。在這方面所表現的國際形勢，是英帝國主義對於法國雄霸歐陸的政策是很爲援助，而她自己爲爭世界霸權，法國也必然予以助力。然而美帝國主義對此激怒得最兇，因爲牠以爲假使丹腦河會議成功，英德密切合作，一方面，搖墜了的美國在歐的勢力，無論在軍縮問題，戰債問題，美國受到大的打擊；另一方面，英法的合作再更進而爲英法日的合作，則美國所受的打擊更兇。因有以上種種的原因，正在丹腦河會議破裂之時，司丁森親自由美赴歐，想挽回這種頹勢，但是因爲麥唐納與泰狄歐之迴避，竟然毫無結果，雖然吉伯生在軍縮會議審查提案時放了空砲，而會議以外又有美蘇復交的聲浪，仍然不能引英法的驚懼，司丁森只好無顏地返回本國了。自

此以後的軍縮會完全在小組審查提案期間，各組提案報告固已次第作成，但附了許多保留，實際上還是一塌糊塗。

在這個時候，英法又有向美突擊的舉動，法國為壓迫美國放棄金本位，而大批地提出美國存金；又舉行洛桑賠款會議，強迫美國對戰債問題讓步，打破美國以戰債為軍縮條件的方法。歐洲對美洲的形勢固已緊張，而遠東的形勢對美尤甚緊壓；日帝國主義以全力逼退馬占山的抗日軍隊，日議院並議決承認滿洲國。美國曾為打開僵局起見，表示戰債之縮減或取消必以軍縮為條件，以為牽制洛桑會議而挑撥英法日間的聯合之方法。但這方法依然未見大效，因為洛桑會議雖經過極大的艱難，終能在取銷賠款不付戰債之形式下而成立妥協。在這妥協中有所謂紳士協定者，即為歐洲對美一致之基礎，不獨日帝國主義活躍地在暗中贊助，而德國為解除賠款的担負，也不惜與英法站在一致的線上。不料意大利等國都加入紳士協定，歐洲一致聯合反美戰線頗有鞏固之勢，這才逼得美帝國主義高喊着軍縮戰債有連鎖關係，絕不承認洛桑會議，要分別磋商戰債問題，終於提出三分之一的軍縮案中。這軍縮案的內容，不用說，完全有利於美國的立

場；照此案裁減之後的結果，海軍方面，英日損失最大，法意次之，美國反可增造艦艇；陸軍方面，法日損害最大，尤以德國為例，更爲法國所不甘。美國未嘗不明瞭這種不切實際的提案，難爲英法日等國接受，不過以此爲恐嚇與要挾的工具，其結果，不獨不能改變軍縮的形勢，且使軍縮會草草終場，終於在七月二十三日通過貝納斯的決議案，而宣告軍縮會議的第一段落告竣。正如我們所預測的，這種急轉直下的形勢，豈但不能視爲好的現象，實促成英法日對美鬥爭之更進一步的發展，這種預測以後竟完全實現，尤其英國表現出勇敢的姿態了。

英帝國既在歐陸造成反美聯合戰線(洛桑協定)，又扶助日帝國主義而造成遠東反美戰線，現在再進而形成世界的反美戰線(渥大瓦帝國會議)。渥大瓦帝國會議的意義，是英美以關稅爲武器的帝國主義鬥爭。“帝國經濟單位”之迷夢與自治領資本主義及英國資本主義之衝突的利益完全在這會議中曝露出來。會議的目的不止是英國得到擠進自治領市場之自由和任何解決經濟問題的重要方法，又在讓予自治領之食料及原料以優惠關稅，將牠們拉得更近一點，脫離

美國繼續增長的經濟關係；更藉關稅與貨幣協定在英國領袖之下建立反美的世界戰線，正如泰晤士報所說，要達到“超過政治的帝國範圍外的經濟單位之形成”。胡佛總統於是慘然地宣稱帝國會議實是‘作關稅戰爭的極正當的理由，將起引國際的擾亂’了。幸而到軍縮會議第二期又於九月開始，德國堅持非達到軍備平等不再列席；這件事在法國看來，是危害法國的安全和破壞凡塞爾和約，在英國看來，會是殘害歐洲反美聯合的原因，惟有美國希望英法所恐懼的事實完全實現，坐收漁人之利。

正在歐洲內部發生糾紛而美國隔岸觀火的時候，李頓報告書發表了。這報告書，在執筆者看來，真不愧為慘淡經營的傑作，四面圓滑，八面玲瓏；唯其如此，才含有不可避免的矛盾。牠一方面斷定九一八事變不能視為日軍之自衛，滿洲國純是日人製作，但又不主張將滿洲交還中國；另一方面說日軍人侵略滿洲情有可原，却又不主張現狀照舊；同時盛稱赤化勢力之可怕，然而以為無蘇俄參加解決，難有圓滿結果。於是，這些帝國主義的代表便想出一條認為良好的道路，就是國際共管，好肉大家吃，日帝國不妨多吃一點。共管

的路線自然是調和遠東帝國主義鬥爭形勢之好方法，所以美帝國主義的報紙對此報告表示欣慰者，其原因就在此。然而日帝國主義對於滿洲是堅持所謂獨佔的路線，牠絕不願意將吞進肚內的肉再吐出來使大家分潤。至於英法意德的态度，關於滿洲的解決，多少是傾向共管方面，意德藉此插足滿洲自然沒有什麼不願意，但英法就有點不同，在某種場合上（即日本答應維持英法遠東殖民地之安全，不侵犯南中國的勢力或歡迎法國的資本等等），牠們甯可讓日帝國獨佔滿洲的，何況日帝國主義的主要目的，本在驅逐遠東的美國勢力；因為這種原因，法英政府對於李頓報告，竟有些漠然之感。美帝國主義並非不乖巧，故意對報告書，不發表意見，因為他預料在國聯會議席上，必然發生分潤與獨佔的爭執，使國聯與日帝國主義發生正面衝突，則英法日間的聯合戰線必然破裂。不過英法日當然不會傻到怎樣的田地，尤其是英帝國主義立刻有了對付的方法。於是國聯一方面允許日本要求展期審查報告書的要求，讓日本從容佈置；另一方面，英國竭力進行調解歐洲內部軍備衝突。在這種形勢之下，日帝國主義乃能故意宣傳對蘇俄進行不侵略條約（松岡繞道莫

斯科赴日內瓦)，又正式承認滿洲國並且準備大舉進攻北滿反日軍隊，實際統一滿洲；而西門赫里歐也才能一唱一和地作成什麼新的軍縮案，提議什麼五強會議，好讓德國上牠們的圈套。那末，英法日的戰線，似乎雖有軍備衝突和滿洲分潤與獨佔的爭鬥，也不會就立刻破壞的樣子，何況美國自大選定局後更催逼起戰債來，這更使英法有密切合作之必要。

美國的兩大政黨，本無大的差異；共和黨固是金融資本作後台，民主黨何嘗不是有金融資本的後援，不過民主黨的後援，除了金融資本外，尚有若干農業資本。對於戰債問題，胡佛總統雖對戰債不肯大的讓步，但若軍縮成功，也可以削減若干的；至於羅斯福則頗有堅決要債不可的形勢。戰債支付在十二月十五日期，於是美國政府乃利用這問題再對內部發生糾紛的歐洲戰線施以打擊了。自然，在美發出要債通牒的時候，債務者是要抵賴一下的，然而美國毫無退讓的表示，逼得英國只好一方面趕快調和歐洲內部，一方硬着頭皮支付，並且也勸法國不必據洛桑協定以維持一致戰線。英國力主的軍縮會議五強會議在十二月二日開始磋商，德國的軍備平等要求，美代表台維斯大肆活動，力主實現美國

三分之一軍備縮減案，想討論得戰債的條件，無如英法不爲所動，而日帝國主義還提出以現勢作裁減標準的對案，以打擊美國。在軍縮會議的激烈鬥爭中，負有審議李頓報告書之使命的國聯大會（十二月六日），雖然多少顯示分潤與獨佔的鬥爭，但英法帝國主義總傾向於日帝國主義方面，小國的承認李頓報告的提議，這自然也是受了美國催債的影響。催債的影響不止影響了分潤與獨佔的鬭爭，且使法國對於德國要求作一讓步，關於軍備平等就達到這樣的妥協：（1）平等與安全共同解決，（2）英意法保證不作武力衝突。這種妥協竟爲德國所接受，於是德國重返於軍縮會，歐洲一致戰線因此妥協更見具體化。所以，上述妥協達到的第二天英國立即照解戰債，赫里歐也力勸國會同意支付。雖然法國因戰債支付問題發生政潮，赫里歐因此下台，但後任的彭古關於外交政策依然不改變態度，何況法國停付戰債而並不提到賠款問題，可見純爲對美，對於英法合作的損傷殊微。美國至此，不免大失其策，想望中的歐洲內部糾紛竟爾消滅了，欲鼓動的分潤與獨佔的鬭爭更不生效果，徒增一番煩惱；在這煩惱中，乃有中蘇復交的實現。中蘇復交當然是美蘇復交

的初步，這是美對英法日鬭爭的一條可能的出路；上海戰爭之後，美國本已有復交的要求而未實現，現在却實際準備走上這條道路。但中蘇復交以至美蘇復交，影響於國際形勢者，固然可以威脅英法日的聯合，但還可以更促進英法日之聯合的深度發展，所以在這復交事實剛公佈之後，軍縮會議宣佈延會明年一月底，而十九國特委會也通過了不關痛癢的小組委員會之關於報告書的決議草案，成爲不了了之的局面。各帝國主義代表離了日內瓦；日內的表面雖是沉寂一時，然而帝國主義的鬭爭在暗中準備着，而且更爲劇烈。

總觀這一年的帝國主義的鬭爭形勢，英法日始終合作，無論在丹腦河會議，洛桑會議，軍縮會議和遠東問題上；他們處處在想打破戰後籠罩世界的美國勢力，換言之，就是無時無刻不謀突破現狀。美國則意在利用戰債問題，歐洲內部糾紛和遠東之分潤與獨佔來攻斷英法日的聯合，保持戰後取得的地位，換言之，就是保持現狀；一直現時爲止，還沒有成功。這種形勢正與大戰之前相同，倘若美國方面的 Bloc 成立，則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不但是切近，恐怕就立刻爆發了。

結 語

總觀這一年來的形勢，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 賠款戰債軍縮的連鎖關係無法打開；舊協約國堅持取消賠款即停付戰債，美國堅持戰債之減少必以軍縮英法遠東問題讓步為條件。

(2) 英法結合援日的形勢之下，美國陷於孤立之苦，遠東戰爭只有日趨劇烈的。

(3) 無產階級運動發揚的結果，而使法西主義成為國際化，加強帝國主義與蘇俄的衝突。但蘇俄利用帝國主義的衝突而織就西境安全網，可以全力盡付遠東。

(4) 因為美國之孤立與蘇俄之全力東向，美蘇復交就先以中蘇復交而徐圖實現，但恐怕這只能更使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之急進，英國最不容蘇俄在中國發生作用的。

(5)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革命，以法西勢力之增長，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之投降，乃陷於銷落之勢。

(6) 新世界戰爭的危機已更見一步的成熟了。

一九三二年歲暮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政治

王禮錫

一 衡量中國政治的尺度

中國向來是被人稱為無組織的國家，其政治自然也是漫無端緒的政治，所以要來談中國的現實政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如果真能披開表面的繁瑣紊亂的現象，直探中國政治的核心，而把握其特質，自然可得到以簡馭繁的方法。無論分析中國的政治或經濟時，不可忽略其半殖民地性的

特質。半殖民地的第一個特徵，是與純獨立國不同。純獨立國是自己統馭自己，換一句話說，是自己國家中的一階級統馭其他階級。半殖民地的第二個特徵是與純殖民地不同。純殖民地是受一個國家直接的純馭，而半殖民地則是在許多宗主國的交互錯綜的關係下受剝削。所以半殖民地的經濟是買辦性的經濟，其政治是買辦性的政治。

把握這一個尺度去衡量中國的政治，其綜索自然是不難尋找的。外交是沒有什麼政策，外交政策就是多數宗主國交互錯綜關係的表現。中國的外交官吏與機關，只是半殖民地的符號，從這個符號可以認明中國是一個何等的國家。財政的目的很簡單，怎樣不危及中國歷來被打倒被革命的政府所欠的外債和賠款，怎樣可以養活這些持統治的武力，怎樣可以支持政府機關的銷耗，和官吏的生命。怎樣可以不危及資產階級向政府的投機。“羊毛取自羊身上”，爲要達到這幾項目的，自然是轉嫁於貧苦的生產者。在軍事上，對宗主國自然是不抵抗主義，對內則越是外患日急越是各圖奠定其地盤以加緊其剝削。而政府的本身，亦不以外患的相加，而各圖避免責任，於是在外表上失墜了重心。

在半殖民地，主要剝削者是帝國主義，主要的被剝削者是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所謂“革命的”者，是指完全無買辦性的而言，雖然在數量上是很少，但他們在反帝的意義上是不可置而不論的）。在帝國主義以其強力直接加於半殖民地性的國家時，被買辦層所蒙混的被剝削層，必起而作反帝革命戰，革命戰的失敗，很可能的，趨於民主鬥爭的旗幟。所謂民主鬥爭，決不會是議會政治的前途，而是建立被剝削者的反帝政權。自然還有一條路，一條滅亡的路，就是中國的純殖民地化的路，由瓜分或共管而言的純殖民地的路，這兩個前途，是以主觀的認識與鬥爭去決定牠。

對於過去的一九三二年的政治就在這個以簡馭繁的方法下，加以概括的說明。歷史是一面鏡子，是一面從過去看到未來的鏡子，要看到未來，歷史的鏡子對於你才是有意義的。

二 以東省事件爲中心的中國外交

談到外交，在原則上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有外交可言。許多人談論到中國的外交，以爲是妥協的外交，如

果妥協是決定的，也是政策之一。如蘇聯在歐戰時期的單獨講和，那是妥協的。至於中國，則連妥協也談不上，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一貫政策，只是跟着國際的交互錯綜的關係所造成的事實，而敷衍做尾巴而已。

一九三二年中國的敷衍外交，有兩點可言：

1 依靠國聯的冰山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報紙，佔最前面的篇幅，用特大號的標題，就是國聯如何如何。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政府對外交的宣言，或要人對外交的談話，主要的是先說國聯如何如何，然後歸結到中國是不會失敗的。

國聯究竟如何呢？我們訴之於事實。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張學良爲貫徹其不抵抗主義將錦州揖讓與日本以來，太平洋爭霸中的另一個國家——美國——從旁聽的沉默而起來說話，一月七日史汀生對中日兩國通牒，說明美國政府對於尊重中國主權領土的政策及門戶開放主義，若有加以侵害，且凡違反非戰條約的手段以造成於一切狀態，美國亦不能承認。而在國聯怎樣呢？國聯的主要國家，自然除了當事國的日本就是英法。英國的西

門外相表示英國能信任日本對中國必能尊重九國公約，在滿洲方面必能保障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原則，所以沒有另致通牒的必要，而法國則竟認為這是美國政府單獨的行動。

自然的，英國雖然對日本的獨佔東三省多少表示不滿，但對於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沒有多大的危害，而自己對於解救國外經濟的危機和看守自己的殖民地，還忙個不了，豈有餘力來管他人的半閒事。法國在歐洲和日本在太平洋與美國爭霸，他們在這一點上，利害是相同的。國聯的主要國家法國，却是日本的朋友，牠能為中國說公道話的嗎？在國際形勢上英美態度不能一致，於是史汀生的試探性的通牒就等於一個水沫。中國的外交家在國聯的力竭聲嘶的呼號和政府的一再報告，就成為徒勞。

日本既完全佔領了東三省，於是演其必演的建立滿洲僞國的把戲。二月十八日發表獨立運動宣言。事實已經爲了張學良揖讓的高風而使之雍容造成，我們的外交部才來放其無可奈何的空砲，二月二十一日也對所謂獨立運動發表宣言：“東三省向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凡有僭越或干涉該地

之行政權者，即爲直接侵害中國領土與行政權之完整。……凡東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離或獨立，與夫東三省內之一切行政組織，未經國民政府授權或同意者，一律否認之。”但這有什麼效力呢！三月九日偽國在長春正式成立了。

在錦州佔領之後，日本對中國就更加輕視了，以爲中國的軍隊都是不戰而退的，何妨直接向京滬方面壓迫，如使中國政府迅速將東三省合法出讓，而且在長江又可以伸進一足，不但可消滅抵貨運動，並且在長江方面又可得些新利益。日本對於東三省事件，始終是試探性的，爲了中國的着着退讓，而僅僅訴之於國聯，而日本則看透了全世界經濟的恐慌與政治的不安：誰也沒有以實力來與日本爭這死活的決心，而一步步造成事實，使苟安的國聯向強者屈伏。不幸，在上海遇着的十九路軍並沒有那樣讓德高風，於是激起了淞滬的血戰。至於政府，除了再訴之於國聯，還有什麼辦法呢？在日內瓦開會的第六十六次國聯理事會，爲了中國自己在與日本衝突，於是激起了一點不利於日本的空氣。但這所謂不利的空氣，是由於帝國主義間自身的矛盾發出來的，決不是所謂同情與公道。這，就是他們中間的所謂利益的獨佔

與均佔的衝突。但是，仍然爲着兩個原因。一，英法都沒有以實力干涉日本的決心；二，扶助半殖民的中國起來之後，對於自己是有害無益；所以他們都取了調停與期待的態度。將大會的召集之期延宕又延宕，無援的十九路軍卒至被迫出淞滬。事實已經把國聯暴露到這樣地步，然而中國的外交依然依靠着牠，這不但是在騙民衆，實在是騙自己了。

還期望國聯什麼呢？有的，還有一幕未完的把戲——調查團報告。

調查團三月十四日到上海，上海戰事給調查團留下了些憑弔的殘跡，偽滿洲國也已經造成事實。施施然由滬赴京，由京赴漢，由漢赴平，展轉到東三省已經是一個多月了，好像是準備充分的時間給日本去布置一切未完備的工作。到調查報告編製成功是九月四日，距九一八恰恰是一年。在這個調查團委委蛇蛇的期間，能夠忍耐的中國政府，只是等待，等待。而日本則不管調查團，只管進行一切，奪取郵政，奪取稅關，派遣全權大使，到九月十五日日本竟正式承認偽國了。而中國則只是外交部長的一紙空文所謂喚醒友邦的注意而已。

其實，國聯對於分贓式的李頓報告書，也並無討論或執行的誠意，十一月二十一日開會的國聯行政院會議推到國聯大會，而在國聯大會（十二月六日）中，雖然有若干小國恐怕釀成惡例而大加非難，終於無濟於事，牠又推到十九國特委會辦理。無論行政院會議，或特別大會，或十九國會議，英法袒日的態度是異常明顯的，到十九國會議之起草決議案委員會的決議草案（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上，表面上好像是接受了李頓報告書，實質上英日早已預備好了新妥協案（德魯蒙與杉村交涉的）。新妥協案沒有談到偽國之存在與否，更排斥美蘇參加調查，無異於日帝國主義的手筆。正在這個時候，日帝國主義集中兵力於熱河邊境與山海關一帶，實施侵佔熱河，甚至於華北了。

中國外交的惟一依靠者國聯，可惜國聯是一座冰山。

今年的中國外交，自然只有繼續依賴國聯，而國聯最多只有在既成的事件上打折扣，如日本進兵東三省，則問題在撤兵；到製造了滿洲國，則問題又在滿洲國之承認與否。今年日本將本其過去的政策繼續製造事實，而國聯則一步步的放棄，在國聯中的勝利自然是日本的。

2 中蘇復交

第二件外交上引起全國人乃至全世界注意的事件，是中蘇復交。

關於這個問題蘊釀的很久。今年三月間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時，孫科陳友仁曾提議對俄恢復邦交。國難會議曾提出整個外交政策，對俄復交為外交政策中爭論最久的問題。至六月六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對俄復交的原則，其步驟為：先訂立不侵犯條約，再行復交。外部電令滯留俄京之王會思與俄接洽，俄方堅持復交不能有條件，因此又擱置下來。後來顏惠慶與李維諾夫在日內瓦時，續有接洽，亦因為復交訂約之先後問題而遷延。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我國代表顏惠慶和俄國代表李維洛夫在日內瓦交換復交文件，這個消息才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世界。

雖然震驚了中國與世界，這對於東三省的收復有什麼好處呢？如果中國有整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蘇復交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外交上是利用許多矛盾，增加一個可以為我們這方面運用的矛盾，自然，外交是便利得多。第一，中國的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原則應該是反帝抗日。蘇俄是反帝

的國家，尤其是日本的對頭。第二，中俄在過去來往的幾個重要文件：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孫逸仙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所發之聯合宣言，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平簽訂之中俄協定，內中包含了幾個原則：廢棄帝俄時代一切條約及特權如領事裁判權，租界等，歸還中東路放棄庚子賠款；這些是中國平等國交的開始。所以在整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下，中蘇復交是有意義的。

但是，中蘇復交最初便是撒嬌性質的，在外交的用來與國聯撒嬌，那算是什麼政策。直到現在，中蘇復交的意義見於宣傳的是：如何使國聯震驚，如何利用日俄的衝突來收復東省。這也正是無政策的外交的表現。與俄復交對於東省事件是沒有什麼直接利益的。在蘇俄鎖國建設的時候，牠的利益是避免一切對外戰爭的。

總之，在外交上，除了獨立自主地訂下若干年內一貫做下去的外交總方針與政策，然後隨宜變化以外，沒有其他取巧的臨時抱佛腳的辦法。但這，根本是政權的質的問題。

三 上海反日戰及東三省義勇軍之繼 續奮起

1 上海反日戰

日本在佔領東三省，佔領錦州之後，認識了中國的揖讓精神，於是進而威脅京滬，以為這是使中國合法奉送東三省最好的途徑。於是借口三友實業社工人毆傷日本僧人之假造的極小事放，一再對中國侮辱，提出酷刻條件，上海市政府一再忍辱承認。這忍辱的結果，不但不足以使日本滿意而退，反而堅其對中國的輕視，乃於一月廿八夜開始進佔閘北。出乎意外的十九路軍，不及接受政府退兵的命令，而與日軍作頑強的血戰。事前日本聲言十九路叫化子兵不足戰，四小時內可以掃平上海，結果是傾全國的兵力，使用一切最新的最毒辣的武器，四易司令，血戰三十四日，而無援的叫化子的孤軍仍得全師退至第二道防線。

在最後的幾天，有一支所謂援軍已經快到前線，十九路軍連電促其開向瀏河，結果，他們到向蘇州退下去了。所以日軍得以向瀏河上陸，而十九路軍惟有退向第二道防線之

一途。(滬戰的詳情，參看參加滬戰計劃的十九路軍高級參謀華振中，及與十九路軍有歷史關係的朱伯康合著的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料，和抗日血戰領袖之一的翁照垣之淞滬戰回憶錄。)

在反日戰中，勇敢的工人與學生羣衆，都繼續的組織義勇軍參加前方作戰或後方的運輸宣傳工作。

這一個戰爭給我們的教訓是：

- 1, 反抗戰是無關於戰爭器械與技術的優良的；
- 2, 被壓迫層對於反抗戰是勇敢的；
- 3, 反抗戰要得到最終的勝利，只有在反帝抗日的大衆政權下才有可能。

2 東北義勇軍的繼續奮起

東三省之王張學良放棄東三省，東三省的老百姓——被壓迫層不會放棄東三省的。

自錦州的砲聲開始了一九三二年，而東三省的義勇軍並不因日本的進一步而消沉，反而愈益奮起，在遼寧，有民衆自衛義勇軍；在吉林，有丁超李杜等之自衛軍；在黑龍江，有馬占山所部之黑軍。而東北救國軍總監朱霽青且不避艱

險，親自出關領導作戰。其餘各地農民的抗日的隊伍到處皆是。鐵路線以外，東北不是日本的，是義勇軍的，是農民的！一二月間，日軍侵熱，我方騎兵第三旅及步兵第十九旅之一部，會同義勇軍，在義縣朝陽寺大虎山大通一帶與之抗戰。日軍屢次挫敗。其後遼西義勇軍十餘萬人，分三路大舉攻瀋：一由錦州直襲新民，一由溝幫子進擊營口，一由彰武法庫康平分路前進，使日軍疲於奔命。在吉林方面，張作舟，馮占海各部，與第七旅長李杜；中東路護路軍司令丁超，二十二旅長趙毅，二十五旅長馬憲章，二十六旅長宋文俊，二十九旅長王瑞華騎兵旅長宮長海，姚殿臣等成立吉林自衛軍。李杜任自衛軍總司令。在黑龍江方面，馬占山在九一八以後，即奮起抗日，後來以力薄不支，遂假降，參加偽政府，四月七日再返黑省，發誓誓死抗日。四月末，各路義勇軍統一指揮，救國軍與自衛軍合併，王德林李杜任正副總指揮。黑省各縣民團——農民武力，羣起組織義勇軍。八月一日義軍開始向日軍總攻擊，沿路日軍窮於應付。八月中義軍抗日戰，凡六廿八役。九月末，蘇炳文領導護路軍，光復滿洲里，海拉爾各重鎮，並協同馬軍合攻黑垣，日軍窮於應付。日軍勞師

五六萬，歷時兩月之久，才在十二月六日攻克滿洲里。

東北義勇軍抗戰的價值是偉大的，牠表示了上海抗戰的同一意義，並且表示中國農民在革命戰中是如何的勇敢。至於義勇軍本身的前途是悲慘的，中國整個無辦法，這一隅的散漫的武力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有組織的侵略嗎？擁兵數十萬的東北領袖可以戰而不戰，無精良的武器與作戰的訓練的農民明知其決不能戰而戰，這相反的事實各說明其本階層的性質及其對於中國前途的作用。

四 國難中的財政政策

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如何使生產力提高。這樣的一個政府，人民才有義務去維持其生存，然後才談得到使財政如何作極有利於人民的分配，並如何以最低的費用，維持這政府的存在，並使其能充分運用其機能。前者就是所謂開源，後者就是所謂節流。

一九三二年中國財政上的收入：

關稅收入三萬五千餘萬元；

鹽稅收入一萬六千餘萬元；

統稅收入八千六百餘萬元；

菸酒稅收入三千餘萬元；

印花稅收入一千五百餘萬元；

國家行政收入一千餘萬元；

其他收入一千一百餘萬元。

此外國有財產收入，鑛稅收入，國有事業收入各數百萬元，交易所收入十餘萬元。總計以上各項收入，除東三省國稅收入已被偽國截留，約七千餘萬元外，尚有六萬二千餘萬元。而歲出之原列預算，達十二萬四千餘萬元，超過歲入總數之一倍，其中軍費一項已超過歲入總數。經過一再核減，出入相差不遠。

其分配的比例軍費佔歲出總數百分之四七以上；債務費占百分之二五以上；財務費及補助費佔百分之八以上；教育文化費，佔百分之二以上；國務費外交費，各占百分之一以上；又次為建設費黨務費，實業費，內務費，司法費，蒙藏費均不及百分之一。

在國防上毫不發生作用的軍隊，佔了歲出總額之半數。貢獻給外國人和買辦金融資本家的佔歲出總額四分之一。

而於人民生計有關的實業建設的費用才不過各佔百分之一以下，這些百分之一以下的東西，經過中間官僚的耗蝕，試問所餘幾何。除了維持軍隊，維持政府機關，進貢給外國人以外，財政沒有其他的作用。這些事實很夠為政府性質的說明。

就像東省扣留鹽稅，由鹽稅担保的各外債自然應當停付，但財政部特別聲明否認將九月份到期各款，展延償付之說，這是表示對於民衆可以刻薄一點，對於帝國主義的信用是不可虧的。

財政的收入，除了以上所列舉的以外，還有以毒害人民養活政府的鴉片公賣的收入。

據滿洲評論三卷十四號載：中國各地一年間，生產鴉片總額，估計達十二萬五千担，最初實施公賣者有福建，安徽，山西，陝西，河南，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繼續公賣者，則有河北，湖北，江西，廣東，等省；浙江，江蘇兩省雖遭民衆激烈反對，不能公然發售，然仍用毒藥管理局的名義，暗中買賣（中行月刊二十一年十月號）。這收入是否完全呈繳中央我們不管，總之是養活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財政源泉之一。

至於地方的財政，所恃的是殘酷的苛捐雜稅的剝削，像江西的產銷稅等。

從上面的總歲入看來，中國財政的最大源泉是關稅，牠幾乎佔了全歲收半數以上。關稅的收入逐年都有增加，民八以前，每年收入約在四千萬兩左右；民九到民十七，遂由四千九百萬兩，增至八千二百萬兩。十八年爲一萬五千二百萬兩，十九年一萬八千萬兩，二十年二萬四千六百萬兩，去年則爲二萬萬二千九百兩。若尋找其增加的原因，完全在貿易方面看，二十年份進出口貿易總值與元年相較，不過大二倍半以上，而稅收數目竟大至六倍，必不能理解。可見貿易外，進出口稅則的修改，與海關稅改爲金單位徵收是爲關稅原因增收的主要成分。

這事實說明幾點重要的結論：

1, 這種加稅僅僅是爲國家財政的收入，換言之，僅僅是爲政府而加稅；

2, 真正有利於國家人民的關稅，是獎勵本國生產限制入口貨的保護關稅；

3, 所以帝國主義束縛半殖民地的鎖鍊是關稅協定，而

半殖民地的生路是掙脫這鎖鍊。

五 奠定割據形式的內戰

在外來的侵略很嚴重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可表現的是兩個現象：好的一面是爲了外力的壓迫，而增加內部的團結，壞的一面是各各借着國難的掩護，進行割據式的奠定。一九三二年表現於中國的文電上的是前者，表演於事實上的却是後者。

廣東有海陸空的戰爭，結果是陸軍奠定了廣東的統一。

山東韓劉戰爭，結果是把劉珍年調駐浙東，奠定了山東包文拯的統治。

四川有二劉戰爭。四川以軍事上太複雜，除了劉湘，劉文輝以外，還有田頌堯，鄧錫侯，楊森，劉存厚等都要利用二劉的矛盾以圖存。所以田鄧等始則聯劉湘迫劉文輝，到劉湘進展，又怕這矛盾的解決是不利於己乃出而調解。

貴州有王毛戰爭。起頭是王家烈要打破毛光翔的勢力，結果猶國材等擁毛光翔反王。至今尚不知將奠定誰的割據。

第一步各人統一自己的地域，奠定小的勢力範圍，然後

或將進一步而相互的聯防，構成較大的勢力範圍。

中國將由外力的壓迫而啓發爲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抗爭的運動呢？抑將因外力的壓迫而造成內部的割據戰，於是而引起民主的鬥爭——即民族鬥爭的前驅——呢？前一個問題有了一年來的事實做否定的根據大概是不成問題了。

一九三二年的世界經濟

天 白

資產階級的幻夢

世界經濟恐慌已經繼續到了第四年的一九三二年，在這一年中，一般資本階級的御用學者和報紙雜誌，都狂歡地囂叫說恐慌已到止境，全世界已漸趨恢復，信用恐慌已漸轉佳，破壞數量漸呈減少，生產狀態已漸臻改善，因此原料價值，商品價值和股票交易都漸向高漲等等。肯定恐慌已不復

再生，從此資本主義世界將走入復興之途。但是我們來看看資本主義諸國經濟的真象，它們在去年一年間，不但沒有得到什麼轉機，反因為保護關稅，進口抽稅，“自足自給”政策，膨脹政策等等為挽救垂危的資本之資本主義世界的努力，使世界資本主義的對立和危機，更走進激化的新階段。由資本主義體制及資本主義部分安定之矛盾而生的經濟恐慌，已將資本主義欲達其相對安定的一切可能完全破壞。

一切基本指數，都說明恐慌之更加深刻。去年度不但美國沒有照例的季節之轉佳；英，德，法，意及其他各國之季節活況，也比前年微弱。

美國的輕工業，在去年第一季便不曾看到如往年之季節的騰漲，但只略呈安定。然至四月，即呈激落——棉花減二三·五%，毛絨減二六%。第一第二季六個月間，急轉直下的鋼鐵生產，到七月更減至一九·三%，八月更減為一八·三%；交十月後，略見增加，但亦不出第二季之數。鋼鐵業之作工率，竟低落到全生產能力的一〇乃至一二%以下。美國著名工人總會會長格林氏，也不得不承認說：到一九三三年一月，美國失業工人數，將更增二百萬人（即自一千四

百萬增至一千六百萬人)。

德國工業作工率之季節的向上，比前年尤低。去年在輕工業上，簡直沒有看到什麼轉佳之象。但在重要工業上，只看到建築和製鐵業的轉佳(這是應蘇聯購買之需而漲起的)。七月時一五五溶礦爐中，用以溶鐵者，只不過三六。去年初頭德國失業者，突破六百萬人(一九三一年底為五百六十六萬人)，到二月更增加至六百十三萬人。去年更有多數勞動者，被取消津貼，並且還有無數的人未經登記。

英國雖然施行了三三· $\frac{1}{3}$ %之輸入鋼鐵的從價關稅，然而連有色冶金業的狀態也不會改善。三月以來，生產呈系統的低落。四月時有三個溶礦爐停閉，到七月更增為十三個。英國全國共有三百四十八個溶礦爐，現在開工者僅有五十六處。其他生產方面，自金本位停止後，一時曾急轉良好，但此終成曇花一現，至去年即轉低落。計第一季落九五·一%，第二季落九四·三%，第三季落至八七·三%，第三季生產重量，與前年同期相比，實減少二·二%。棉製品生產，去年首幾個月因代日貨在中國市場暢銷，顯呈激增，但至第二季後即趨低落，至六月後減退尤甚。機器製造，尤以農器

製造及造船業方面，狀態益形惡劣。失業者自四月以後，亦逐漸增多，七月時實達二百九十七萬餘人。

法國之季節轉佳，至第二季後似漸有轉佳之象，但極微弱。四月比三月約減二萬一千噸之溶鐵，至五月略增九千噸。至六月後，復減少七千噸。此外鐵軌，鑄造，針業等，比之以前各季，僅呈略增。煤礦似例外地增加，但此不過為限制煤炭進口之結果。製造工業部門中，除化學工業及關係軍事工業之機器之若干特別部門外，餘均續呈減退。登記失業者，上半期自三十萬零三千減至二十三萬二千人。

勞動階級狀態之惡化

去年上半期勞動者收入之低落，達鉅大的範圍。德國一年來，工業勞動者每週收入，竟減到三七%（自三一·七五馬克減為二二·一五馬克）。恐慌期間德國勞動者之損失總額，據著名經濟學者李金斯基統計，為一百八十億馬克。美國在恐慌期間內，工資減到六〇%。英國的匯市雖呈狂跌，然其上半期間每週工資之增加，僅不及九萬四千五百五十人，其額亦不過三千六百金磅；但工資之減低，則及於一百

二十五萬九千人，總額達十五萬三千三百金磅。意大利據法西斯蒂勞動聯合會計算，每小時工資指數，一九三二年一月爲八九·五%，四月則減至八七·五%。

物價低落存貨增加

物價自去年第一季略漲之後，至四月即呈激落。去年中因工業恐慌之異常激化，各種原料及半製品之價格，甚至跌落到穀物價格以下。物價跌落，隨之即說明存貨的增多。現在各資本主義國想將存貨一掃盡罄，實屬一種妄想。

農業恐慌之深刻化

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農業恐慌，繼續深化，呈空前未有的凋疲荒廢的狀態。在美國，農民的金元，在一九三一年值六角二分，一九二九年六月值八角七分，去年六月十五日時，跌到五角。美國小麥一普解爾的生產費，據前年美國農務局計算，在不用機器的耕地，約值八角一分。那以後生產費是否減低雖屬疑問，但現在美國的農民，對每一普解爾小麥，只得到三角七分。一磅（英單位）棉花的生產費，據同資料發

表，爲一角一分，但售價至多也只能到到四分六厘。所以照現在這種價格看來，農民除了償付地租稅金等等以外，簡直一無所得。

據每日郵報載，坎拿大的食油，比汽油還賤。商人只要出六分錢便能買到一磅油。這確爲空前的低價。據古利少校聲明，奧大利的絨毛生產，已瀕破產。去年五月傾銷時，毛絨的售價，比生產費低百分之二五。

到一九二一年的恐慌止，美國農業在其國民經濟中之比重，還不到百分之二〇以下，但是現在只有百分之九·三了。

歐洲諸國的狀態，也并不好在那裏。下面是荷蘭報紙所載的波蘭農民之狀態。

波蘭農村消費品價值

	戰前		一九三二年二月	
	和大麥 的比價	和豬肉 的比價	和大麥 的比價	和豬肉 的比價
犁	135	23	321	45
鞋	79	13.4	321	45
十米突的布	62	10.5	131	18.1

十基羅格蘭的糖	46	7.8	117	16.2
十基羅格蘭的鹽	6	1.0	26	3.6
一利特爾的酒	11	1.8	47	6.5

波蘭農業收入總額，去年合計為二十六億茲洛齊，而每年應付地租債款等的數額，則為九億茲洛齊，即佔百分之四〇以上。波蘭農民的負債，數額亦極龐大——計達三十億八千一百萬茲洛齊。

布加利亞農民對高利貸及私家銀行所負的債，亦有七十億列布。頭等貨色的煙草，在布加利亞的農民購買，每一基羅格蘭十二布列。但是去年則非五十布列莫辦。

希臘，中部及西部馬其頓的煙草播種，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二九年減少七二%，而一九三二年又比一九三一年減少二五%。希臘煙葉的出口，一九三一年首四個月，為九億二千一百萬德朗，一九三二年同期則減退到三億九千三百萬德朗。巨哥斯拉夫家畜的價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小牛每一基羅格蘭約值一二——一三德那爾，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只值三——五德那爾；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豬每一基羅格蘭值十一——十二德那爾，一九三一年同期，則跌至六，七德那

爾。

波斯的農業狀態，可以借一位波斯議員在議會上的演說來表明：“關於農民，簡直不堪一說。因為他們以前賣掉一霍爾巴德小麥，還能買四雙鞋子，現在則賣四霍爾巴德小麥，也買不到一雙鞋子了”。

日本農民的負債，也日益加重，計一九二九年為四十六億圓，而去年上半年，即已達六十億圓。去年上半年來，繭價已跌到百分之五十以下，米價也落到百分之三十以下，這主要農產品之狂跌，使日本農業的收入，益臻激減。土地價格也跌落到三〇%以上。其結果地主經營的擔保負債，也隨之增大。而政府則以所謂繳納整理改種荒廢桑園補助金的手段，限制農民產繭到二〇——三〇%，以對抗恐慌。

農業生產之過剩

農業的狀態，毫無轉佳的模樣。我們在前面已經舉過農產品存貨屯積的資料。這些存貨一流出到市場上時，必引起物價的低落。在這情形下，想將存貨一掃淨盡的企圖，不但得不到什麼實效，就在最近的將來也恐怕不可能。同時想限

制種植面積的企圖，也一樣不會得到什麼效果。

前年秋季，傳聞美國已開始極力限制種植面積。冬令小麥的種植面積，確已限制了一〇・四％。但是冬蒔和春蒔小麥的合計，反較增加。五種類穀物的種植面積，一九三二年計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三・二％。

在坎拿大，五種穀物種植面積，則從一千七百六十六萬九千英畝，減到了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八千畝，計減百分之二五。在奧大利，種植面積，幾與前年相同。在阿根廷，據官廳估計，小麥的種植面積，增加一〇％。

在穀物輸出國，可以看到種植面積擴大之更較明瞭的傾向。

去年美國為擬定限制棉花種植面積三分之一的計劃，曾招集各省知事開特別會議。但實際，一九三二年所限制的種植面積只不過九・五％。這樣為緩和滯貨增多價格狂跌，而無條件地實行限制生產，恐怕只有更使農村經濟更加速度地退化罷。

就種植狀態來看：歐洲方面，如西歐主要穀物輸入國的德法，去年的收穫，都已超過平均以上。美國和坎拿大的小

麥收穫，也快達到和前年同樣的數額。而世界小麥收穫面積，反比前年增多一百萬普解爾。據英國小麥學者布淪霍爾調查一九三二——三三年度主要農產品之小麥收穫額，估計如下表所示(單位一百萬普解爾)：

	前年度	去年度	本年度
歐洲(俄國在外)	1,368	1,437	1,526
北美	1,268	1,213	1,185
其他	524	500	498
以上合計	3,160	3,150	3,207
俄國之出口	101	70	40
八月一日存麥。	594	610	680
總計	3,855	3,831	3,930

據上表看來，可以知道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的收穫額，實比一九三一——三二增加一億普解爾。同時我們再來看看各主要麥產國的輸出能力為如何(單位一百萬普解爾)：

小麥輸出

1930—31年 1931—32年 1932—33年(估計)

美 國	95	158	200
坎拿大	259	207	400
阿根廷	123	142	168
澳 洲	152	150	152
俄 國	101	70	40
多腦河諸國	46	64	8
北 美	20	16	16
合 計	796	807	984

照上表看，小麥輸出國，實有九億八千萬普解爾的輸出能力，至於小麥輸入國的需麥額，合計全歐也不過七億四百萬普解爾。這二億普解爾的生產過剩，即說明農產品價格之低落及農業恐慌之更加尖銳化。

巨大事業之破產

一切生產指數的續落，物價狂跌及滯貨增加，必引起一般事業的破產。去年上半期，各國都相繼起了資本主義存續期間之最大的破產。克魯格事業的敗露，科達公司之破產，都是記憶猶新的事實。美國雖然組織復興金融公司從事積

極救濟，然而在這期間內，破產的數目，仍似飛躍的增加。

	破產數(上半期)	負債額(單位百萬金元)
1929年	566	301.6
1930年	2,459	514.7
1931年	3,935	894.4
1832年	5,869	1,081.0

去年上半年，美國倒閉的銀行，計有七百八十四家，但其後有一百四十一家復業。

英國在第二季(夏季)時，也發生有史以來的重大銀行之破產(英美銀行的倒閉)。因此影響到英國和南美諸州間的經濟關係的破裂。其後，統制有霍爾森商業銀行(即前英俄銀行，為與革命前俄國通商的中心)的哈利曼銀行團，也宣告破產。不久俄英銀行——列納金礦之大股東——也告破產。

德國恐慌的激化，上半期間表面上並沒有破產的增加。不過，破產數的減少，是由于資本集中的強化，及國家對破產者援助的原故。

無能爲力之挽救運動

在恐慌日益深化中，各國均極力想利用國家的機構來救濟資本主義經營之破產。前年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就已走上這條道路（銀行之救濟），到去年的初頭，美國也同樣走上此途。於是創設“復興金融公司”，而以供給資本與瀕于破產的企業爲其直接的任務。美國歲計雖有三十億的虧額，但政府竟能從一九三一年末豫算中抽出五億金元，交給復興金融公司作基金。到一九三二年，復興金融公司復據格拉斯波拉法，將其資本增加爲三十三億金元。到七月一日止，復興金融公司已付十億六千五百萬金元的債務。同時更作了種種特別設施，如供給資本與支持鐵路事業的公司以至農業方面。聯邦準備銀行并承認以國庫債券爲擔保，發行總額十一億八百萬金元的紙幣。這鉅額的紙幣之一部分，又交給復興金融公司，以救濟各項企業。

在德國，通過國家銀行由國家投到銀行基金的比率，得來斯登銀行是九〇%，此外尚有二大銀行，均爲七〇%。這只有社會法西斯蒂纔以爲由國家救濟破產資本家的這種救

濟方法，是一種進步的社會主義。而銀行的行長和經理們，則不過利用這國家資金，來鞏固因受恐慌影響而破產的德國金融資本之地位罷了。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涉，毫不能挽救喘息在恐慌之下的資本主義世界。而其對銀行之供給資金，首先便阻礙不能生存的企業，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經濟；其次又使從各個企業的破產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破產不斷地擴大，而驅使國家更趨向膨脹之途，這是無疑的事實。

走向膨脹政策之途

膨脹政策的增強，自會使資本主義市場更趨崩潰，使恐慌更呈激化。然而資產階級的若干集團，特別是和輸出部門有利害關係的集團，以及須國家直接扶持的集團，却將其視為恐慌的出路，都在意識地推進着膨脹政策。

現在幾乎一切資本主義國，都在圍繞着膨脹問題，作着激烈的鬥爭。在去年上半期，這鬥爭表現于政府對這問題的政策之動搖中。在日本也時常看到向反對方向的動搖，大藏大臣高橋宣佈勵行膨脹政策後，便有了許多有力的運動，起

而加以壓制；犬養首相，也因在對這政策的鬥爭上，供了犧牲。

在美國爲準備作巨大的膨脹政策，而實行信用之擴張，但這却帶着跛行的性質。胡佛的政府，因爲有力的金融團體之反對，已無徹底實行這政策的決心。以國債爲擔保的銀行券之發行——即膨脹政策之實行，自在法律上許可後，同時政府即擬由新借款及租稅以葺補豫算虧額，這即是說明膨脹政策前途之多難。

反對膨脹政策的運動，不管其勢力再怎樣雄厚，然而爲了暫時隱蔽銀行清理及豫算不均衡起見，就是極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不適用這種非常手段，而暫行膨脹政策了。陷入膨脹政策的這過程，暫時是可以延長的。而這過程雖然在劇烈的鬥爭中實行，然而它仍是在發展的。

國際信用之喪失

活期借款的利息減低，可以由上述根本上無可救藥的這過程（陷入膨脹政策的過程）來說明。這利息減低上，資本發行之激減也演着莫大的任務。美國去年上半期有價證券

的發行額，比一九三一年同期之二十八億四千三百萬金元，僅爲七億一千六百萬金元。法國比前年同期之一百億佛朗，也只有四十億佛朗。

此際對外資本發行，事實上是絕對沒有的。在美國去年上半期，對外簡直沒有投出新的資本。英國在上半期也只放出了三萬五千金磅。在法國，發出到市場上的，只有一年前豫定的捷克斯拉夫國債。第一季略趨微弱的國際活期借款之掃蕩過程，到第二季後，復趨強銳。國家銀行多以自己的準備金來清理國外匯兌，私家銀行則以其在外流通的資金來繼續償付。其結果使現金更加集中于債權國。去年法國銀行存金額，上半年間，即自二十七億金元增至三十二億二千金元。瑞士銀行由四億四千四百萬金元增至五億零二百萬金元；立陶宛銀行由三億四千五百萬金元增至三億八千二百萬金元。在這些存金額以外，還有鉅額的進口的現金，保存在商業銀行及私人的手中。鑑諸上述事實，則信用之利息減低，實不能視爲狀態之恢復以及信用恐慌終結之徵兆。

但只在某幾國內，因爲各地資本流入，事實上遂生鉅額之貸借資本。去年英國發行之有價證券額，似較增加，並且

將五分利戰債掉爲三分利的事也告成功等等，就是因這種狀態而起的。

世界貿易之衰頹

過去一年來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世界團結之逐漸的崩潰。國際貿易的不振，連國際聯盟金融委員會也不能不承認是“世界貿易的滯塞”了。

美國的貿易，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輸出減三七%，輸入三二%，出超減五七%。一九三二年十個月累計，較前年同期輸出減三五%，輸入減三七%，出超減一四%。德國對外貿易，輸入自一九二九年以後，輸出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即趨減退。至一九三二年後，輸出入激減尤甚；計去年十個月貿易統計，比之前年同期，輸入減三五%，輸出減四一%。法國去年對外貿易，亦較前年同期減少，計輸入去年爲二九，八二六百萬佛朗，前年爲四二，一九九百萬佛朗；輸出去年爲一九，六九三百萬佛朗，前年則爲三〇，四二一萬佛朗。最近一年來各國對外貿易之特徵，即在輸出均較輸入低落更甚之點。

各國中顯示不同者，則為英日兩國。二月時，英國因為保護關稅將見施行，輸入顯呈增加。但至三月以後，又漸趨低減。以是去年第一季的輸入，較之前年同期只減少七·八%。至第二季，則又激減為二四·二%。然其減退率比起其他各國還算微少。英國的輸出方面，去年第二季時，反比第一季增加。但將其各月份之輸出加以分析時，我們可以看到增加者只到四月為止，到五月以後，便復呈低落。至於去年最初幾個月輸出的增加，則是因為一時大宗棉製品能在中國市場上代日貨而暢銷的原故。

日本去年輸入貿易之激增，除了各季節的原因而外，還有一樁特別原因，就是軍事工業的貿易輸入之激增。日本的對外貿易，不僅輸入為日用必需的消費品，并輸入為貯藏準備的商品。如小麥（比前年第一季增一八%），大豆（六%），高粱（二四%），罐頭（一〇%），馬糧（四三%）等等的增加，均足注目。此外有充軍用品之商品之輸入，尤呈激增，計甘油之輸入增四四五·七%，硼砂增二二八·四%，水銀增一三六·七%，火油增一三三%，阿摩尼亞增一一八·三%。蓖麻子油增一〇八·九。

日本輸出貿易，去年對華貿易因華中華南各地勵行抵貨，較前激減；然對滿輸出，則突增四五%。日本輸出商人，利用圓價狂跌的機會，正傾全力在世界市場上對自己的敵人作着鬥爭。去年日本將英國棉製品從伊拉克驅出，並將荷蘭棉製品從荷屬印度驅出，幾全告成功。

世界海運之減退

因為世界貿易的減退，航海業也隨之激減。去年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船隻，四月為三百七十艘，一月為三百七十七艘，六月僅有三百三十六艘。通過蘇彝士運河的船隻，一九三一年六月為四百三十八艘，去年六月僅有三百七十八艘。一九三二年上半期通過上述兩運河的總噸數，比前年同期實減一〇·五%。

歐洲各埠船隻運輸，如下表所示：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		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六月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安特瓦普	5,196	9,528	4,600	8,263
漢堡	9,982	10,443	9,277	9,115

洛特丹	5,425	8,756	4,720	7,039
布勒曼	3,050	4,327	2,974	3,826

世界停船噸數之增多，遂驚人之一數。一九三二年七月底，世界停船噸數為一四，一一五千噸（去年世界輪船總數為六千八百萬噸）。其中英國為三，四七〇千噸，美國為二，二一一千噸，德國為一，三七五千噸，法國為九八三千噸，意國為八六三千噸，日本為三五二千噸，荷蘭為五九五千噸。

去年世界新建輪船之少，亦為數年來所罕見。商業雜誌曾載稱，“造船所多數停歇，有好些還將機件拆毀”。去年造船業中，最呈凋零者首推英國。往年新建船舶噸數為一百五十萬噸，去年竟激減為二十二萬五千噸。三年前英國造船佔世界半數，去年末則僅佔二九%。

保護主義與各國對立之激化

世界貿易的惡化，世界海運及造船業之激烈的恐慌，喚起對保護主義專橫之抗議。德國報紙，對醉心自足自給之思想的政府，屢加警告。關稅政策，主要使完成品的輸出更致

減低。所以德國工業聯盟，路爾礦山業者的代表，德國自由經濟政策聯盟等等，都決然反對保全國內市場——即自給自足的政策。在法國，全國擴張經濟同盟及法國輸出工業同盟，也同樣反對這種政策。他們的任務，在“減低關稅障壁，以樹立基于法國工業與外國工業間直接協定之自由發展的制度”。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蘇維埃”，也訴說有“除去世界貿易途上之障礙”的必要。

但我們自不能就此說自由主義行將復活。在目前反對保護主義的，一方面是由受了世界貿易惡化的影響致其利益大受打擊的資產階級羣發起的；另一方面，在對保護關稅主義抗議的背後，却隱藏着樹立抽進口稅，特惠貿易等新形態之更較帶破壞性的綱領。所以對保護主義之最新形態的抗議，往往是出自保護關稅主義贊成者之口的。

總之，保護主義是取着聯繫世界商品流通之更較畸形的形態而繼續發展的。去年一年間，一聯作了些關於特惠協定的交涉。德布交涉，意匈交涉，西班牙，立陶宛及波蘭間，拉特菲亞及立陶宛間關於相互特惠的交涉，法比間關於煤炭的交涉，德法間，法美間，法日間，比荷間，奧捷克間，奧南

斯拉夫間之交涉，羅馬利亞，布加利亞及南斯夫關於對工業國售穀物的會議，羅馬利亞，奧大利及比利時間的交涉，英帝國對自治領之協定等等。這些交涉協定也者，就是一種變態的激烈的關稅——商業戰。這必然引起商業上政治上的交涉，而這商業上政治上的協定，又必然長成爲商業與政治上的紛爭。例如德國之匯兌管理，便引起意實業界之不滿，而要求採取報復政策。因此意政府遂對匯水跌落及限制進口的各國取以報復手段。法國實施的對半製品及完成品之附加關稅，引起比瑞兩國的報復政策。美國對銅所加的新稅率，引起坎拿大，墨西哥，智利，祕魯等國激烈的不滿，後三國間更會商以對付美國的方策。而渥太哇會議的結果，更引起英美英日帝國主義間矛盾的激化。所以各國的資產階級口口聲聲反對保護主義，而實際上可以說保護關稅的障壁却愈加增高，而各資本主義國間的矛盾也愈趨劇烈。

危機迫切的非常時期

在一方對內作着保護政策的各帝國主義，一方對外又

瘋狂地作着強奪販賣市場的鬥爭。日本之奪取滿洲，各帝國主義對東歐南歐及近東之獲得支配的鬥爭，都使帝國主義的對立日趨激化。而特別是日本之強佔滿洲，更使在中國市場及太平洋上的基本的帝國主義對立趨烈。

深化着的世界經濟恐慌，各國間對立的增加，廣泛的勤勞大衆之貧乏，大事業大銀行之破產，保護主義之長成，農業恐慌之激化，生產力之日趨破壞，在這樣的情勢下，一般資產階級的報紙，資本家御用學者還在叫喊恐慌的終結，轉機即屆等等嚶語空談，真是滑稽到萬分了。統觀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確然地說，資本主義之部分的安定，已經告終；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之激化，已達極點；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各國階級的對立和革命的昂揚，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之干涉，以去年一年間醞釀最熟，現在這一切，都含着空前的危險性。而一九三三年，也就是全世界的非常期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二年蘇聯 經濟的發展

汪洪法

一 導言

戰後世界經濟的渾沌狀態，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間因各資本主義國的努力而恢復了。然而其經濟狀態將近於戰前的正常狀態時，於一九二九年第三期世界經濟的恐慌又襲來。資本主義本身因此次恐慌的影響至臨於崩潰的危機。加之蘇俄經濟的發展，實行投賣商略，於是資本

主義既得的市場，爲蘇俄經濟勢力所占據，更加強了資本主義恐慌的危機，而蘇俄與資本主義間的矛盾遂因此展開。

另一方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原因，不外於生產過剩，消費過少以及貨幣上的要因等等。所謂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缺乏市場致生產物不能完全售盡，消費過少是資本主義發展人民購買力減退必然的現象。而貨幣上的要因，是各國金融界不能調和，致有金的偏在或金的缺乏之虞。但是生產過剩與消費過少，是推進資本主義侵奪市場的動力，貨幣量於各國間的不均衡，則造成各國物價低落不定的現象。這種種情形皆是各資本主義國間相互衝突的要因。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能造成各資本主義國中間的矛盾。

這樣當此世界經濟恐慌，世界第二次大戰行將勃發的期中。於是有些學者以爲戰爭的導火線，將起自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又有些學者以爲戰爭的導火線，仍孕育於各帝國主義之間。這兩種論法，究竟誰最正確，不在本論文範圍之內。但是關於經濟上的鬥爭，我以爲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實立於對立的地位。

蘇俄自一九二八年開始了五年計劃，而這計劃着手實

行後，未到五年——即是於第四年——已見其計劃大部分的完成，而蘇俄的商品至出現於世界市場，於是身歷於恐慌得不着救心的資本主義，益陷於窘困。而資本主義成爲分裂對抗形勢的世界經濟，爲着對待其共同的敵人，竟至立於共同戰線。這樣在經濟上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的對立，已是不可隱避的事實。然而資本主義商戰的實力，能否隨着蘇俄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長久的相持下去，以及其長久的相持於資本主義本身將發生如何的作用，這是本論文要研究的。

二 蘇俄五年計劃及工業的發展

蘇俄原來是農業國，自五年計劃開始以來，遂一變而爲一流的工業國以追隨資本主義先進國爲目標而圖進展。

最近數年間蘇維埃經濟急激的躍進，與其餘諸國工業生產的急速的低下相並置，現在使蘇聯在國民所得及工業生產量上至占世界的第二位。昨年蘇俄的國民所得達三百七十八億盧布，突破了德國英國法國恐慌前的數字。

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調查，蘇聯在一九二八年工業生產量次於美德英法而居第五位，但在昨年七月已超越後二

者而占第三位。於八月蘇聯的工業生產額已經凌駕德國而進到第二位。在一九二八年蘇聯的工業生產額只當美國的十分之一。然在一九三一年已接近到美國的三分之一。茲將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表列之如次。

	1928年	1931年
美國	58.0	49.3
德國	15.0	12.3
英國	12.0	11.3
法國	9.0	11.6
蘇聯	6.0	16.0
合計	100.0	100.0

昨年末蘇聯木材及褐炭的產額占世界的第一位。石油與農業機械的生產占第二位，銑鐵與機械工業占第三位，石炭，鋼鐵，電氣占第四位。

施行五年計劃的三年之後蘇聯工業生產的增加率達於二二%乃至二五%。這種比率在恐慌前是超過其餘資本主義諸國得達到的比率。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調查，那自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五年間的平均增加率不出五%或六

%。這又比資本主義諸國曾經達到的最大比率較大，例如美國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代工業增產率的年平均不出八.三，在德國於一八八〇年——一八九〇年之間只達於八.五%。綜合德國景氣研究所及國際聯盟的資料看來，一九二八年以後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增加八六%，可是這期間其餘的世界各國竟亦減少了五九%。一九二九年由最高點減少的狀勢若依國別示之，則法國爲二〇.二，英國爲二八.五，德國爲四二.七，美國爲四三.〇。關於主要產業部門表示蘇聯世界生產額上的比率大體如次。

	1925年	1931年
全工業生產	11.8%	11.2%
電力	2.4	4.5
石油	9.0	14.7
石炭	1.3	5.1
銑鐵	1.7	8.7
綑鐵	2.4	7.6
銅	1.25	4.0

第一次五年計劃，是置重於電力開發與重工業的發展，

爲人所共知。昨年蘇聯的電力生產額占世界的第七位。在這電力生產額上蘇聯比之先進國是非常落後，但近年的年增加率，是在二五%乃至五〇%之間活動。然在美，德，英，法等國的增加率不過四，五%。以電力發生急激的增加爲基礎而蘇聯工業的電化正有顯著的進步。工業電化的比率，自一九二六年度的四七，七%到昨年昇至七〇%。美國的工業電化率爲七五%，蘇聯增加的比率雖不及美國，以其本年的程序，要能完成百七十億基羅時，則蘇聯於電力生產上亦至第三位或第四位。在電機器具生產額上蘇聯由一九二八年的第七位於一九三一年得在美德英之下而居第四位。但於今年中有達到第三位的希望。

在銑鐵鋼鐵的生產上昨年蘇聯次於美，德，法而居第四位。昨年最後的數月銑鐵的產額竟超過德國。若示最近三年主要國的鋼鐵產額則如次表。

世界鋼鐵生產(單位百萬噸)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同上對於1929 年的比率
美國	57.8	41.6	27.0減	53.3%
德國	16.2	11.5	8.3減	48.9

法國	9.8	9.4	7.8減	20.4
蘇聯	4.9	5.6	5.34增	9.0
英國	10.1	7.6	5.26減	48.0
比利時	4.1	3.3	3.2減	22.4
其他諸國	19.1	16.5	13.3減	30.4
合計	122.0	95.5	70.2減	42.5

如上表所示除蘇聯而外，一切的國家，一九三一年比之一九二九年生產的低下特大。只有蘇聯這二年間鋼鐵產額增加九%。銑鐵產額增加一四%。這樣在一九二九年蘇聯的鋼鐵產額只占世界的四%，但於去年則占七.六%。去年蘇聯鐵鋼業的成績雖未能如預期的進行比其前年稍有退步，但是決不像其他諸國後退急速的趨向。其他諸國生產額的低下，主要的是基因於鎖閉或限制為一般恐慌之結果的鐵工場，而蘇聯減產鋼鐵的理由，是因為鐵道急速的發展，不斷應着工業需要增加，以及實行舊式鐵工場大規模的改造，致無暇於作業的關係。本年為着排除運輸上的困難講求特別的手段，並且舊工場的再建工作亦完成，加之馬克列度古斯庫，克茲雷自等巨大的新工場開始操業，而鋼鐵生產額一

舉能增加七五%。本年的預定生產，銑鐵爲九百萬噸，鋼鐵爲九百四十五萬噸。假如這種預定成功，那蘇聯將駕凌德法而到達世界的第二位。

關於石油生產額去年蘇聯代替伯奈茲焉拉而達第二位。伯奈茲焉拉的產額，向一一八百萬哈帶爾(一三%減)低下，反之蘇聯的產額却由一二五百萬增加到一六一.九百萬哈帶爾(二九%增)。於一九三〇年美國的產額尙爲蘇聯的七倍，但於一九三一年則爲五倍，假使能行本年的計劃程序，那蘇聯的產油額約爲伯奈茲焉拉的二倍，與美國比較則爲其三分之一。

蘇聯的石炭產額是五千六百萬噸，由一九二八年的第六位昇到第四位，超凌法國的產額只亞於美英德等國。

至於機械生產由機械生產全體看來，蘇聯去年居世界第三位，由農業機械的生產看來，其昇於第二位機械生產的增加率，非常顯著，要以去年與一九二五年比較，則在農業機械方面爲九倍，在工作用機械方面爲一六倍，運貨汽車八八倍，汽車二八八倍，但在機械製造工業全體方面，則有八倍的狀態。去年蘇聯的工業機械產額比其前年是有四〇

%的增加，可是在美國有二八%在德國有三〇%劇急低下的情勢。運貨汽車的產額比其前年成了三倍（由一二，七〇〇台增到四一，二八〇台），但在美國減少了五〇%以上。美國德國及其他諸國機械生產的減少，假使沒有蘇聯的預約購買，那將有更急速的趨勢。事實蘇聯為第一位的機械輸入國，獨占世界機械貿易的二成乃至二成五分。國內產額雖顯著的增加，但蘇聯經最近將來的相當期間，將必停止其為世界上最上的工業機械購買者。關於蘇俄工業最近的發展，我們為使讀者便於明瞭起見，再附表於次。

	單位	1928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的預定
發電力	百萬基羅	1.88	2.95	4.06	5.60
電力生產	十億基 羅時	5.00	8.23	10.60	17.00
工業生 產合計	十億盧布	14.75	23.06	27.92	35.40
生產財	同	6.36	11.43	14.05	
消費財	同	8.39	11.63	13.87	
石炭	百萬噸	35.8	47.1	57.6	90.0
石油	同	12.3	18.6	23.1	28.0
鐵鋼	同	3.4	5.5	4.9	9.0

粗鐵	同	4.3	5.8	5.4	9.5
銑片	同	3.5	5.0	4.1	6.7
汽車	台	680	8,500	20,500	73,000
運貨車	台	1,490	12,700	41,280	82,000
磷酸	千噸	151.4	354.7	521.6	
銅	同		47.5	53.0	100.0
亞鉛	同		4.7	11.4	28.7
鉛	同		10.8	19.6	46.4

三 蘇俄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概要

我們由前節看來可以知道蘇俄工業的發展，給與了世界工業先進國很大的壓迫，歐洲的工業國已將不敵，為資本主義之王的美國，亦現出了淒涼的意氣。第一次五年計劃出乎預期之上收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最宜注意的一事，就是現在的恐慌踏入資本主義工業，致其自行後退，給與了蘇俄工業活躍的機會，結果相互勢力的均衡使後者非常有利。資本主義工業假使以恐慌前的步調發展，那蘇俄縱然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只不過允許蘇俄為歐洲第二流工業國的地

位。這種事實爲蘇聯當局者所公認，但是他們決不以此爲滿意。他們着手第一次五年計劃，在第二年決意把預定五年完成的原案改於四年完成，更準備自明年繼續第二次五年計劃。這第二次五年計劃之目的，是在超越資本主義發展其社會主義經濟的威力，同時矯正第一次五年計劃仰求外國很多援助的弱點，築成強固的自給的社會主義工業之基礎。這第二次五年計劃，是資本主義工業上最大脅威的計劃。在蘇聯的組織上以五年乃至四年爲一計劃期間，更於每年決定詳細的生產計劃，而和資本主義國的預算施行同樣嚴的實施這種計劃。一年間的生產計劃叫做統制數字，古斯勃南委員會提出原案在蘇維埃大會中決定。故由明年實施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次的統制數字，是在本年十二月的大會確定的，同時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全面貌亦纔出世。在本年蘇維埃各種的計劃委員會，爲着獲得計劃原案而忙於實行科學團體，生產機關，消費組合，黨代表等等的總動員。他們多忙之結果作成了這第二次計劃的概念。

(1) 工業生產額：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原案中，預定完成後的工業生產達於着手前的二倍三六。在第二次計劃中

預定一九三七年的工業生產數字至少爲一九三二年的二倍半。據一九三二年的數字，那由同年的三五四億盧布於一九三七年爲八八五億盧布，雖如美國今後縱然得脫却不況，亦不過非常接近這種數字。第二次計劃與第一次計劃比較，而後者是置力於生產財的生產（特別置力於重工業），消費財的增產，是沒有二義的大體設定同一發展的步調。在第二次計劃，據說亦使消費財大體成爲一九三二年的二倍乃至三倍。但是大體看來，最先是抬高工業化的重工業及化學工業的擴張步調。銑鐵由九百萬噸到二千二百萬噸，這固然無甚稀奇。但是石炭的生產由九千萬噸一躍而爲二億五千萬噸，得着次於美國而不可動搖的第二位。石油由二，三一〇萬噸增到六，九三〇萬噸，這足與美國爭勝負。雜金屬的銅，亞鉛，鉛等的出產量以自給自足爲目標大行擴張。在機械生產中預定向三倍乃至三倍半的膨脹，故於一九三七年，使其價格達於二百億乃至二百四十億盧布的巨額。化學工業預定以供給農業上化學肥料的目的大加擴張，化學工業在蘇聯的發達雖甚遲緩，但其基礎是與今後大發電所的着手相關聯。

蘇俄工業與資本主義工業比較上的特質，就是蘇俄有

大綜合的工業托辣斯，以所謂工業聯合的形態，把製鍊業，化學工業，電力，機械製作等相互關聯的各種產業集中於一所。第一次五年計劃，在此意義下集中全努力於多列普羅斯退與馬克列度古斯庫的完成。第二次計劃建設的中心，是武拉爾庫茲雷自的聯合。於是建設大發電所開發蘇俄第一寶庫的武拉爾，實行採取石炭，鐵及銅的精鍊，機械製作。發電計劃中最大安加拉河的開發，仍然使於此地出現為銅，鐵的一大製鍊工業都市，電力生產為第二五年計劃的主要力點，預定於一九三七年有一千億基羅時的生產。於瓦耳加河設兩個大發電所。前記安加拉的發電所要完成，那其能力為四百八十基羅瓦特為世界最大強力的發電所。現在多列普羅斯退有世界最強之誇，但安加拉的強力則相當於三十個多列普羅斯退。因此發電價值非常低廉，預定以此低廉的電力製造七百萬噸的鐵，四十萬噸的亞硫姆，十萬噸的銅與亞鉛，六萬噸的鉛，十萬噸的人造橡皮，二百萬噸的液化石炭，一千四百萬噸的木材，二百萬噸的紙，百萬噸的硬土。但是到這偉大安加拉斯退的完成為止，是須要將近十年的時光，故須達到第三次五年計劃的終期。更在發電計劃上又有開

發西伯利亞的計劃，把重工業中心移到武拉爾，欲以西伯利亞的西北部為開發的根據地，而西伯利亞沿海的面目，將因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完成而一變。

(2)農業生產：第二次五年計劃的農業綱領，是傾力於增加工業應用的農產，希圖家畜的增產，在穀物生產上是力求收穫量的向上。工業用的農產中棉花與亞麻預定二倍的增產，砂糖預定增產三倍，家畜乳製品現在的蘇聯因為最感缺乏，故新設國營的專門牧場，命令從來的國營農場，共營農場皆擴大飼養肉用動物。穀物的增產並不停頓，是有於一九三七年到達一三〇百萬噸的方針。第二次五年計劃最注重農業的機械化與集約經營增設運貨車站，使化學肥料配給的增加。

(3)交通運輸能力的擴張：蘇俄工業急速的發展因運輸設備落後，很多的計劃不能實現。於是第二次五年計劃，首重於鐵道運送力的發揮。據說將有一萬五千乃至二萬英里的鐵道的改造和新設。並部分的着手電化，計劃以列車運轉豐富的原油和酒精等燃料。

四 與資本主義對立中蘇俄經濟的 優點與弱點

上面關於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功績以及其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概要說過了。現在我們的論題，要轉到蘇俄經濟的發展，將於全世界經濟有何影響。

與蘇俄經濟對立的很多資本主義經濟，由靜的觀點看來實有莫大之勢力。由物的資源上說，由人的生產力上說，美洲大陸與大英經濟同盟，實能與蘇俄經濟相匹敵。蘇俄經濟雖在發展期中，但是美國的富裕，仍然加乎蘇俄之上。不過美國之富已到不能發展的窮途，而英國的經濟力量，是由分散的殖民地而成。這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覺悟，已是逐日的增多，於英國經濟力的發展上，早成絕大的妨礙了。而蘇聯農，鑛，工的諸資源是很豐富的存在。近年很多的調查隊忙於調查，而石炭，鐵鑛雜金屬等的新發見屢有所聞。這又是蘇俄經濟發展上最好的象徵。

由動的觀點看來，蘇俄經濟伸展的步調，已如前說為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及。這種經濟發展的祕密固可說在於統制

經濟，但再進一步的說明，就是蘇聯國民的所得，與各資本主義國家任何個人自由的消費，只以一小部分爲着擴張生產而投資的不同。在蘇聯國民的消費有定量，而每年的國民所得中大部分復集中國家之手爲擴張生產而投下的。若例示一九三二年的統制數字，規定國民所得爲四九二億盧布，而其中投出爲資本的，有二一一億盧布，卽是其國民所得的六成弱爲個人消費和政府經費而消耗，其四成強爲擴張再生產的財源。在資本主義諸國所謂國民貯蓄對於國民所得的比率，假定一成那其九成是因個人的消費了。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怎樣焦灼，要不能統制國民所得，單外形的阻止蘇聯經濟的成長力，是所謂不可能。資本主義國家只以國民所得的一成而投資，有時向自國以外的外國投資，一旦恐慌襲來，那過去所投的生產資本則停止活動，遂致不產生國民所得。所以若取戰後十年十五年的期間，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步調年平均只有三乃至五%前後的遲緩。但是現在及最近的將來蘇聯經濟的高發展率今後亦將漸次緩慢。大概蘇聯雖完成某種程度的工業化，但其後國民所得的消費率亦提高的關係。

蘇聯經濟的發展，雖有很多優點，但再詳細的論來，其本質上亦有很多弱點存在。大概蘇聯的生產，因為是大量生產第一主義，故其品質較劣。蘇聯當局這四年間全力圖增產的，是鐵鋼，石油，木材，穀物等等無須技術種類的工業。必要的工作設備全待於輸入品，是徹底的實行了美國式機械萬能的大量生產主義。化學工業在蘇聯是非常落後。職工的生產率甚低亦是公認的事實。這種理由是因為職工缺乏技術的訓練。各國今日有數百萬的失業者而蘇聯却感工人的不足，這證明在產業上把無經驗的人們吸收到高度工業。能率向上問題於國民工業教育普及上有密接的關係。蘇聯的勞働者技術教育問題，是最困難的問題，雖有速成職工學校，無線電講座，專門學校學生的實務勤勞等的努力，還不能謂為滿足。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很少受如資本主義諸國，營利觀念的刺戟。這一點蘇聯當局固然是否定的，但是保工賃銀制的復活，即其反證。

為着使農業發展如何隨着工業發展的問題，是蘇聯存在的獨特問題。工業勞働者與農民性質的不同，使蘇聯當局取了農民善導主義。以貸借農具種子提供信用等等的便利，

個人農民組織了共營農民。但只因此未能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因為消費的限制，農民對於增加生產是消極的。假使農民充分的勞働，政府減低農產品價格而提高工業品價格，那農民之間就起不平。蘇聯的工業與農業之對立，實使政府無上的煩惱。第一次五年計劃這種問題未能解決，恐怕第二次第三次五年計劃亦感着解決的困難吧！

五 結論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第二年，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現出了恐慌。這種恐慌給與了兩經濟的對立上很複雜的影響。在本文前兩段說到社會主義的前進，資本主義的後退，在世界經濟內部急傾於前者，由蘇聯方面看來不可不說是成功。但是隨着世界恐慌的深刻，隨着蘇聯工業的前進，資本主義世界在商品上各方面皆蒙障害。投賣商略，宣傳勞工，於是歐洲各國遂組織經濟同盟提高關稅，禁止蘇聯商品的輸入。以為因恐慌世界價格的低下蘇聯的商品價格亦低落，是對於蘇聯不利。可是另一方蘇聯購入了機械一類價格低廉的材料，並得容易聘請優秀的外國技師及熟練工。世界市場縮

小，釀成了蘇聯的商品向世界市場侵入尖銳的空氣。他方面蘇聯的購買預約，為各國爭先恐後的歡迎。因之對蘇俄終未實現其經濟封鎖政策。蘇聯購入的各種大型機械電動機，精密機械，船舶等，最近因國際關係的複雜，致預約方向的轉變，遂使先進國陷於痛烈的恐慌狀態。

蘇聯的貿易國營在與資本主義列強的商戰是最大的武器。其投賣商略在世界市場，竟使了資本主義恐慌無結束的時期，然如本文第三段所述，假使蘇俄於第二次五年計劃樹立了社會主義之經濟時獨立，停止由外國機械等的輸入，更以投賣商略代替其革命的宣傳，那資本主義經濟的前途，將必有更進一層的危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二年之中國經濟

澄 宇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經濟承上一年凋敝之餘，繼續的衰敗。首先是滬戰的破壞，其次東三省被日本佔領在中國發生的經濟影響已漸漸顯著。政府用各種加捐加稅的手段，使失之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取償於人民。本年秋季，幸逢各地豐收，於是農村問題又趨嚴重，因為穀賤傷農，豐年成災。這一年的經濟現象頗值得我們的研究，因此可以窺視中國的政治前途。茲分敘於下。

一 滬戰之損失

一二八的砲聲與繼續一月餘的戰爭，毀滅了整個區域的工商業，尤其是閘北江灣之新興工業。據事後的統計，上海戰爭中我們的損失“爲十五萬萬六千萬元，較之去年水災損失超過三倍有餘。工業受影響最重者爲繅絲業，針織業，製革，化裝，玻璃，搪瓷，製藥，及印刷業。此等小工業爲國貨工業之基礎，因金貴銀賤及國人採用國貨關係頗見進展。”由此看來，一二八的日本的轟炸上海，不僅是爲了撲滅抵制日貨的運動，而且也順帶地摧殘中國的國貨工業。

由於上海戰爭的結果，上海失業工人數合計二十四萬人，“四月中旬各廠家均縮小範圍暫行復工，工人及機器復工者占三分之二，完全復工者三分之一。”上海戰爭亦影響於別地方的工商業，比方天津亦因滬變發生，實業不振；山東在滬戰起後，銷滬之煤五六萬噸不能運往，煤商每月損失數十萬元，各礦開多停業。“景德鎮……號稱產瓷工業區，工人二十餘萬……年來市面亦漸恢復，乃滬戰發生，金融阻滯，該鎮瓷業因又大受影響，祇平津香港等處有少數瓷客

餘多裹足不前，於是該鎮工商業遂無形停頓，全市經濟困難益臻極點，教育實業各項經費來源皆無着落，商業是附麗於生產的，假使生產停頓，商業當然亦受影響。以上所舉的不過是三個例，其實受上海戰爭影響的，又豈止三處？此外，對外貿易當然亦因受影響而較前衰落。

二 東北損失後之經濟影響

自日人佔領東北，成立滿洲傀儡國以後，東北在經濟上已不是屬於中國的單位了。在東北的中國鐵路，工廠，礦山，銀行，航業，都為帝國主義所沒收，此外中國在東北的稅收，如關稅每年約四千萬元，鹽稅五百萬元，郵政四百萬元等等都先後為傀儡國的政府所截留。這一切財產及稅收的損失，總計在十八萬萬元以上。中國損失了這些財產和收入，但是中國所負的由關鹽稅為担保的內外債，現在決不因失去東北而有所未減。中國政府特別克己，假使日本有理由截留東北的關鹽稅，則中國殊無理由可以停付對日本的賠款與債款。中國政府從那裏找款項來填補這種損失呢，當然不外乎傳統的老法子，“取之於民”。“關稅被劫，外債賠款之担負

將加諸吾人頭上”。所以今年以來中央和各地方都增加了許多捐稅。

東北損失後我們所感到的第二影響是北方諸省的鴉片專賣。據申報四月的天津通信：“在前年皖豫鄂等省開放煙禁設局徵稅之時，北方利慾之徒心甚健羨，一再運動鴉片公賣，顧張學良表示反對。……不料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服從不抵抗命令陸續撤退入關不下二十萬人，從前餉源……由遼吉黑冀察分担，……國難既作，……遼吉黑三省為日軍所踞。冀察兩省自裁厘後，省庫收入銳減，雖以營業產銷等稅抵補，亦僅及從前厘金三分之一。政教建設等費均已不敷，今驟添一二十萬人軍餉何能担負？……於是各關機祗有減薪報效之一法，初則發八成薪，繼則發八成之八成，以每月二十元之錄事書記每月實領十三元，個人食用尚且不敷，何能贍養家室？然雖如此緊縮，而節餘之數猶不敷軍隊之膏火，以致欠餉數月，責難紛起。……冀省……因亦進行鴉片公賣，……每年徵稅預算能達三千萬元。”

第三影響是對外貿易中之損失。去年滿洲輸出總額為三萬二千二百萬兩，占中國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一。此外滿

洲輸入中國的貨物約一萬四千餘萬兩，這些貨物現已不屬於中國而要當作外國貨一般的輸入中國了。所以中國共損失四萬七千餘萬兩。我們再看中國對滿洲的貿易，只舉一例來說明，如南通海門一帶紗布運往東三省者年可二十餘萬疋。賴以生活者六十餘萬人，九一八後銷路絕跡，失業人數激增數十萬人以上。關外現依賴洋貨或日貨的進口，而中國的貨品幾全絕跡。

第四影響是關外移民之減少。申報十一月的通信說：“本年山東經濟衰頹，原因雖多，而東北失陷亦其最大原因。蓋魯人每年赴東北開墾者甚多，每屆年終，輒將一年辛苦所得，攜帶歸來。津浦膠濟兩路特開小票車爲之運輸。郵局匯兌亦極忙碌，雖無統計，大概不下數千萬元。去年先之以萬寶山案，繼之以東北陷落，在朝鮮及在東北之山東人多被驅逐歸來。不待東北郵局封鎖早已不見東北匯款。津浦膠濟兩路惟見鳩形鵠面之難民，不復見發財還鄉之魯人。此又東北失陷影響於魯省之重大者。”

以上四種影響，我們不能說已包括盡了東北失去後對於中國之打擊，但我認爲中國財富之減少，頗足以引起社會

的大變動。而且這些經濟影響經過時日愈久，人們將愈感覺其尖銳的。

三 一年來之中國金融

一年來的金融狀況是怎樣。首先，由公債自今年整理後，跌價甚鉅，從前值七八十元之裁兵公債，現在只值四十餘元。在一二八以後，上海的地皮跌價亦大。過去上海之金融膨脹，多半為上海之地價昂騰和公債證券之上漲所引起。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後，公債與地產已不能視為生利的投機事業，不能吸收很多的資本，於是資本減縮，紙幣減少，物價下落，生產衰敗。過剩的資本成為游資存放於中外的銀行，不能投於生產事業。但是假如國內公債和地皮生意買賣清淡，海外公債市價却有上漲的現象，這是因為“國內銀行界或資本家鑒於投資內債之多所顧慮，遂從事於海外公債之收買。於是倫敦之中國債券市場為之蓬勃有生氣，亦即上海證券市場交易數量所以迥不如前。內國公債市價始終站在四折上下”。銀行對於公債和地產的投資最熱烈，雖然本年來有人極力提倡改變方向，投資於工商業，尤其國貨工業，

但這是不多見的。中國的銀行與工商業之關係，反不及錢莊與工商業關係之密切。

本年終最可注意的是大批現洋運往滿洲國，前後陸續裝去的有二三千萬元。九月二十五日申報載：“東北自被日寇強佔後，日人暗託奸商，吸收現洋，去年（按即指一九三一年）十一十二兩月內曾由滬運往大連牛莊等處現洋約近千萬，致市面頓受影響，後被當局覺察，遂令海關禁止。”但是本年十一十二兩月的運現往東北變成合法化了，只是奸商變成幾家大銀行。運現赴東北是因為被滿洲國的利誘所動，“偽國對現銀不准出口，用各種方法儘量向津濟滬各地吸收。”因此這種運現是“損我實力，助長敵愾”。但是銀行界含混地解釋說，這是“純粹營業上關係”，“此項運到之現款仍散於農民之手，一轉移間仍由旅東農民悉數攜回關內”。可惜牠沒有說明這一現款怎樣的“轉移”到東北農民之手。是收買東北的農產品嗎？這是今年豐收的中國所無須的，是支付農民在關外中國的銀行的存款嗎？何以不直接匯往直魯豫，必須運現往東北，由所謂農民很笨的而且是冒險的攜帶回籍呢？這樣的說法只是掩飾銀行界為牟利而接濟帝國

主義。資本家是不知道愛國的，尤其是金融資本。而且銀行家何以這次特別有愛於東北的“農民”，而對於本國農民從不一謀救濟呢？

四 一年來之對外貿易

去年一年對外貿易的特點是：第一，入超激增。假使去年的對外貿易入超爲五萬萬二千萬兩，已爲歷年來之最高數，則今年上半年入超已在三萬萬八百萬兩。由一月到十月，淨輸入額九萬萬海關兩，淨輸出額四萬萬二千萬海關兩，淨入超已達四萬萬八千萬。依據此比例推算，今年入超總計至少在六萬萬二千萬海關兩以上。去年的四月上海的對外貿易，純自外國輸入之進口貨，共值關平銀五千四百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一兩，而輸往外國之出口貨及復出口貨祇值關平銀九百五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十七兩，“相差竟達五倍之多，大可驚人。”在這種鉅額入超中，我們看見真正貿易並未增加，就上半年出入口貿易的情形看來，反比較上年要減少，約減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至於入超抵補，則靠華僑匯款，外國教會對華文化投資及外國駐軍和僑民

在華消費三項，爲數亦達三萬萬五千萬兩左右。就出入口種類說，據上半年之對外貿易分析，入口以製造品最多，飲食物及煙草次之，原料品又次之。出口以飲食及煙草爲最多，原料品次之，製造品第三。但是就個別的分類說，五谷類入口占第一位，表示農產品輸入日漸增加。北方本年洋米進口較去年爲增加，僅上半年進口之數，六九，七五四，〇三六兩，已超過上年全年六四，三七五，八五一兩。其次爲棉花，本年前六月統計，較上年同時期增七十萬担。因爲紗廠多用美棉，日廠且排斥華棉不用。入口占更次要的貨品爲液體燃料，棉貨，糖類，粉類。中國的出口，以雜糧爲最多，出口的棉花均爲粗絨，本年出口往各埠的，比去年要低落數倍，出洋之數當更爲低落，出口銳減原因爲產量之下落。機械的輸入九個月的總值爲二千三百萬海關兩，比起同時期輸入八萬萬二千五百萬來，還不到百分之三。機器進口之數渺小的原因爲“國貨工業資本薄弱；原料來自關外，設備不完全之小廠增加，外廠競爭，尤以日本在華添設雜貨工廠爲國貨工廠之勁敵，國外市場衰退，外貨充斥。已營者不敢擴充，未營者不敢從事經營”。“吾國仍留於輕工業，甚至手工業時代”。

我們再看中國對外貿易中各國所占的貿易額的對比。據東方雜誌所引，“今年一月至九月幾個月來美日英輸入中國的貨值情形如下：

	貨值(海關金)	百分數
日本	102,264,000	14.17
英國	81,772,000	11.33
兩共	184,036,000	25.50
美國	186,351,000	25.83

“美國輸入中國的貨值比英日兩國輸入總值還多二百三十一萬五千海關金。……據美領事館統計，今年九個月美國對華貿易總共計值美金四，六九一，四七九元，較之去年同期的一五，二〇七，四一三金元，實減少一〇，五一五，九三四金元，即百分之七十五”。由此更足以證明我上面說的本年的真正貿易(以金元計算)實較小於上一年(一九三一年)。

假使對外貿易進口以美國為最多，日本次之，則出口方面以往日本者為最多。

一年來的對日本貿易證明在現在的政制之下，抵制日

貨並不能持久和不能阻止日貨的源源湧進。本年只是在一二兩月滬變期中，日貨進口減少，三月份增至一千三百餘萬兩，四月份復增至二千萬兩以上。八九月以來“日本更厲行傾銷政策，日貨遂潮湧而來，復橫行於我市場。即以煤炭一宗而言，自六月即開始傾銷，撫順之煤……以每噸六兩餘甚至五兩之低價向上海及漢口傾銷，每噸且須蝕本兩餘，最近更有每噸低至三兩餘者。以此與我資金薄弱，而運費捐稅極高之國煤相競爭……煤之市場遂復為其所壟斷。據海關統計……上海進口日煤……九月份為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噸，比八月份竟激增百分之四十五……其他如紗布，紙，絲，水泥等貨亦無不如是”。“八月份日紙進口又佔第一位，雖萬寶山，九一八，一二八以後日商紙業一落千丈”。這是因為瑞典美德英各國紙售價過昂，而日本因離市場近，運費低廉，所以在本年洋紙進口類中，日貨佔十分之九。“紙業向為大量生產，產量多寡與成本關係殊微，過剩紙品即使定價低於國內市價甚至不及成本，亦願傾銷於外”。這是說明日貨之所以能傾銷的原因。此外日本在中國的紗業，航業也逐漸恢復起來了。

我們在上面既說過中國的大量入超，但是在本年，抵補入超的華僑匯款，比方說，將由一九三一年之一萬八九千萬元減至一萬萬元。其他外國對華文化投資及工業投資也沒有顯著的增進，我們將怎樣解釋入超比前年還激增的現象呢？據申報記者的估計，由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十一月，上海各洋商銀行之庫存增加了銀兩六千二百萬兩，銀元二百萬元。此種增加多半為貿易入超結果流入外人手中之現金，由內地人民付進口洋貨之代價，而“因出口土貨之無人過問，流入上海之金錢無由再流向內地，同時更以充國際間付款之用之黃金，歷年輸出搜括殆盡，此流入上海之現銀，遂無法換取黃金捆載以去，乃遂留滯此間而成爲外人在洋商銀行中之存款”。

由入超一變而爲外人在洋商銀行之存款，再變而爲外人在華之投資及債權。匯豐銀行對京滬鐵路之放款，外國銀團對上海市復興公債之承受，中國營業公司對於招商局四棧之受押，以及一九三四年美商以八千萬兩收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電氣處，年來日人紗廠之擴充與各種外人經營產業之創設，這些都是外人利用入超所聚積的金錢來更

進一步隸屬中國的產業和奴役中國的人民。於是這些入超實際就變成了一種賒貸，仍須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孫勞動來清償的。而且本年的特徵是，這些由入超變成握於外人手中的存款，投於直接生產事業者少，而多半是“用向收押中國企業，賣買各種有價券……以及地產事業之經營”。

五 一年來中國之農工商業

A. 農業 今年米麥全國都是豐收（例如湘產米額增一千多萬担）。棉花的產額本年全國亦為豐收。去年全國生產計棉五百五十二萬四千担，今年為八百二十三萬三千担，比較過去幾年的產額都要多些。至於蠶繭，今年在江浙的飼額，只及往年的十之三四。且繭價異常跌落。這是關於農業的情形。至於農業豐收與農產品進口激增的矛盾現象，農產品跌價問題，我們在下面專章討論。

B. 工業 1, 麵粉, “今年各埠麵粉廠均陷於僵局, 原因為去歲水災影響, 農民種麥都被淹沒, 致磨粉之小麥不能不仰給於外埠輸入。成本提高而售價則因美粉擠軋, 反而低賤。二為捐稅太重, 致外粉源源輸入, 無法遏止。又日人對於

麵粉業最近已在津籌設一資本千餘萬元之大麵粉製造廠，欲第一步打倒滬方麵粉廠，壟斷華北市場，第二步侵入華南市場。”

2, 絲業 中國每年產絲五萬餘包。江浙佔全國總產額二分之一，質量俱較優良。蘇浙滬錫各埠絲廠共一百七十八家，絲車五萬餘部，上海有一百十三家，絲車二萬六千部，職工七萬人。前年冬因收束停閉了十之八九。中國絲的品質不齊，成本大於日絲十之二三，因繭價高昂，纒折奇大，拆息捐稅負擔奇重。絲在本年的產量約計僅及上年十之三四。一方面因為外洋交易盡為日本所侵佔，生絲與人造絲競爭亦烈。另方面亦因為人造絲之傾銷於中國，中國不加抵制。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日絲亦傾銷於中國市場。

本年前六月生絲出口為一三，五一五，七五一海關兩（包括有絲價跌落之成份在內），上年全年出口為八四，一七六，八〇九關兩。自五月至九月江浙滬各埠絲廠一百七十餘家因為歐美絲市需要大增，本年我國春繭收數不敷，且繭價空前低落，折合絲本仍尚有利可圖，所以紛紛復工。但九月間，絲市又跌。廠商不敢多生產，只抱現進現出主義。據說

近來上海的絲市交易每日祇有幾包的交割，可謂衰落異常了。

中國絲的輸出，上海占十分之六，廣州占十分之四。廣東以絲廠業不振，直接間接失業者達七十萬人之多。如順德停業絲廠，資本損失共千餘萬元。昔日桑葉每担值十元五元者，今僅值數角。農民人口一百萬，半數從事蠶業，售出之價不及全值十分之二，失業女工已達二十萬。

政府爲了救濟絲業，曾議決停收生絲出口稅及特捐，給補助金每担現銀百兩，但是絲業並不因此而有所恢復，根本問題是在沒有市場。

杭州絲綢業在民國二十年爲三，八五八家，職工三〇，一二四人，營業總額爲三九，九四九，九〇〇元，今年家數和人數減少百分之三十。

3. 紗業 一年來紗業常是在銷路遲滯的過程中。雖然紗錠有些增加，但許多是曾經停過工的。據申報十二月九日的紀載說：“邇來紗市之不振，消費之沈寂益趨深刻化。紗銷滯鈍之最大原因約略述之於下：(一)國內農村破產，鄉民購買力大弱，(二)金融緊縮，商業殊難發展，(三)日商在各方

賤價競售，用傾銷手段漸漸侵入華紗之銷區，因此上海華廠之紗無法推銷，囤積日厚。據調查本埠存紗約有七八萬包之巨，有一部份廠方深感困苦，又成花貴紗賤之局而提議停止夜工之說甚囂塵上。就目前花價論之，廠商稍有虧耗之苦。”

八月的二十支八鐘現紗每件一六四.五兩，而陝西棉爲每擔三十四兩，十一月紗價跌二十兩零二錢半爲一四四.二五，花價只跌二兩七錢半而爲三十一兩二錢五。“每件紗需用花三百五十斤，合計銀一百十二兩，再加生產費以及開繳等費四十兩，每件棉紗製成總計銀一百五十二兩……目前市上現售……一百四十四兩，廠方須虧折七八兩。上海華廠共計二十八廠，紗線錠子一百〇六萬六千九百二十枚，每日日夜工生產紗線全年計六十萬四百四十件（即每月五萬件），每日產一千七百件。……上海英廠錠子有十七萬〇六百十枚，全年可產紗五萬包。日商在滬共有三十廠，錠子計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一百枚。全年產紗線四十九萬。五百五十一件，內中紡細紗線占多數。”華商紗業一九三一年的發展，係受抵貨之賜，同時美棉銳跌於運用原料上頗得利益。但是在本年六月中紗價低降，開向來稀有之低價紀錄。

4.航業 本年一月至六月全國各埠進口船隻不過三一
九四四隻，二三，九七〇，七六六噸，去年爲一八一，六〇〇
隻，一六〇，〇〇五，一〇〇噸。“長江一路本年一二八戰事
後，受金融停滯，客幫止辦，再加上年水災，民間購買力薄
弱，益以川戰發生，上江來貨阻斷，進口貨亦大減，滬上去貨
銳退，遂使長江綫內國輪營業一落千丈。曩時每輪往來開行
一趟，所收運貨水脚常在一萬元許，今則祇收二千元，殊
不足償燃煤之費。……長江國輪……各輪均告虧折，無一獲
利者。……今年長江航業之清淡，爲數十年來所罕有。”（十
一月九日申報）

5.紙業 “紙廠集中上海，今春上海戰事發生，紙廠類
多停頓，即使繼續開開，因交通困難，需要減少，產量因之頓
減，與去年相較約減少百分之八十。洋紙傾銷實爲致命打
擊。”他如火柴業亦受瑞典公司傾銷的影響，華商與之競爭
無效。

C 商業 商業是建立在工業農業的活動上面的，假使
中國工業農業如此衰敗，內地的商業當然亦異常蕭條。在去
年洪水及日佔東北後，武漢工商業減少百分之八十。“漢口

自遭水災後，百五十家錢鋪中至六月止倒閉已有三分之一。……據武漢警備司令部之調查，自二月以來，武漢三鎮中計雜貨店之歇業者八十四家，棉布商七十九家，紙業六家，印刷業六家，人力車行三家，輪船公司三家，運送業六家，工廠十六家，外國雜貨貿易商八十三家，木工業二十餘家，鐵器業十八家，米谷商五十八家，五金商一家，合計共三百八十八家，其中十分之八為日貨貿易商，因排日之結果完全倒閉。又據最近各方之調查，漢口市內共有商店一萬四千戶，經營日貨而破產者達四千戶。如最繁盛之中山路民生路，今已蕭索不堪。”（見六月的大阪每日新聞）由此我們看出中國的商業與外貨結合之深。我們再看日本報紀載天津春季之日貨貿易說：“內地批發貿易且較前為盛，因購買力非常增進，以前年與昨年天氣順調，農產物豐收，農民之購買力自亦大增”。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在現在的經濟關係之下，外人的傾銷和壓抑中國工業的發展，即使是農產物豐收，亦是有利於帝國主義，而非有利於中國工業。此外蚌埠蕪湖等處商業因放債不能收回，故虧折累累，杭州市政府調查，本年商店倒閉達五五一家，店員失業四，五三二八。“南京各業向賴錢莊放款，

用資周轉，錢莊因有銀行接濟，故能轉貸商號。今則各銀行迄未放款，極力收縮，錢莊對商號自亦無法以應”。“歷年當此時期（九十月間）正是市面興盛之時，銀洋需要本應暢達，今以種種關係購買力大衰，內地商貨大半滯銷，銀洋用途仍未見旺。”

以上所引係表現國內商業本年比上年衰敗。但入超則增加，我們可以用以下的假設解釋這種矛盾：（一）真正貿易減少，即進口貨物的實在價值減少；（二）帝國主義商品的傾銷，擠倒了中國的一些工業，商業的衰落與生產的衰落相適應；（三）供應富人需要的奢侈品進口增加；（四）商業有集中的傾向，首先集中於幾個大都市，其次集中於更少數大商人之手。但是這四個假設我們還須要待之於將來搜集材料以爲證明。

六 廢兩改元問題

中國的幣制紊亂極了，甚至有人說中國是無幣制的國家。銀元在中國不是貨幣而是貨物。中國自一八五六年採用銀兩爲貨幣單位，交易遂以銀兩爲標準。銀兩最盛時全國有

二百餘種，因為環境關係和自然趨勢歸於淘汰，所剩的寥寥無幾，有規元（上海），行化（天津），洋例（漢口），公砵（北平）的分別，因為牠們的重量和成色不相同而價值各各不同。因此“各地銀兩的兌換，與英法間，德奧間，日美間之外匯不相上下，因為這些國家同樣是金本位，所不同的是金幣之重量與成色。就幣制立場上說，各埠是一小的國家”。至於全國通用的銀元也不下十餘種，但是牠的價格須折合銀兩來決定。銀兩的複雜反映過去中國經濟的地方性，但是帝國主義在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後，仍有利於保存這種貨幣的複雜狀態，以阻礙和束縛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封建殘餘而保存到現在，適足以加重人民的痛苦。綜計銀兩的複雜和兩元並用的害處為以下的幾端：（一）匯兌上的損失，比方由上海匯一千元至漢口，不能直接匯銀元而必須折成規元，匯到漢口後又由規元折為洋例銀，再折為漢口之銀元，這樣一出入每千元即損失五元，淨得九百九十五元。（二）物價上的損失，上海的大宗交易及國外貿易均用銀兩，而另售則用銀元，以銀兩進貨而以銀元出售的商人，恐洋厘跌落而受虧耗，所以常常抬高物價以為預防，這即是工商業者之損失潛移默化於

一般物價中由消費者負擔。(三)洋厘跌落的影響，洋厘（即銀元）的跌落，即是兩貴元賤。就依薪水工資度日的人說，他們不知不覺間收入減少，比方銀元由七錢二跌到六錢九時，工資即損失了百分之五。就商品說，洋厘跌價，值五十兩一疋的綢，從前合洋六十八元，今須七十一二元。布一疋值二十五兩，從前合洋三十四五元的，今須三十五六元，這種暗耗加之於零買人的身上。他如洋米，洋麥都以銀兩計算，等於無形增加了成本，在出售時自然要相應的漲起。於是“平民生計愈困，市面愈難轉機”。這種洋厘跌價當然妨害工業之發展，比方今年四月間申報載：“棉紗賣銷……毫無進展……賣價步趨下游，路風劇烈。去歲水災太重，今庚滬戰又烈……金融不能流通，凡百事業皆告停頓。而邇來洋厘慘落達七分關口，內地紗價向售洋盤，滬埠例為規元，以致紗價每件暗中抬高七八元不等，紗銷更受打擊。”

兩元並用的弊害既如上述，在中國的歷史中廢兩改元問題也不知提出了幾多回。民國六年廢兩改元之議沸騰，但因銀元之成色不足又不一律而遭反對。民國十七年經濟會議以十八年七月一日為廢兩改元實施時期，十九年金融專

家會議亦決定於同年七月一日實行，以錢業表示時機未到而卒不行。這次廢兩改元問題的發生，由於內地農村生產稀少，生產的必需又都仰給於外貨，不得不將銀元運到都市，但是沒有農產品出售於都市，換回現金，以致都市中的現金充斥。“最近一年來最特殊現象就是內地通貨陸續集中通商口岸。由上年六月底到本年六月底上海幾增一萬萬元。一月底到六月底增銀兩二千五百萬兩，共增加了一萬萬三四千萬元。據耿愛德計算，全國的通貨共二十二萬萬元。以四萬萬人計算，每人應得五元五角，上海所存銀兩銀元合計，約三萬萬五千萬元。以人口三百萬計，每人得一百六十元，比之內地相差二十一倍。……流通資金全國在六萬萬元左右（因為有許多通貨是埋藏的），上海已占一半以上。由內地的壓迫和購買洋貨二原因集中都市。煤油米麵亦須向上海購買。一二八以後，上海對內地不能放款，內地欠上海貸款，都要運現抵滬。”“八月份各銀行存庫計銀元二萬三千六百七十八萬元，銀兩一萬九百三十三萬兩，仍屬有增無減”。對外貿易用銀兩，所以銀兩求過於供，內地銀洋集中都市，所以銀洋供過於求，由此造成洋價之大跌特跌。五十年來洋價跌落

不出七錢一分左右，而今年則跌到六錢八分。在這經濟衰敗的時候，銀洋跌價之無形減少消費者收入與妨礙貿易更爲顯明。所以廢兩改元之議起，公衆意見大都表示贊成。

至於政府提出廢兩改元的動機是怎樣呢？政府當局之提議廢兩改元，完全爲一種投機的財政政策，比方在銀元價跌到六錢八分時，廢兩改元之議起，洋價即漲到六錢九分五厘。“年來利用洋厘升降，自恃銀元存底豐厚，價高則大事售出，價小則事收進，因而獲得巨利者，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去年財部曾以關稅改徵銀元之說詢總稅務司，總稅務司回答各地銀元成份不同，難照標準率徵收，如就銀幣市價折合，則國庫受損非小。今時移勢易，洋厘暴跌至銀元實值以下，有人獻議當局，以爲可利用此時廢除銀兩，頗於國庫有利，又享勇於改制之名譽。”

假使廢兩改元實現，則政府可以在鑄幣中謀得一筆利益。原來各省仿製銀元，不在銀幣之流通而在其鑄造利益。他們在鑄造時，降低銀元的成色，減輕牠的重量以擾亂市場，物價因之騰貴。軍閥們以造幣的利益幫助軍餉或借中央及地方的政費之用。這次政府廢兩改元成功，當然也希圖從

增加鑄費，降低成色中撈一筆油水。‘擬議中之新幣重量規定爲七錢〇九厘，成色爲銀八八，銅十二，較現時流通之杭幣（按卽孫幣）更覺不如，遑論民國三年的袁幣。如此則廢兩改元實行，物價可立時發生變化。新幣鑄費開爲一分二厘，較民三條例增加一倍之鉅。’又一說銀幣重量規定爲“七錢〇四厘，則以有七錢一分餘之實幣，使有銀幣及倚賴薪水工資爲生者每元損失七厘餘之多，抬高銀兩而抑抵銀元，實爲剝削民衆利益。新幣成色減低，動機純爲牟利。”這樣，廢兩改元假使在現政府之下實現，不過是政府的籌款政策之實現，這便是廢兩改元的代價。

但是廢兩改元的利害錯綜，也不是那樣容易實現的。上海有兩大金融勢力，一爲錢莊，一爲銀行。錢莊有悠久歷史，接近商界，內地農工商業全賴錢莊，小工商人則賴當舖。“錢莊之在社會，遍設通埠腹地”，“農鑛漁鹽生產之區，皆爲錢業放款所及”。錢莊營業對象以社會舊式中小工商業爲限，而銀行業則與新式工商業交易。錢莊實有商業銀行的作用，但利用貨幣紊亂盤剝人民。錢莊營業大部份依於銀兩對銀元或銀兩對外國貨幣之兌換，以徵收手續費。上海“錢業勢

力之雄偉，半由於操縱銀拆。半由於匯劃組織”。銀拆方面的洋厘行情不得不聽命於錢業市場。於是那一地方的洋厘高，即運現往那地方，一出入間獲利豐厚。所謂匯劃，即是錢莊莊票上載明隔日取銀。此種莊票非特可於本國金融業工商及銀行界流通無阻，即於外商銀行及洋行界亦能自由通行。錢莊為收付莊票有匯劃總會，不許銀行加入，所以銀行必須委託錢莊代理收付，不得不將巨款存放錢莊。所以華商銀行之收款解款，除中國及交通兩銀行外，無不操諸錢業之手。錢業執金融界之牛耳。

在以銀兩為貨幣本位的制度下，擁有大量銀元之銀行勢不得屈居於錢莊之下，洋釐行市，票據交換都須聽錢業之支配。中國的銀行為近一二十年之產物，因為近代工業之不發達，所以上海的銀行都走上了一條路，即地產和證券投機，而與一般的商業太隔膜。假使我們想像銀行突然從市面消滅了，或者工商業受不到大影響。廢兩改元顯然是於銀行有利而於錢莊不利，因為牠將銀拆和匯劃的兩大武器從錢莊的手中奪去給予銀行。廢兩改元之後，銀行即可以自設票據交換所，無須依賴於錢莊之匯劃組織，匯劃中心必轉移

於銀行之手。而且洋厘行市消滅，各地寶銀匯兌折合的種種損失可免，即是錢莊少了種種的獲利。

因了這種關係——即銀行錢莊兩大金融勢力之衝突——所以錢業對於廢兩改元“原則”上贊成，即實際上不贊成的外交辭令。他們要求統一鑄幣權，統一紙幣發行權（包括取消治外法權及外商銀行發行紙幣之特別權益）及處理銀兩與銀洋的折合為先決條件。他們要求取締各省造幣廠，認為各地軍閥濫鑄銅元已使物價上漲，將來安見不濫鑄銀幣？又國內中外銀行有發行權的不下數十家，所發紙幣既多且濫，發行公開只限於上海，尤其各外商銀行得濫發紙幣吸收硬貨，將來發生停兌問題將怎樣辦？中國的分裂似乎為抵制廢兩改元之天然藉口（“數年來廢兩改元之終未實現，因無統一鑄幣之大規模製造廠”）。但是贊成廢兩改元的人都說：廢兩改元為初步，統一銀幣，鞏固發行，整理輔幣（“省自為政，輔幣紛亂”，“銀元下有雜亂之輔幣券，各種小角，各種銅元，此省與彼省，此埠與彼埠不通用”）諸大端須逐漸推行。這樣中國的落後的經濟形態，互相牽掣，互相推諉，不能改革，而吃虧的乃在吾儕小民受牠們的層層剝削。

此外對於廢兩改元沒有好感的爲外商銀行與煙兌業。外商銀行主張廢兩改元須待十年或二十年後方能實行，其用心不過託辭延宕，希圖保持其操縱金融之權。現在大條（卽銀塊）進口卽爲貨幣，供求盈虧操之於外商。廢兩以後大條爲貨物，欲成銀幣須進造幣廠。先令行市現在由外國銀行掛牌，將來則移於中央銀行。至於煙兌業也是生息於洋厘兌換的贏利上。“設一人以洋一元，從上海徐家匯起，向沿路煙兌店兌換，先以銀元兌銀角，再以銀角兌銅元，銅元又兌銀角，銀角又兌銅元，如是至南市十六鋪最後一家爲止，結果兩手空空，一無所獲”。由此我們看出小資產階級之革命不徹底；有些時候，有些地方牠還利於保存落後的經濟形態。

總結一句，廢兩改元關係於產業發展和對外貿易的前途，能否實現，要看這些利害相關的幾方面（政府，銀行，錢莊，外國銀行）間的條件談判怎樣，但卽在現政府之下實現，如我在上面說過的，也必在幾方面變得反對人民的利益。只有由於民衆運動的結果而實行的廢兩改元才對於人民爲有利益，而且能徹底改革幣制，將他們中間相互指摘攻擊的一些紊亂情狀一齊掃除。只有民衆才是大公無私的。

七 怎樣救濟農村

去年各省空前水災，農村經濟一敗塗地。今年各省豐收，但大多數農民亦未沾實惠。前年天災，人禍的反映還是間接的（官吏中飽，堤防失修），本年歲占大有，於是政治及社會關係之反乎人民利益使人民無法生存的事實赤裸裸的顯露於一般人的眼前。

我們先研究農村衰落之原因。據商業月報說：“農產物價格過低，輸入品之數量與種類年年增加，如布疋，洋油，日用品普及於窮鄉僻壤。農村出產之物日見其少，由都市購入之物日多，而糧食價格遠在正當價格之下。

“鄉村農民用以典質之物，率為田園或住宅，間亦有指青苗及未收之蠶繭為抵押品者。欠款利息在按月二分以上，甚且有四五分者。承質者為城市之商家及紳士或米行繭行，結果農民收穫僅足付利息，或且不足。農民除農具，肥料，糧食，油鹽約於秋收後償還。賒肉於年底牽豬作抵。賒欠物品之貧農亦多受商人之盤剝。”

又據張公權氏說：“（一）內地耕種的人一天少一天，荒

棄的田畝一天多一天。實在因為捐稅和生活費高，而耕種的收穫不能償還所欠的種本以致無本可借。即不欠債本的人，亦因每年收穫不敷租稅和生產費用就不願耕種，棄田而至城市就工。(二)其不能離鄉者，就種植售價較高的物品，現在有許多地方不種米谷而種鴉片就是這個道理。(三)向來以所有田地收入佃租為生者，因租稅加重，佃租減少，無人再投資於田地，其原來稍有資產之地主，均以積蓄購買公債地產或存銀行。(四)內地經營土產的商人，因內地捐重貨缺，外國來的農產品價賤，販運出來的貨價遠不能與市場存貨競爭，諸多都因此虧累，遂不敢再經營土產，無人向農民放款。”

歸納以上所引，農村經濟衰落原因不外以下幾種：(一)農產品之跌價；(二)高利貸；(三)租稅太重。由於海外米，美麥，棉，人造絲等傾銷，而農村的絲繭不值錢，棉產跌價，又加以交通不便，和內地阻禁等關係，以致安徽江西等省米價只值三四元一石。關係捐稅太重的事實，我們只須指出“丁漕之外有雜捐，正賦之外有附稅”，“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各省土地稅繼續增加，如浙江某縣正附稅名目達二十餘

種”。“江浙地租比以前加了一二倍”。“地主時常加租加批獲土地生產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上的收入。此外還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蹂躪農民。於是農村經濟在以上所說的三原因動作之下，加速度的崩潰和破產。

我們試引以下一例以資說明：

“稻田每畝支出調查表

(以紹興錫常之中等田為例)

所有地之利息或田租	\$6.00
耘邊(三工)	1.20
種苗費	0.60
割(二工)	1.00
房屋農具及其他耗費	3.00
耕地及肥料	3.00
種	0.30
包水	1.50
利息及管理費	2.00
合計	18.60

每畝獲米一担半計，每石米成本為十二元四角。且此數

對於水旱病蟲等災害時之損失，捐稅婚喪衣服等之消耗，家庭內妻女無形中之補助勞動等均不計算在內。而由產地運諸上海尚須加以川運佣金，捐稅手續以及其他之損失費用，至少需加五分之一，實價在十五元左右。”以現在米價每担僅有三元另，農民怎能不破產？

怎樣救濟農村，依於各階級的立場而有不同的提案。政府當局只着重於兩個組織：合作（信用，供給，運銷等）與借貸所，希圖稍稍犧牲一點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來救濟農民，假使牠們能或功。至於租稅等問題，那是談不到的，因為牠直接影響政府的收入。但合作社與借貸所如果經過官僚去辦，那又將成爲魚肉鄉民的工具。我們不看見農民銀行的成績麼？“最近江浙等省雖有農民銀行之組設，但不免資本短絀，規模狹小，而其宗旨又在營利會不足稍蘇農困。故農民平時通融資金之道仍不出典質與借貸二途”。（點是我加的）又“商業銀行利息高，農民銀行不易吸吸低利資金”。這樣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政府將來辦借貸所會比資產階級辦農民銀行進步些，其他如此類推。總之，政府的政策是放任農村經濟崩潰而不加干涉。至於錢業，商會以及一般資產階級的意

見，是主張“增加米糧進口稅，開放各省米禁，整頓倉儲，蠲免食糧各種雜捐，中止借美麥，農業貸款”。這些建議的大部份都在於打擊政府的荷包（如借美麥，免雜捐）。是否現在的政府肯犧牲許多眼前的物質利益，去遷就資產階級的要求呢？這就要看牠是否屬於資產階級的政府和代表他們的利益。關於這點我們留在下章討論。

據有人的估計，中國人需要的食料約為米十八萬五千萬擔，全國所產的米為十九萬四千餘石。中國人是可以糧食自給的。但何以中國每年進口數萬萬兩的洋米呢？這是因為內地不能流通。同樣，關於棉花“今年可產三百萬包（每包三七五斤），農民自用五十六萬包，出口粗棉五六十萬包，可供紗廠二百萬包。每年紗廠需用棉花二百三十萬包，缺三十萬包。去年洋棉進口一百五十萬包，今年恐進口一百八十萬包。內地稅重，運輸不便，反買洋棉為廉。只要改良棉產，增四分之一產額即可自給。”於是張公權救濟農村的辦法是：“1，設立糧食棉花管理委員會，2，提倡新式農產販賣機關，3，提倡適合農民習慣的合作運動”。（見中行月刊）但是所謂糧食棉花的管理，如果是由政府的機關辦理，牠能克服各省

軍閥間的衝突，調劑各方面的盈虛嗎？提倡適合農民習慣的合作運動能解除地租，捐稅及高利貸的壓迫嗎？而且我們將怎樣解決一邊是有剩餘糧食的農民，另一邊是沒有購買能力的飢民的問題呢？我們將怎樣抵制洋米的傾銷呢？可惜張公權先生不能解答如何恢復國內經濟的平衡——即農業與工業，生產手段之生產與消費手段之生產間的平衡。這些似乎是超過銀行資產階級的學者的視力之外的問題，他們是不能提出的，更談不到解答，他們只想在承認現狀之下補苴罅漏而已。

八 中國經濟復興之前途

總括以上所論列，我們知道中國在過去一年半的期間，財產有三四十萬萬元的損失（水災，喪失東北，滬戰）；預算之得以平衡實由於挖肉補瘡；金融資本不能投資於生產事業，仍繼續從事於投機或死藏在銀庫；出口減少，入超激增；工業受傾銷之打擊而衰敗；農業因農產品價大跌而陷於破產；以言商業，則一年來國內的商店一排一排的倒閉，處於奄奄一息的境地。政府對這些關係於幾萬萬人民生活的問

題，束手無策，反揚湯止沸，加速中國經濟的總崩潰。中國若干年來經濟都是下落的，一年不如一年。牠只有兩個前途：一是走向野蠻主義，一是經濟復興。

當我提出這兩個前途時，我有一些朋友，帶着不信任的態度批評我，尤其不相信中國會走到野蠻主義。那麼我只有請他們看以下的事實。申報有一時評說：

“前年隴甘旱荒，災民易子而食，賣婦為饗。去年水災是武漢一帶災民親多以樹皮草根果腹。即如夙稱富饒之江浙。今亦陷於凋敝不堪之悲境”。又無錫報載：

“各地農產連年歉收，去年又值水災，鄉民蓋藏久空。本年蠶汛之前復值淞滬戰事，極貧農民大多以糠屑，菜葉，薇蕨為食。宜漂交界近山居民更有以嫩石磨粉，與糠混合，石七糠三作為糧食者。本邑八士橋附近以及青城萬安各市鄉一部分貧戶以一升糠屑充二人一日之糧，迄今已將數月。…農民絕望於蠶事，除翻改桑田外，更有棄擲蠶具，立誓不再育蠶者，蠶桑事業亦有全部絕滅之勢”。

假使中國不走向野蠻主義，不再是經濟衰敗一年年的擴大與深入，則其將來是經濟復興。

經濟復興是全國大多數民衆之要求，失業工人要求“工作或麵包”，農民之要求提高農產品價格，俾能繼續再生產，資產階級與商人之希望避免破產與擴大剝削的機會，這都是希望經濟的復興。不過經濟的復興在現在種種條件之下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不相容的極明顯的例證。中國的生產力被關稅制度，人民不勝負担的租稅及高利貸等剝削關係所絞殺。

(下略)

一月七日，一九三三，天津。

一九三二年中 農村經

伍忠道

由於自然條件的劣化與社會內部的腐敗，造成了一九三一年中國空前的大水災。在這一次大水災底下，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可說是千百年來未有的空前大破產。一九三二年年上半年的中國的農村，即是繼承這破產之下的饑饉與貧困，數千萬的農民大眾是在高利貸，草根樹皮，鬻賣妻兒，流亡求乞的生活中，維持他們窮困的生命。但這時候，自然條件已經有了好的轉機，尤其夏秋之交農忙的時候，風雨較前

幾年來得順適。同時這一年中的一月到八月，又因國難問題暫時打斷了國內軍閥的混戰，沒有妨害農民的農忙（比較的不妨害），在這自然條件比較轉佳與現社會一點可憐的安定條件的底下，居然使數千萬窮困的農民大眾歡天喜地得到一次滿意的豐收了。

當農民高興地負起他們的穀物到城市去販售時，不料市場穀物價格的跌落出了他們的意外。一担穀物售出的價格，還不能抵補他們在生產中耗費的本錢（資本）。於是在豐收之後的瞬間，便形成社會上一般稱為，“谷賤傷農”，“豐收成災”的農村危機。使數千萬的農民大眾又陷入難以救拔的苦境之中去了。

這次農村危機採取這樣的形態——豐收中爆發出來的危機——而出現，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有它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的意義。如果說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是從帝國主義的吸血管插入中國農村之後，歷年災荒匯積而成的結果，是中國社會變亂的歷史必然要排演的一幕悲劇；則我們認為本年度——一九三二年的豐收危機，更是帝國主義的吸血管插入中國農村之後造成了農民貧困之必然的結果，是中國

社會日趨於半殖民化之必然的現象。在這裏我們認為這次豐收危機，不但在事實上對於中國的農業非常嚴重，而在現中國歷史發展的意義中，尤其嚴重。我們站在挽救中國農業危機的立場上，或是分析未來中國農業經濟之變化，對於這豐收的危機，我們不能不加以精密的考察。我在下面所述的事實，即是貢獻給精密考察中國農業經濟的人們的一個參考。

一 危機的現狀

這一次豐收的危機所涉及的範圍很為廣泛。在中國的南部與中部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在西北部有綏遠，陝西，山西省等。所謂危機主要的即是糧價的慘落。現在除了東三省被日本佔據我們無從得悉，與廣東福建等缺米的省份外，全國大部份的農民是飽受着糧價慘落的痛苦。現在我們先以全國最大米糧市場的上海市價指數為例，以示糧價慘落之一般。

上海米糧價格指數(據上海國定稅則委員會報告，
以民國十五年指數為一〇〇)

年次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一七年	82.5	82.1	89.4	91.1	93.2
民國一八年	99.7	103.7	106.2	103.4	103.1
民國一九年	117.6	114.8	100.8	98.5	93.1
民國二〇年	103.4	100.2	92.9	90.9	86.4
民國二一年	83.5	77.3			

從上表看來，上海最近五年來的糧食價格是以本年度為最低數，然上表中，本年度僅以九月份數字列入，十月以後的糧價，則更為低落。上海的情形既如是，產米區域自然更不消說了。我們現在即就此來看產米區域的情形。

先說江蘇的產米區域。江蘇的產米區域素以江北各縣與無錫蘇州等處為多。本年度在這些地方大部份是收穫頗豐。豐收之後的現象，即是普遍的糧價之慘落，與災象的形成。大公報十月十日的通訊，有如次一段記載：“江北災歉連年，今歲麥豐收，人民稍得喘息，不幸穀賤傷農，貧困未減，豐收之後，竟告成災。江北高、寶、興、泰，各縣，多屬產米之區，每縣至少可得稻二百萬石。故目下各縣糧行中，新麥山積，削價招徠，仍無主顧。現新麥每拓祇售二元餘，較前上市

時，減約四元，米價月前均需十三四元，現已突降每担祇售七元之譜。”至於無錫一帶情形亦復相同，上半年米價每担高過十四五元，無錫一縣，一月間發生搶米風潮二十五次之多，至秋收以後，米價驟落至八九元，現今已落至七八元之間了（九月廿二日新夜報快訊）。農民的困苦，我們於此可想而知。

浙江豐收成災的情形，大致與江蘇相似。上半年浙西一帶的搶米風潮也是極盛的。秋收之後便緊接着發生糧價慘落的災象。“……浙江各縣……搶米風潮數現不鮮。……羣慶天公在稻田緊要時期，尙無暴風驟雨，一般農民無不喜形於色，共祝今年之豐收。實屬喜出望外，以爲苦盡甜來。安知禍不單行，當新米甫經登場，而米價跌矣，見新未及一週，米價驟跌一元，不到一月，價跌竟達二元有餘。計自糙米八元五角跌至五元至六元，而農民雖稱豐收，但每畝計算亦不過一担六七斗之收穫，全數糶出，以六元計算祇得九元稍零，但佃農者連還租在內，以及工資等項，每畝須本洋十二元，則種田一畝，虧幾達三元……至浙東一帶，每担（百斤）穀僅值一元九角，其不敷成本，可想而知。”（十月三日上海新夜

報)

江浙兩省的農業危機，除了主要糧賤成災的部份以外，而蠶絲在國際市場的失敗與其價格的暴跌，亦是危機中之一部份。江蘇無錫一帶的農民，因絕望於蠶事，除改翻桑田外，更有毀棄農具立誓不再育蠶者。蠶桑事業，甚有全部絕滅之勢（二十年六月一日錫報）。在浙西嘉屬一帶的蠶桑業亦將破產。原因由於絲繭價格暴跌，春繭每斤祇值兩角，絲價每斤亦祇兩角伍分，以致農民虧蝕過巨，相率破產（二十一年十月三日上海新夜報）。

安徽與江浙接境，江浙既是豐收成災，而安徽在豐收之後，災象當然不能免掉。所以在安徽產米區域的情形有如下所載：“皖省為著名產米之區，今秋豐收，宜得恢復去歲水劫創痕。然橫禍逆來，自入秋以後，天災人禍繼起……兼以今年湖贛俱屬豐收，皖米難以見奇，市價低廉，賤而傷農。……上好機米每担不過七元左右，稻價在鄉間祇值兩元一担。現有人將米向銀行抵押，糙米每担三元，稻價僅抵一元五六角……”此種比江浙更低的糧價，自然更使農民虧本，加重農民的貧困。

現在我們來看江西。江西是所謂“赤匪”的老巢，全省所轄八十一縣，有六十三縣都被赤匪騷擾過。現在還有大部份在赤匪手中。然同樣發生糧賤的事實：“省內各地，除南昌九江可以銷納少數穀米外，均苦生產過剩，無處銷納。刻下各地穀價，每担均在二元五角以下。交通不便之偏僻處所，甚且在二元以下。查農民每人平均耕田二十畝，每畝收穀以兩担計算，每担計洋二元五角，全年血汗代價為百元。除去耕種子肥料田賦捐稅外，一無所得。甚且負債典田，納捐耕牛。苟為半自耕農或佃農，則更加不堪矣。”（十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至於兩湖的情形，湖北因有賀龍的‘紅匪’盤據，僅鄂東豐收。而湖南則全境大熟，待售谷米有三千萬担之多。上等谷價每担僅二元數角，而交通不便之處，僅一元數角，所以湘農有豐年坐困待斃之勢。”（十月二十日上海新夜報長沙通訊）

我們考察了中國南部與中部穀賤成災的情形之後，現在我們再看西北部。

前面已經指出，西北部糧賤成災的地方，有綏遠，陝西，山西等省。我們就先說綏遠。據大公報綏遠通訊，綏遠糧賤

的情形有如下所記：“本年綏西豐收，惟捐稅繁重，復以交通不便，難以出口，因而演成穀賤傷農慘劇。據調查，綏西糧跌落情形如下：糜子價格，每斤不到小銅元一枚，豌豆與大豆，合一個多大銅元一斤，麥子僅六七個小銅元一斤。包頭的糧價，比五原不過貴一元四五角，春天的糧價，至少貴一倍，多的貴七八倍。”

陝西的情形，比綏遠更慘，一面是表現糧價跌落到極點，而另一面又表現着天災人禍繼續地肆虐。在那裏我們可以看見，“赤地千里”與“哀鴻遍野”的事實。更可以看到兩千板子打不出一塊錢的慘劇。在這樣飢饉與貧苦的情形底下，糧食不但未見提高反而價格低落。如產米較豐的安康縣便有“食糧不值錢，每斗米重四十斤，只值洋一元二角，小麥每斗重四十斤，只值洋七角八分”（十月十六日陝西西安日報，見東方雜誌二十九卷第七號中國農業恐慌的新姿態所引。）又據天津大公報陝南視察記所記西鄉縣糧賤情形，則更屬駭人：“新稻下地，農民急謀出售，以完捐稅，售者過多，跌價至每担祇值八角，總計全縣米穀出產尙不足二十萬担之數。使担负四十萬元鉅款，難民不逃，誠難能矣。”在這樣形態之

下的糧賤，不是收穫額相對的過剩之結果，而是災荒過甚與軍閥統治對農民大眾的剝削過甚而造成的。

山西本年度的糧賤，也是在天災之後爆發的。全省有六十八縣遭受水災，毀田百萬餘畝，而農屋被水沖倒有二萬間之多，災民二十餘萬（十月廿五日上海新夜報太原通訊）。這樣大的水災不能說其不嚴重。然在大同等縣却發生糧賤傷農的事實。

從上面各省的實際材料看來，糧賤成災已經成了全國普遍的災荒。這次災荒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去年的大水災來得嚴重。然在實際上農民大眾更是普遍地受到災荒的影響。而苦痛的程度還要深刻些。因為在水災之中，還有未受災的地方，而目前的糧賤，各地都是一律的。受水災的農民，他們還可以藉流亡來逃脫他們高利貸苛捐雜稅地租的壓迫。在現在他們只有“坐以待斃”像待罪的羔羊一樣的任憑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外來帝國主義的宰割。這次的糧賤成災，更使整萬萬的農民大眾陷入那些統治者底羅網的苦海中去了。

二 危機底本質及其成因

使全國大部份的產米省份普遍地發生糧賤成災的危機，使整萬萬的農民大眾惟有“坐以待斃”任憑統治者底無情宰割的一九三二年的中國農業危機，無疑地是帝國主義的吸血管插入中國農村之後日益促成中國半殖民地化之極端的表現。這不是如一般普通人所謂“古有明訓”的“穀賤傷農”，而是現代性的與國際資本主義之世界經濟恐慌中的農業恐慌構成了相連的一環。

世界農業理論專家伐爾加(E. Varga)氏曾將世界各國的農業恐慌分爲兩個範疇：第一種農業恐慌的形態是發現於那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主宰着整個國民經濟的國家中，在那裏，是由農業品的過剩促成生產大眾的貧困。第二種恐慌形態是發現於那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經濟發展的階段比較落後的國家中間，在那裏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他方面遭受封建勢力的剝削，在那裏是生產力的薄弱，即生產量的不足陷農民大眾於饑餓與死亡（見新創造陶直夫先生的一九三二年大水災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一

文)。

伐爾加的意見是對的。但還要補充一點，即是在半殖民化的中國農業危機中，它不但有帝國主義的宰割與封建勢力的剝削，並且還有開始長成之資本主義化的富農剝削形態之存在。這一次糧賤成災的農業危機之存在，表面上似乎表現為生產過剩。而實際上生產量還是不足的，因為在許多缺米省份與災區還是缺糧。還有成千成萬的災民正在流亡與饑餓。並且在同一省之中，距離不過數百里，竟有一方面是生產過剩，一方面是糧食的缺乏。這可說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特有的現象。因為帝國主義的吸血管插入中國的農村經濟之後，農業大眾的血汗，便漸次被帝國主義的商品吸吮而枯竭，使農民大眾相率因貧困而破產。一部份的農民便逃亡於都市，擔任了新興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工錢勞動者職務，而轉變為現代式的無產階級，一部份則繼續留於農村中，在豪紳地主的剝削之下比農奴生活還要壞的耕作。此外失去了田地農具的農民，他們既不能到城市找到工作（因為工業底不發達），又已不能立足於農村，這

便成了軍閥的履傭軍隊之主要的基礎。這時候，凡以前自然經濟時代的農村副業——小手工業，是根本地被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而打碎了。而另外組成了獨立的產業部門。農民的生產物如棉花，烟草，蠶絲，糧食等完全商品化。帝國主義在這裏所要造成的擴大中國商品市場與廉價收奪農產原料的目的都達到了。而農民經濟的衰落是日趨深刻，貧困的惡魔便重重地壓到農民大眾的頭上。

帝國主義雖然打碎了中國的自然經濟，造成了農民的貧困，却沒有掃除中國的封建勢力。返轉來與中國舊有的封建勢力相勾結，共同來榨壓中國的農民大眾。滿清沒落之後，而民國時代的軍閥又誕生了。帝國主義使用來作為其統治中國的政治工具。此外，鄉村間的豪紳地主，因為與洋人做生意極好賺錢，便一致成為帝國主義的農村買辦。而新起的富農（去向資本主義化的）更成為帝國主義的上等奴僕了。貧困的農民大眾便被這些吃人的惡魔的血口以無情的吸吮。現在我們隨便推出一個農民來看，沒有不是衣不蔽體，面黃飢瘦的。

農民大眾因為極度貧困的結果，所以有些地方豐收之

後的剩餘糧食，農民便無錢存貯。又因一般高利貸捐稅之催迫，使農民的新稻剛剛下地，便不能不急求出售，以爲還債納稅之急需，於是這一形勢，便直接使糧價急劇下落。而在同一省之內會發生糧食不能流通的奇怪現象，則因爲關卡盤剝，運費昂貴的結果。這種現象，在西北方面比較盛行。這無非因軍閥統治之結果。

我們認爲此次糧賤成災主要的原因，不外兩種，一是由於國內社會政治的黑暗榨壓出來的；一是由於帝國主義宰割的結果。在實際的原因說，便是國外糧食傾銷與國內高利貸捐稅之繁重以及交通不便。天津大公報十月九日江西南昌通訊有這樣一段話：“本省穀米，素以滬漢爲銷納場所，乃長江下游，因洋米傾銷，固無下行之望，而漢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麥影響，贛亦無插足可能。……至於當局方面，對於破產無餘之農村經濟，尙未籌劃救濟之方，且催徵田賦，加徵產銷稅，因無人問津，乃由一元減至八角，期裕省庫收入……但當局若不設法救濟農民，則農民因租稅捐款債項之逼迫，勢將棄田爲匪，是亦贛省目前之嚴重問題也。”

江西因爲是長江流域，交通比較尙稱便利，所以最感痛

苦的，便是洋米傾銷與捐稅繁重。這洋米傾銷究竟是如何的，我們且來看看。據海關報告：一九三一年各種米糧的入口爲一萬萬八千六百萬關兩。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洋米入口，爲六千九百餘萬兩，超過了一九三一年的全年。這是何等驚人的傾銷情形。又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月的小麥入口爲一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餘担，與一九三一年合計美麥借款比較，或許相差一點，然較一九三〇年的小麥入口數二百七十六萬二千餘担相較，則高出遠甚。這又證明國外糧食的傾銷是何等的驚人。在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知道我國的糧賤成災是帝國主義宰割的結果。美帝國主義公開地借給中國的美麥借款，更是這宰割之中的公開代表。

至於捐稅，上面所指還足使我們完全明白它的毒害。這裏還可借一點更明白的材料來。“蓋江西下級農民之困苦，爲附加稅之重，質言之，卽田賦帶征問題是也。民十八年以前，江西之附加，經省府決定者爲百分之五十，楊廣筮長民政時，請加爲百分之百。遂爲定案。而近年因匪風日緊，各縣自由增加，多者有百分之二三千者，各縣自成風氣，絕不呈報省府。……而縣長與劣紳之向來吃匪飯者，利此收入，下

級人民，遂以困矣。”這是江西現任財政廳長吳建陶氏的口中說出的。江西農民因附加稅之重，而目下穀價又賤，所以種田一畝便虧本特甚，所以有“今秋江西秋收，農民多棄稻於田過而不收”的情形(全上報)。

在匪區之中的江西，捐稅尤有如此繁重，在其餘中南部各省，也由此可想而知。但是，下級的農民，除了捐稅是一種重大的壓迫之外高利貸壓迫也同樣殘酷。而貧困的農民之再生產，又大多依靠高利貸借款才得進行的經過了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這種情形更爲普遍。所以在今年秋收後的逼債的情形更使農民難堪。我們再舉浙江情形爲例“……而所欠各種商品的賬款，以及借款等，素賻者接踵而來，所以欠米行之賒米，當正二月間所賒白米一石價達十三元左右，再加以每月二分之利息計算，賒白米一担，今須以糙米二担五斗歸還。”(十月三日上海新夜報)這種百分之百的利息，到處都是盛行的。到處都有高利貸者與商店任意居奇，榨壓農民。而農民除了這些苛捐雜稅高利貸的榨壓之外，還要擔負沉重的地租。我們想想，農民大眾所受的剝削是何等嚴重呵！

中南部考察之後，再看西北部。如大公報綏遠通訊：西北部的糧賤原因，除了捐稅繁重與商店操縱之外就是交通不便運費昂貴。“本年綏西豐收，惟捐稅繁重，復以交通不便，難以出口。……(一)由五原運糧赴包頭，須經關卡：(1)陸地統捐，(2)陸地邊關，(3)營業稅，(4)糧石捐，(5)斗捐，(6)卡子查驗費，(7)牛套捐，河路的又加上‘河路社捐’船筏捐，普通還有‘保商路捐’等。因而外來商人，時有糧價不及稅款而棄貨潛逃者。(二)農民急於納稅，爭相糶出。如區費，社費，水利費，警捐，學捐，青苗捐，差徭，雜派，稅租，官租等。(三)由糧店組織之糧行，任意居奇，操縱糧價。因有猛盤之名稱，而且購買出售，均須由糧行經手，且作投機營業。……”我們在這種數都數不清的捐稅名目之下，却緊緊追隨着窮困的農民左右而不相離。農民大眾受着嚴重糧賤成災的痛苦，而日益貧困，糧店的商人却因此而發財了。這是何等矛盾而悲慘的現象。其實一句說穿了，這是私有財產制度底下，尤其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底下的必然的結果。

在這裏總說一句，這一九三二年中國穀賤成災的農業危機，是由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商人富農共同宰割的結果，是

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一部份的表現，是帝國主義的吸血管插入中國社會之後，日益促使中國半殖民化之極端的表現。

三 危機的展開與土地關係之變化

在社會科學的原理中，有這樣一個定律。即：“每次恐慌都使階級的對立更加尖銳，而且把這個對立在它的全劇烈與全含蓄上暴露出來。”（德波林依里奇的辯證法）是的，這一次穀賤成災的危機，使許多農民的境況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不但把所有的終年勞動結果的農產物，拱手奉送於統治者剝削者，並且有的連田地農具耕牛賣了也不能償債的。最後只有把他們的妻兒一齊拿來賣了。如浙江崇德通訊所載：“鄉人本多良善，近年來受債主盤剝，利率之高，實屬駭人聽聞，如按月二分，更按月三分至三分半者。如此盤剝，安得不窮，而放鄉賬者，大多係就地豪紳，故鄉人敬而畏之未敢聲訴。倘到期不還，有先加利息若干，有寫田契以抵押者。如押契訂成，轉瞬數月，可本利如數合訖，鄉人無主權矣。東鄉水田約五十元一畝，西鄉約三十元一畝，售者甚多，豪紳購者

亦甚多。倘田地賣完，仍無以爲生，或將自己女兒脫售，以圖償補，每歲約值五元，攜女求售，無日無之。”（十月九日上海新夜報）這裏所描寫的，我們可以明白看見階級兩極分化之劇烈。多數自耕農或半自耕農在這裏是失出他們的田地成爲無產的農民，許多富人，却成了更大的地主。土地集中的形勢是日益劇烈了。

這樣的情形，不是崇德一縣所特有的，而是盛行全國的各省。在西北部則更劇烈。因爲西北部在大旱災之後，土地價格減到了極度的低落，富人們更容易收買。土地集中的趨勢亦因而極爲迅速。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的天津大公報西安通訊有如下的記載：“陝西在災荒中農村中之關係更有極大之變更，大有影響於國計民生者，卽土地所有權之轉移與土地集中。蓋農民賣妻鬻女者，其于賣妻鬻女之前，已將平時所賴以生存之土地，早已典賣一空矣。收買此種土地者自爲鄉村中之豪富與城市中官吏。去歲渭北旱地有以一元二畝出售者；西安附近及省西南一帶之水澆地可以十餘元購一畝。因此土地集中之趨勢，極爲迅速。麥收後流離在外之農民，漸歸原處，但其所耕土地，多已不爲己有，無田可耕，成

爲有人無田之狀……”在現在的陝西，穀賤與飢荒并行的情形之下，土地集中的趨勢，恐怕還要比這迅速些。在這裏，我借馬加爾的一句話：“飢荒和高利貸勢力的展開，加速了土地移轉的進程。”這進程的動向是：“飢饉促成從來的村落團體底分解。大農的富強化，以及大農轉變爲地主的過程。一般地講來，它促進土地從農民及貴族手裏轉移到新的資產階級手裏的進行。”（恩格斯關於一八九一年的大災荒的話。）

在這恐怖的農業危機中，一面表現的是土地集中之迅速，而同時荒地的增加也同樣迅速。這因爲危機的尖銳化比土地集中還要迅速些。在中部的江西，農民有棄稻於田而不收割事實，這即荒地增大之另一種表現。此外匪區之中，則大部份成了荒地。在西北部，陝西盛行着交農風潮，即是農民因苛捐繁重，情願不要田地，而將契約繳存官府。如陝西西鄉縣所成立的土地局，不到三月，即收到荒田一萬三千畝，而繳田農尙接踵於道（天津大公報陝南視察記）。於此我們可見荒田激增之一般。

我們從上面所述的看起來，這一九三二年的中國農業危機，是加速了中國土地變化的過程。這過程所表現的即

是土地集中與荒地增加，農村的階級關係日益走向對立的兩極。

四 危機前途之展望

當危機的惡魔緊緊抓着窮困的農民大眾往死路上推送的時候，而我們的政府當局却不惜拿毒鳩來毒殺農民，繼續進行美麥借款。同時國內的大小軍閥一點也不顧國難的嚴重，不顧羞恥地又復開始爭權奪利的大混戰。在山東的大混戰裏，戰禍擾及膠東十數縣。散兵與土匪的騷擾，使鄉村的農民只好往外逃亡。巨額的軍糧，火車，牛車，人夫的徵發，把農民一點小小的收穫，沒收個乾淨。在四川這次的混戰裏，情形是更慘。僅以兩劉所動員的軍隊，就有二十餘萬，加上李家鈺，羅澤洲，楊森，田頌堯，鄧錫侯諸軍，至少在三十萬以上。在這樣大兵團的混戰裏，加以劉湘使用新式的爆炸機，凡戰禍所及的地方，如臚州，沱江，成都等處，人民的死亡至少在萬數以上。而財產的損失與對於農村經濟的破壞，是到了屋成瓦礫，雞犬不留下了。現在這戰事還未停止。其餘貴州，福建等處多少都有混戰的形勢。

我們看這相連不斷的政治黑暗的事實，覺得一般治者階級所高唱的救濟農村的口號，只是騙騙人民耳目的鬼話。在現在還沒有受到戰禍所擾的一些地方，下級的農民已把他們收穫的糧食還債還光了，在明春所需的糧食，又要發生問題，尤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村中也許會再出現可怕的饑饉。至於甚麼也剝光了的西北農民，他們情形是更慘。如陝西寶雞縣，現在已經四載未收，而捐稅的盤剝，則一天比一天加甚，農民如無錢納捐，則加以嚴刑。“縣府催糧催款之威風，真同人間地獄，每當更深夜靜，縣府會計老爺，暨各副官軍需會比，兵士法警數行林立，鄉民木枷鐵練，蜂擁堂下，人人齧齧，面帶愁容，愁氣所聚，燭焰色綠。竹板皮鞭，任意亂打，淚珠血點滴地成斑，哀痛之聲，可以動天地泣鬼神，恐森羅殿前無此慘悽也。”（寶雞縣災民代表呈文）這是何等慘悽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在現社會的黑暗政治的底下，只有製造危機，決不會解救危機的。農民大眾的生活，只有一天比一天悽慘。

統治者既如此這般的作惡，難道農民，就不反抗麼？他們是會反抗的。在中國悠長的歷史中，誠發生過多次農民大

衆反抗的狂暴的運動。即在最近的事實，如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他們也曾舉起鋤頭鐮刀與統治者發生劇烈的抗爭。但這種抗爭因為得不到正確的政黨的領導，隨着大革命的失敗而流產了。現在是變成了慢性的運動。有些地方的農民，他們現在還只開始沒有組織的個別鬥爭。但這一切，我們認爲是中國農民革命的前提條件。我們相信，統治者的淫威日益加厲，不過是他們的迴光反照，而最後的勝利，必然是農民大衆與其先進的同盟者——勞動階級的勝利。中國農民大衆未來的前途，就在這裏。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寫完。

一年來中國文

論戰之清算

王集叢

- 一 引言
- 二 “目的意識”“宣傳煽動”與“武器文學”
- 三 “第三種人”與“文學上的干涉主義”
- 四 關於“文藝大眾化”的問題
- 五 結論

讀書雜誌增刊

一 引言

歷史曾經不只一次地告訴過我們：在每一個偉大的社會變革之前，都必然地有一個偉大的意識形態的革命（當然這革命也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規定之下遂行的）。在法蘭西大革命的前面，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乎唯物主義，自由主義的運動；遠在十月革命之前，Marxism 底光輝已經照遍了全世界勞苦大眾底心靈，就是咱們中國底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已曾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底很大的推動力量。

如果我們沒有否認歷史的必要，那便可以依據歷史得到這樣的推論——一九二八以來的中國新興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三次大革命的準備工作之一。假若這一準備工作做得很完善，很徹底時，那麼，未來的第三次大革命將要更加順利。

因此，爲了中國革命底前途，檢討一九二八以來中國新興文化運動的工作（特別是在最近的），便成爲了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布爾喬亞愈到東方，便愈卑下。”半殖民地的中國布爾喬亞之不中用的程度，當然不會在甘地之下。

半殖民地的中國布爾喬亞自其胎生以來，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充分表現了他底畏首畏尾的庸懦的特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是把“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請出來了，但是不久他便叫“賽先生”去整理國故，當着“德先生”面前向一般青年大眾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及到他在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中，騎在中國工農底頸子上得到了相當的勝利之後，他便全部地謝去了自己底歷史使命，專門來做阻礙歷史車輪前進的工作了。

這是事實，同時也是真理。

然而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無論帝國主義與中國布爾喬亞，豪紳地主的阻礙力量有好大，它也不會永遠停頓，倒退。一九二八以來的中國新興文化運動，便是它底一部分燃料。這一部分燃料，無疑地是加增了它前進的速度。

把眼睛睜開吧，在一九二八以來的中國文化領域中，出現了與過去不同的蘄新的東西。過去所講的是“什麼民主主義”或“民什麼主義”，現在所講的却是“馬家”和“列家”，底理

論了。在文藝方面，是“爲階級”代替了“爲人生”，原來的“藝術之宮”已經，或者快要被“武器文藝”打破了。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蒲列汗諾夫……底著作譯成了中文，高爾基，辛克萊……底作品已經成爲了一部分前衛大衆底食糧，這些蘄新的東西雖然還不能支配整個的中國文化世界，但在這世界中却已有了不小的力量。

但是，我們底準備工作已經完結了嗎？老實說吧，我們底工作不但做得不充分，而且就在已做的與現在正做着的工作中，還有許多問題。現在，我們且一般地指出幾點來看吧。

1. 與舊的文化實行理論鬥爭，是新興文化運動底頭等重大的工作。但對於這一重大工作，在過去兩三年中，可以說我們是完全地忽視。最近雖然有人在與布爾喬亞底理論家；胡適，張東蓀，郭任遠，李權時……等作系統的論戰，但只是有人而已，在新興文化運動的議事日程中還未把這一工作當作一個重要的問題提出來。更嚴重的，是有些自命爲新興文化運動的戰士的先生們，不但不積極地去與布爾喬亞底理論家實行公開的論戰，反而說做這種工作的人是“坐

在亭子間裏空談理論”，是在“緩和革命鬥爭。”這樣一來，胡適博士便可以安然地鼓吹“獨立”，張東蓀先生也就洋洋自得地宣布“再生”了！

2. 中國社會史的問題，目前的中國經濟性質問題是，指示中國社會出路，中國革命方向的重要問題。但在這一問題上，過去的工作，除了“新思潮”與“動力”的“混戰”外，便是朱其華之流底“爲了麵包”的“抄書主義”。這種現象，經過了長久的時間之後，一直到去年才有人新發現了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性質除一半是封建的以外，另外一半還是殖民地的。最近，總算是有不少的人在注意這個問題，而且已經有專書大著，已經在熱烈地論戰了，但是，你瞧，戰場上不是還有“行尸走肉”嗎？不是還有人在企圖以造謠謾罵來取勝，來掩沒真理嗎？

3. 中國文藝論戰是在一九二八就開始的，與其他方面比較起來，總算是走在了前面。然而不幸得很，這論戰一開始就找錯了敵人，就是“鬼打鬼”（華漢先生在左傾文藝團體聯席會議上的憤激語）的形勢。“創造”，“太陽”，和“語絲”乃至“小說月報”大戰了幾百回合之後，才說“誤會了”，才說

這是“鬼打鬼”，沒有意義。於是才回轉頭來“萌芽”，“拓荒”。自然，在這次論戰中，已曾向着布爾喬亞底文藝理論家，“人性論者”梁實秋教授打了兩砲，但是，梁教授底錯誤見解並沒有完全顯露出來；我敢說，就在“左翼”文學家中，恐怕還有不少的人直到現在還不了解梁實秋理論錯誤的所在，除了知道“梁實秋是布爾喬亞底走狗”而外。

4. 此外，如“資本論”還未譯成中文；馬恩與蒲伊全集更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在中國出現；在出版界中，除了從外國搬運了些馬列主義的東西外，更談不上有什麼創作；……所有這些，都不能不是中國新興文化運動中的嚴重缺陷。

在這些缺陷和錯誤之下，再加以客觀和主觀的許多複雜原因，便構成了中國新興文化運動不能開展的局面。

這樣的局面，當然是“九一八”以前的事。

“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形勢比較過去是不完全相同的。帝國主義底大砲聲震動了全中國民衆底心靈，革命的火焰已經可以看見了。民衆法庭底建立，偉人先生底挨耳光，民族戰爭底開展，大小革命刊物底風行，……所有這些都是一九二七以來初次顯現出來的現象。

隨着一般形勢底逐漸開展，中國新興文化，文藝（現在就單談文藝吧）運動也就重新抬起頭來，新的文藝刊物出版了，一般青年大眾也重新注意到了“新興文學”的問題，在文藝上的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又在我們面前提出來了，原來消沈着的中國新興文壇於是又有了生氣。

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在中國的新興文壇上又爆發了一個新的文藝論戰。雖然在這次論戰中仍有許多缺點，但究竟是比“擱筆住口”，不論不戰好得多。

論戰底開端，雖然是在“文新”與胡秋原先生底交兵，但是，正式的大戰却是在蘇汶先生以“第三種人”的資格出現於戰場之後。這正如川戰底開始是在李羅進攻順慶，而正式撕殺却是在劉湘底三路出兵之後一樣。

現在這論戰還在繼續，而且似乎還有更加熱鬧的趨勢。看吧，左翼集團底兵將似乎已經調齊了，正在準備總攻；“已經立誓不和他人爭論”的胡秋原先生不怕“碰破腦袋”，又復重振旗鼓地衝進了戰場；在最近出的二卷二期的“現代”上雖然沒有了蘇汶先生底長篇論文，但在胡秋原先生底文章後面却有一個重要的聲明，由此便可知道蘇汶先生底‘鬥爭

情緒'並未“低落”。

同時，在這條大的戰線之外，左翼集團還在爭論“文藝大衆化”的問題。這樣一來，便就更加熱鬧了。

由此我們可以判定這次的論戰或者不會以“誤會了”，“鬼打鬼”宣告終結，對中國底新興文藝運動將要有所供獻的。

在這次的論戰中，除去一切譏諷和謾罵的文章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特點：

1. 參與論戰的一切戰士都是以精證的唯物主義來武裝自己，與一九二八論戰中的戰士所用的“武器”比較起來，顯然是有很大的進步。

2. 論爭的問題比較過去的要切實得多，這可證明中國新興文藝運動是在日益迫近“理論與實踐底統一”了。

因此，我們認爲這次的論戰是有相當意義的。我個人對參加論戰的一切戰士更是非常敬佩。

自然，在論戰中也有謬誤，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整個論戰底意義。

正因爲在論戰中有真理，同時也有謬誤存在，所以我們

在檢討一九二八以來中國新興文化運動的重大任務之下，來清算此次的文藝論戰是很必要的。

在這次論戰中所爭論的中心問題，當然是“文藝與革命，政治底關係”的問題。如果更具體地分析起來，那便是：——關於文學底定義問題；關於“目的意識”，“宣傳煽動”，“武器文學”——文藝之社會的機能問題；關於“第三種人”與“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的問題；關於文藝大衆化的問題；……

我底清算工作，當然是要以這些爭論着的問題爲程序。不過，在此必須說明一點，即關於文學底定義問題我已在拙文“藝術與思想”中表露了我底意見，爲要少寫一點字起見，此處將不論及這個問題。

最後還須說明的：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新兵”（不是像季季先生那樣的‘新兵’），還沒有獲得鋒利的“武器”，當然配不上來參戰，更配不上來“清算什麼”。雖然我在上面曾吹了不小的牛皮，標出了“總清算”的題目，想要有所議論，但實際上却是胆大心粗的“盲動”。

不過，我要說句僥倖話，我以爲“盲動”比“不動”強，“胆大

包天”比“胆小如鼠”好得多。因此，我以就太不自量地來嘗試這一重要工作了。

二 “目的意識” “宣傳煽動”與“武器文學”

現在我們來“視察戰地”吧。首先觸到我們眼睛的是文學有無“目的意識性”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之下，胡秋原先生開始發表了他底意見。他說：

“……將目的意識運用到藝術作品上，遂成爲“政治暴動”及“進軍喇叭”之理論，遂至抹殺藝術之條件及其機能，事實上達到藝術之否定。樸列汗諾夫常說“藝術家不議論，但描寫”，……而這目的意識論一反映到具體的作品活動之上，即爲單純的概念的政論要素所充滿，表現爲觀念的作品了。換言之，目的意識論者，就是作品上露骨的政治口號乃至政論底結論之意，極模糊的政治理論之機械底適用之意。……（見“讀書雜誌”二卷一期胡秋原著：“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

自胡先生發表了這個意見之後，經過了左翼集團底反

對，蘇汶先生便以“第三種人”的名義出現於戰場了。他在“現代”一卷六期“第三種人的出路”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所謂階級性是否單指那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於是“目的意識”的問題便與“階級”、“鬥爭”的問題聯繫了起來。

蘇汶先生底文章還未出現於世，便爲左翼的舒月先生在“現代”編輯部瞧見了。於是舒先生以爲自己底責任重大，馬上寫了一篇“從第三種人說到左聯”的論文，來檢查胡秋原先生底“階級根基”，回答蘇汶先生底疑問。他對上面蘇先生所提出來的那個問題的回答是：“在無產階級文藝者立場看來，階級性當然在兩個以上階級對立的時候是顯示的，那在不論什麼言語和動作上，有意無意地都是具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的。”可是，這却碰上了蘇汶先生底冷釘子，這冷釘子是：“……無意的，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這是大笑話：無意便不會是有目的意識，有目的意識便不會再是無意。對於‘目的意識’四個大字，舒月先生再張開眼睛認認清楚吧。”（見“現代”一卷六期蘇汶著：“答舒月先生”。）

鬧了半天，究竟“正確”在那一方面呢？我說：在這種形

勢之下，絕對地判斷是不可能的。對於文學之有無“目的意識性”的問題，誰是誰非，要以對問題的解釋來規定。如果一般地說來，則左翼是對的。如果把“目的意識性”解釋成爲“階級鬥爭”，或者解釋成爲“政論底結論”，說一切“目的意識”都有“鬥爭的作用”，甚至有“政治鬥爭的作用”，那反對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我以爲人類底一切表現，一般說來，都是有“目的意識性”的，一切鬥爭具有“目的意識性”更是不成問題；但我們却不能反過來說：凡是有“目的意識性”的，都有“鬥爭，甚至政治鬥爭作用”。我們知道，自殺，醉酒，一般說來，都是具有“目的意識性”的，但却沒有什麼“鬥爭作用”，更沒有什麼“政治鬥爭的作用”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解釋這一問題吧。

“……人類的勞動，使人與獸區別的一唯一的東西，是澈底地目的論的，在受理智指揮的精力消費底範圍之外，沒有勞動。而且勞動在人類生活中佔有一個地位。藝術，就是“最純的”也罷，是澈底地目的論的，因爲藝術要決別了偉大的目的，不論怎樣無意地被藝術家覺得，牠就退化成不過是空談而已……”

這段話中的意見該不會有人反對吧？我認爲這是很正確的理論。

文藝是在人類底生活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同時她——文藝也是人類生活底一面。如果人是目的地，意識地在生活着，那麼，作爲人類生活之一面的文藝底有“目的意識性”，是沒有辦法否認的。

樓列汗諾夫說：“藝術家不議論，但描寫。”這是對的。然而這却不能成爲否認文藝之有目的意識性的根據，因爲就是“描寫”也是有“目的意識性”的，“描寫”絕不是盲目行爲。無論畫家，音樂家，彫刻家……文學家在其創作作品時，都必然要意識地表現着某種情思，都必有其社會的，階級的，或個人底目的，絕不是盲目地創作。所謂完全由感情澎湃，於不知不覺中一氣完成的作品，是沒有的。

政治理論，哲學論文，文藝作品，都是人類社會底意識形態的表現，都具有“目的意識性”，在這一點上，它們可說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區別。所不同者，是政治理論，哲學論文是借着理論的力來表現，文藝是借着活生生的形象的力來表現。

我們知道，馬克思之作“資本論”，是目的意識的行動；同樣，左拉在他那二百五十九萬字的大著——“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之社會的博物史羅賓·麥加爾”中，也目的意識地表明了遺傳性的途徑，有如寫遺傳學一樣，馬克思和左拉都是目的地，意識地在發表其主見，他們所不同者，是前者是在“議論”，後者是在“描寫”。

再就文藝思潮來講吧。一種文藝思潮底出現，自然是爲某種社會條件所規定的，但假如沒有人的作用，恐怕也不會自然地跑到人間來吧。誰都知道，羅曼主義，是在封建社會崩潰，資本主義成長的社會條件之下，湧現出來的一種文藝思潮；但是假如沒有雨果及穿紅色背心的部傑(Theophile Gautier)者流底鼓吹，恐怕她——羅曼主義也不會自然地潮起來吧。

固然，作家目的地，意識地創作一個作品，其結果不一定與他底希望一樣，失敗的時候，倒是很多的。死去了的蔣光慈先生，何常不是目的地，意識地在創作普羅文學的作品，但他所作出來的東西，可以說沒有一個是普羅文藝的作品，“麗沙的哀怨”甚至在客觀上表同情於白俄，還有“反

動”的意味。這便是作家創作作品時的企圖與其結果相違的實例。因此，我們批評一個作品，便不能從作家底主觀意識來判斷，而必須從作品底客觀作用，影響來作說明。

這是對的。但這也同樣不能成爲否定文學之有目的意識性的理由。作家創作時之企圖是一件事，其企圖之成功或失敗又是一件事，絕不能因其企圖之失敗而就根本連企圖之本身都否認了。判斷一個文藝作品，自然要根據那作品底客觀影響，作用，根據其所表現的社會意識，但那作品底客觀影響，那作品所表現的社會意識，至少是與那作家底人生觀，與其創作時之企圖有着關係的。

“存在決定意識”，所有的“目的意識”都要受社會條件底制約。但文藝之有“目的意識性”仍是不能否認的，雖然這種“目的意識性”也是受物質條件所規定。我們之說文學有“目的意識性”，並沒有成爲“意識決定存在”的觀念論者的危險。

不過，像青野季吉那樣機械地把普羅文學分做自然生長的與目的意識的兩個階段，甚至以爲布爾喬亞文藝既有羅曼主義，寫實主義之分，普羅文學也是有這種主義上的差

別的，這當然是錯誤的機械的階段論的說法。因為所有社會現象，都不是自然生長的；普羅與布爾根本不能作機械的對比。

同時要誇大地說：凡是有“目的意識性”的，就有“鬥爭，甚至政治鬥爭的作用”，那也是錯誤的。如果把這種錯誤理論引用到文藝方面來，說一切文藝都有“政治鬥爭的作用”，而且非有這種作用不可，那的確有使文藝作品成爲“政治暴動及進軍喇叭”的危險。

其次，是關於“宣傳煽動”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緊接着“目的意識性”的問題來的。在這問題上，戰士們底爭論是更多了。不過，因爲！——

1. 在這問題的爭論中，我是同意於胡秋原和蘇汶兩先生底意見的。凡是他們已經說過了的話，在此不想重說。

2. 在拙文“藝術與思想”中，已經相當地論究了這個問題。凡是我在那裏談過的話，在這兒也不願再談。

所以，我便打算單獨地將左翼理論家對於這個問題的代表意見提出來加以必要的批判。這有什麼“企圖”嗎？有的！這“企圖”就是要想簡便，要想偷懶。

好，聽左翼的代表理論家易嘉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吧。

易嘉先生說：“……文藝——廣泛的說起來——都是煽動和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這與“目的意識性”相矛盾了。不怕碰上蘇汶先生底冷釘子嗎？——叢）都是宣傳，文藝也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問題是在於做那一個階級的‘留聲機’。並且做得巧不巧妙。總之，文藝只是煽動之中的一種。而並不是一切煽動都是文藝。每一個階級都在利用文藝做宣傳，不過有些階級不肯公開的承認，而要假托什麼‘文化’，‘文明’，‘國家’，‘民族’，‘自由’，‘風雅’等等的名義，而新興階級用不着這些假面具。新興階級不但要普遍的煽動，而且要文藝的煽動。……”點是我加的。（見“現代”一卷六期易嘉著：“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如果不是健忘者，他一定記得——所謂“一切文藝都是宣傳”這一主張，是辛克萊提出來的，並不是易嘉先生底新發現。而且這一主張在過去中國已曾有人介紹，鼓吹過，只是沒有鼓吹起來罷了。現在的形勢似乎又要鼓吹，而且好像比過去還要鼓吹得厲害，“宣傳煽動”的工作成績，甚至於超

過了辛克萊原來的主張。辛氏只說“一切文藝都是宣傳”，易嘉先生却說：一切文藝不但是“宣傳”，而且是“煽動”，而且是“政治的留聲機”。這是多麼澈底，多麼革命的主張啊！

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在易嘉先生底革命主張之下找不到理論根據。

如果因為文藝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對社會可以起作用，便說一切文藝都是“宣傳煽動”乃至“政治的留聲機”。那又好像有些不合邏輯。因為哲學，宗教，倫理……乃至於自然科學，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對社會也有相當的影響，作用，若依照這種解釋，說一切影響，作用都是“宣傳煽動”，那哲學……乃至自然科學也是“宣傳煽動”了。於是什麼文藝運動，什麼理論鬥爭，便可以取消了，社會意識學也可以不要了，專門來講“宣傳煽動”吧。而且，在此情況下，左聯也當改變名字了，改為“宣傳煽動者聯盟”或“文學的宣傳煽動隊”。必須這樣，才適合“宣傳煽動”“政治的留聲機”底真實意義。——這不是在鬧笑話嗎？！

再說，如果文藝是隸屬於政治的，是政治底一部分，是“政治的留聲機”，那在政治學乃至政治問題中就該有文藝

之一章了。可是在伊里奇底“國家與革命”，‘二月到十月’，“兩個策略”……中，却並沒有提出文藝問題來。

總之，“此路不通”，另尋他道吧。

是的，文學對社會有影響，作用，但這作用却不是在“宣傳煽動”，而是在文學之特殊的藝術的社會機能。文學之有特殊性質，作用，正如政治，哲學，宗教……乃至自然科學之有特殊性質，作用一樣。在她們中間，當然也有共通之點，不是絕對不同的。但這共通點是在於她們都是社會底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她們都要或多或少地受經濟基礎所規定，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影響於經濟基礎，却不在於“宣傳煽動”，“政治的留聲機”。所謂“宣傳煽動”“政治的留聲機”，是政治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門。

但是，文藝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起“宣傳煽動”的作用，絕對不能做“政治的留聲機”。某種文藝(如前進階級底文藝)是有(只是有而已，並不是全部都是。)這種作用的，但却不是一切文藝都有，都是“宣傳和煽動，都是“政治的留聲機”。

就談階級問題吧。不然，易嘉先生及左翼底一二理論家

們又要說什麼“否認文藝底階級性”，且而這個否認還不是“偶然的”了。

文藝是喜歡真實的。文藝作品底價值之高下要以其藝術地所表現的真實之程度來判定。但是，所謂真實，並不是絕對的。有完全獨立性的，它是隨着時代，社會，階級，底變化而變化，它要受時代，社會，階級底規定。

每一個階級都有其勃興，衰老，死亡的命運。在其勃興的時候，其主觀的思想和感情是更接近於其時代的客觀的真實的。反之，已經走上了衰老，沒落的道路的階級，其主觀的思想和感情是日益違背其時代的客觀的真實的。因此，勃興着的階級便不畏懼真實，在其歷史的使命之下，還要闡揚真實，宣傳真實；同時組織其思想和感情的文藝也就有了“宣傳煽動”的作用，因為其思想和感情是合於客觀的真實的。反之沒落着的階級便是虛偽的，掩飾真實的，在這時候，他的底思想和感情便不能起客觀的“宣傳，煽動”作用，組織他底思想和感情的文藝便沒有了鬥爭的生命力量；於是時代的文藝家與這階級底思想和感情之間便發生了不調和的現象，其結果必然地要使這些文藝家去走下面的三條道路

之一條——1. 跑到新興階級方面去，作一個時代的前衛戰士；2. 仍然在這沒落階級底“指揮刀”“錢口袋”的支配之下，去宣傳醜惡（醜惡的宣傳當然是沒有多大作用的）；3. 既不去與沒落階級作醜惡宣傳，又不來做一個前衛戰士，而是逃避一切，走進苦惱，煩悶或享樂的國土裏去。這事實在目前的中國也可看到。——在中國統治階級沒落的目前情況之下，中國文藝家走第一條路的是左翼諸公；走第二條道路的是謳歌喫人飲血的“民什麼主義”的文藝家；走第三條道路的，是“沉淪”於香煙，美酒，女人中的郁達夫先生者流。

這樣。請問是不是一切文藝都是宣傳煽動呢？被香煙，美酒，女人圍繞着的文藝是在爲那一階級宣傳，煽動作“政治的留聲機”呢？

我們底意見是：文藝有“宣傳煽動”的作用，新興階級也可以藝術地利用她來作“宣傳煽動”的工具，但却不是一切文藝都是甚至“永遠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文藝是不是呢？那時已經沒有階級政治了啊！——叢）“宣傳煽動”，“政治的留聲機”，有些文藝實在是與此相反的。（在此需要申明的是：說不是一切文藝都是“宣傳煽動”，“政治的留聲機”這話，並

不是否認在階級社會中的任何文藝之階級性的意思。不然，又要誤會。)

如易嘉先生及左翼的一二理論家不以此說爲然，那我就要請易先生們解釋下面這幾個事實。隨便舉一例罷：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首詩是在爲誰“宣傳煽動”呢？是在爲那一階級作“政治的留聲機”呢？大概是在爲杜康老爺吧！

海涅底“悄靜的海濱”，郭沫若底“瓶”，……又是在爲誰“宣傳煽動”，作“政治的留聲機”呢？爲愛神維納絲嗎？

易嘉先生們既斷定了“文藝都是煽動和宣傳”，“文藝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當然在他們看來文藝便是政治鬥爭的武器了；而且這武器底作用還非常大，可以“創造生活”，“改變世界”。

所謂文藝這一武器可以“創造生活”，“改變世界”這個理論，是俄國馬哈主義者波格達洛夫與盧拉卡爾斯基以及未來派的人所發明的。我們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把這理論運用了中國，曾遇到了不少的人底擁護，也遇到了不多的

人底反對。最近，在這次的文藝論戰中，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首先是胡秋原先生對這個意見的抗議，接着是左翼理論家底辯護和解釋，後來便是蘇汶先生底參戰，再後來即成爲了絞在一團的混戰形勢。

這個意見經過胡秋原先生及蘇汶先生底反對以後，左翼底理論家們雖然也說：“……以前錢杏邨等受着波格達洛夫，未來派等等的影響，認爲藝術能夠組織生活，甚至於能夠創造生活，這固然是錯誤。……”（見易嘉著：“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可是他們並不承認這錯誤是原則上的理論錯誤，只是很巧妙地說這錯誤並不在於什麼，而是在於什麼。因此，他們還是堅決地說：“……所以，我們要用文學這個武裝在羣衆中向反對意識開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肅清對於現實的錯誤的觀念，以獲得對於現實正確的認識，而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去革命地改變現實。無產階級文學是無產階級鬥爭中的有力的武器。（比較罷工，武裝暴動如何？——叢。）……”——點是我加的。（見“現代”一卷六期周起應著：“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

乖乖！文藝之用大也哉！她不但可以“肅清對於現實的

錯誤的觀念”，而且還能“革命地改變現實”。這樣一來，我們便無須乎去與統治階級作其他的理論鬥爭，實行文化革命了，因為文藝這個武器是可以“肅清”一切的；同時，我們也更用不着採用暴力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了，因為文藝這武器可以“革命地改變現實”；至少至少我們也應該認為文藝運動為革命的“頭等重大的任務”，必須“號召廣大的革命羣衆”到文壇上來作“宣傳煽動”的工作，來作“政治的留聲機”，因為文藝這武器是這樣的有革命的政治的作用。

不知道我們底理論家們看過這段話沒有？現在我把它抄在下面讓大家瞧瞧吧。

“烈夫底錯誤，至少是它底幾個理論家底錯誤，當他們下藝術要與生活混合的最後通牒時，在最概括的形式中顯示給我們。……換句話，他們的意思是說，詩人，畫家，彫刻家，演劇者一定要停止思索，停止寫真，停止繪畫，停止彫刻，停止在舞臺足光前說話，一定要把他們底藝術直接帶進生活。……而否認藝術是描摹和反照知識的方法，是從正在建設新社會的階級底手中奪去牠底最重要的武器。說道，藝術不是一面鏡子，却是一把錘：牠不反照，却創造。但是在現

在，就是教拿錘的事，也要借助於鏡子，牠是記錄一切動作的銳感的軟片。……”

（這話是對俄國烈夫Lef派說的。所謂“Lef”即“文藝底左翼戰線”。）

真的，文藝有其特殊的藝術的性質，牠之影響於社會，是要借助於這藝術的認識的力的。“教拿錘的事，也要借助於鏡”。說文藝和政治鬥爭，軍事行動一樣，可以“肅清”，“改變”，“創造”什麼，那是誇大的說法。

文藝有武器的作用，新興階級也可以利用這個武器來幫助他底解放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也可說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武器，這是我們所承認的。蘇汶先生說：“……紙燈籠也是件東西，不能說是沒有東西。”（見“現代”一卷六期蘇汶著“‘第三種人’的出路”）更何況是文藝呢？不過，第一，這武器是由藝術的力和人類底思想與感情充實着的。不能與政治的武器一樣；第二，這武器的作用，只能在一定條件，一定限度之下修飾生活，影響，乃至幫助階級鬥爭，却不能“創造生活”，“肅清錯誤觀念”，“改變現實”，當然也不能作“政治的留聲機”。雖說她——文藝與政治有着某種關係。

“不是人們底意識規定社會底存在，反之，倒是社會底存在規定人們底意識。”只要我們隨時記着這個真理，那我們就是不會過分誇大意識形態，特別是最上層的意識形態——文藝之作用的。

三 “第三種人”與“文學上的干涉主義”

“第三種人”這幾個字，在這次文藝論戰中可以說是最引人注目，最出風頭的字了。“論第三種人”呀。“第三種人的出路”呀，“從第三種人說到左聯”呀，……這些引人注目的標題，都大書特書地在“現代”雜誌上顯現了出來；在參加這次論戰的一切文章中，無論長篇或短篇論，“第三種人”總是少不了的；一時之間，“第三種人”便轟動了整個的中國文壇。

開始在文章中寫着“第三種人”的，是蘇汶先生。他在“現代”一卷三期“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寫道：“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着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却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羣。”

自此以後，在參加論戰的一切文章中，便佈滿了“第三種人”底足跡。因為這幾個字是蘇汶先生開始運用，同時又因為蘇先生在他底文章中說了些烘雲托月的幽默語，所以左翼理論家便說蘇先生是“第三種人”底代表。

“第三種人”是什麼？蘇汶先生說：

這“第三種人”容我加上一個解釋吧，實在是指那種欲依了指導理論所規定的方針去做而不能的作者（見“現代”一卷六期蘇汶著：“第三種人的出路”）。

然而，左翼的理論家却說這“第三種人”根本就沒有，因而也就沒有人做得成。易嘉先生說：

作者呢，本來就不是什麼“第三種人”。“……在這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裏，你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麼‘第三種人’”（見“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既沒有“第三種人”，當然就不會有“第三種人底文學”。所以舒月先生說：

“……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其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地是會擁護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文學固然是反資產階級的，但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而又具着反資產階級的，不知又是

什麼文學？……”這是說文學不是資產階級的，便是無產階級的，此外的第三種文學便沒有。

這樣，你說沒有，我說有，你說做不成，我說“未必一定做不成”（蘇汶），誰是誰非，實在難於劇然判定。

“第三種人，乃至第三種人底文藝有沒有？”我們問。

“有！”近代的階級社會斷然的回答。

“在什麼地方？”又問。

“我這裏！”再答。

資本主義社會底階級結構，主要的確乎是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底對立。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事實上，農民（左翼文學家馮乃超先生還提倡過“工農文學”哩！——這當然是笑話！）小資產階級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着。她們雖然沒有獨立性，站在歷史的意義上說來，雖然他們不是寄生於資產階級，便是歸依於無產階級，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她們底倩影存在，而且還在隨處飄忽，隨處活動，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然，爲什麼我們常常都在叫“克服”，“肅清”小資產階級底意識呢？

一般說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是製造文藝的工程師。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她可以給資產階級當聽差，也可以給無產階級作工匠；同時還可以徘徊於兩者之間，去為愛神作奴隸；或者一面反對（當然是不徹底的反抗）資產階級，一面卻又沒有勇氣積極地參加無產階級底解放運動，只是作一個革命的同情者；……小資產階級之沒有獨立性，多樣性，複雜性的，就在這裏。自然，她們這種多樣性，複雜性是被社會的諸條件所規定，不是她們的“絕對自由”所產生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同時也有小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同時也有小資產階級文學。所謂“第三種人底文學”便是由小資產階級底多樣性，複雜性的意識所反映出來的文學。自然，這種文學在全部文學史中，不能單獨地劃分成爲一個階段，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確乎有這樣東西存在，而且還在或多或少地對這社會生着影響，這是無容否定的事實。蘇聯底同路人，我們底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的大部分作家與魯彥。施蟄存，劉吶鷗……乃至郁達夫等，底作品，多半都是屬於第三種的；嚴格說來，就連我們底左翼諸作家也沒有全部地

擺脫這“第三種人”底風氣。

舉一個最近的實例來看吧。

在最近出版的“現代”二卷一期上有一篇魯彥底短篇小說：“胖子”。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是那樣辛辣地諷刺了富兒們底生活形態，很顯然地表示出這小說不是資產階級底“政治的留聲機”，但同時你也不能說是無產階級底“宣傳煽動”的作品，是什麼？是“第三種人底文學”。

“……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其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地是會擁護資產階級的。”如果這話是真的，那左翼諸作家便都有擁護資產階級的嫌疑，因為嚴格說來，從蔣光慈到自稱“普羅詩人”的張澤厚，從丁伶到“豆腐阿姐”的作者文君底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

“據我現在想來，這‘第三種人’未必一定做不成，而且確實已經存在了。祇有從狹意的階級文學理論的立場上看來，這‘第三種人’才會必然地做不成。……”（見“第三種人的出路”）

“第三種人”及其文學是有的，“而且確實已經存在了”。這種文學不見得盡都是在為資產階級作“政治的留聲機”或

者“和緩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其中反對資產階級，同情於革命的文學（如同路人底文學），對無產階級文學還有很大的幫助。

所謂“武器”，不一定就是專門指着坦克車，礮艦，飛機等說的，此外如手流彈，萊佛槍……乃至大刀鐵棍，也是可以稱為武器的。革命不但需要坦克車，而且還需要萊佛槍，同樣，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是有力的武器，對革命有作用，但我們却不能說除此之外，就沒有武器，其他一切文學都是不中用的，如果有一個同路人底作品，是客觀地暴露了統治者底醜惡，使一般大眾對統治者發生厭恨的心理，那麼，即使這作品沒有把無產階級寫得“甜如糖，堅如鋼”光明如太陽，我們也不能否認它底客觀的革命影響，說它對無產階級一點沒有用處。

因此，站在新興文學運動的立場上，我們對於這“第三種人”及其文學不能一概反對，當然也不是要置之不理，這兒便須談到“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的問題。

普羅列特利亞是否要干涉文學呢？“文學上的干涉主義”對普羅列塔利亞是否必要呢？“回答是”：

“十分顯然，就是在藝術方面，×不能，一天也不能，採取自由政策和不過問政策底原理。問題只是干涉應當從何點開始，並且什麼是牠底範圍；在什麼情況並且在什麼中，×應當選擇。這問題一點也不像烈夫底理論家，無產階級文學底前驅和批評家們所想的似的簡單。”

“我們說普羅列塔利亞底勝利，決不只是狹義的政治的勝利的意思。……要經過經濟的及文化的革命才能算是完全的解放。……”普羅列塔利亞爲了其所負的歷史使命，在文學上必然地要採取“干涉主義”。這不但對於他自身底完全解放有必要，就是對於全人類底福利也是有必要的。因爲普羅列塔利亞底完全解放，就是全人類底完全解放，就是引導人類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所到達的目的地。所以問題不在於普羅列塔利亞不干涉文學，而是在於怎樣干涉。

蘇汶先生在“現代”二卷一期“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一文中說“……但是我却並不是和干涉主義相反的絕對的放任主義的主張者。我也覺得，干涉在某一時候也是必要的，這就是在前進的政治勢力或階級的敵人也利用了文學來做留聲機的時候。……”又說：“……我們一定會斷然地反對那

種無條件的當政治的留聲機的文學理論，反對干涉主義，要是這種干涉會損壞了文學的真實性的話。……”

這樣有條件地贊成干涉主義，和有條件地反對干涉主義，都是對的。

然而他在同一篇文章裏却又這樣說道：

“每當文學做成了某種政治勢力的留聲機的時候，（我不知道蘇先生在這句話中有沒有這樣的意思：每當文學受到了某種勢力底干涉的時候？——叢。）牠便根本失去做時代的監督那種效能了。它不但不能幫助歷史的進化，反之，它是常常做了歷史演化的障礙，它因為有時不得不掩藏了現實去替這種政治勢力粉飾和平。在一切文學之中，我們如其可以說和社會不發生關係的作品是無用的，那麼我們便可以說，那些‘掩飾現實’，‘粉飾太平’的作品是不但無用，而且有害的。這有害，不是對於某一特殊階級而言，而是對於整個人類進化而言。”

接着他在說明了歷史上每一個階級當其在革命時是促進歷史前進的，反之，當其成爲了統治階級時，則便是阻礙歷史前進的，他在說明了這個之後，又說：

“照理，很明顯地認識了自身的使命的新興無產階級是應當不再踏這過去的覆轍了。牠知道目前的階級鬥爭，以至於階級獨裁，都無非是歷史演化的某一過度形態；如果把整個演化放在眼中，那麼這過渡形態是應當希望它愈過渡得快愈好。……然而不幸，歷史的公式却依然支配着我們的新興階級，因為我們在這裏碰到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

“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已經在那裏建立着一種絕對從階級的立場出發於新文化的系統了。……簡單說，他們是同樣地在造着文化上的萬里長城。”

我不知道蘇汶先生底意見是不是這樣？——

在本質上，無產階級也與資產階級一樣，當他獲得了政權時，也要“死勁來拖住歷史，不放它前進一步”，“他是同樣地要造文化上的萬里長城”，在他底政治利益之下，也同樣需要文學來爲他“掩藏現實”，“粉飾太平”，因而文學如果受到了無產階級政治勢力底干涉（是“干涉”，不是做“政治的留聲機”）時，也同樣會失掉“監督時代的效能”。

如果是這樣，那便不見得是正確的。因為：——

1. 在目前，無產階級是促進歷史前進的主動力，他底主觀的必要，是最適合於歷史的客觀的必要的，他不但不“掩藏現實”“粉飾太平”，而且還要闡明現實之一切真偽。因此，文學愈接近於無產階級，則便愈有“做時代的督監那種效能”。自然所謂接近無產階級，不一定就是去為無產階級作“政治的留聲機”，因為無產階級不但有政治上的歷史使命，而且還有文化，文藝上的歷史使命，他不是一定要每一個文學家都來機械地為他作“宣傳煽動”的工作的。

2. 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後的階級，他底解放，便是全人類底解放，他底歷史使命，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還要解放全人類，消滅階級，創造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因此，他絕不會“拖住歷史，不肯放牠前進”。

3. 現存蘇聯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陣營中底一切現象，有沒有“掩藏現實”，“粉飾太平”，阻礙歷史前進的地方，那是另一問題。即或有了，我們也只能說某種策略之不對，絕不能因之就說無產階級在本質上也有問題，拒絕其干涉文藝。

這是我底意見，不知蘇汶先生以為然否？

現在，再看左翼底理論家對於“第三種人”的態度吧。

我們底左翼的一二理論家勇於原諒自己。當他們發現了自己有了缺陷和錯誤時，他們便要向別人宣布道：“……對於左翼作家只應在積極性的批評上鼓勵督促，不當有消極的失望，惡意的嘲笑”；（舒月）或者說左翼理論家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還在想幹什麼，至少總比某某好點。可是他們對於“第三種人”怎樣呢？那便是和蘇聯的前哨派及列夫派一樣，組織兩個團體，要你（指“第三種人”）去參加；製定一個大綱，要你去遵守。如果你服從了命令，那便說你是頂刮刮的左翼作家；否則他們便要向你說，“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其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地是會擁護資產階級的”，你底文學不是無產階級的，也就不能例外地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擁護資產階級的文學，便在“肅清”之列；或者直接罵你受“錢口袋的支配”，“走狗”，“綿羊”；或者間接諷刺你底某種意見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這樣一來，便真的有些“難乎其為第三種人”了！

當然，這也是左翼的一二理論家底“文學上的干涉主義”，不能說他們是沒有“主義”的。但這種“干涉”比“不干涉”還要壞。因為“不干涉”還可以讓“第三種人”自由創作，

一“干涉”便會要使得“作家擱筆”。——這是拒絕“友軍”的辦法。其結果在客觀上會生什麼作用，我們不說，還是讓左翼理論家去“積極鼓勵”自己好了，不然又會要被認為“惡意的嘲笑”。

我以為有些作家在他底作品中雖然沒有“指明出路”，只要他“確實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暴露了統治者底殘暴和醜惡，即使他表現，暴露得不充分也罷，對於新興文學都是有利益的。因此，站在無產階級底立場上，對這樣的作家，我們底左翼理論家便當更明確地向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底黑暗之所在，告訴他表現，暴露其黑暗的方法，同時向他解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好好地引導他到革命的集團裏來，增加革命的力量，不應“惡意的嘲笑謾罵”。歷史告訴我們：知識是漸次集壘着的，新興文學並不是由天上掉下來的，假如我們連同路人底文學都要反對，拒絕，絕對地說“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其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地是擁護資產階級的”。那我們底新興文學將要怎樣建立，發展呢！？而且，在目前形勢之下，一般形勢還未全部的開展，我們還應該幫助同路人去普遍地暴露統治者底罪惡，描畫他們投

降帝國主義的醜態，暴露他們奪取一般大衆底自由和吸飲工農血汗的殘酷，諷刺他們生活的下流，墮落形式，……這樣使同路人底文學在質和量方面都增加起來，漸次地發生“由量變質”的轉變作用，以展開新興文學運動的整個局面。

然而，我們底左翼理論家對同路人的辦法，却是命令，命令不行，即破口大罵！這怎不叫人“消極的失望”呢？

四 關於“文藝大衆”的問題

“文藝大衆化”，這個口號似乎是在兩三年前就被人提出來了。不過，只是提出來而已，並沒有收到好多效果。直到現在，我們不但沒有看到偉大的“大衆化”了的文藝作品，而且連“大衆化”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都還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今年的確是一個熱鬧的年頭兒，在中國文壇上，除了對其他的問題發生了劇烈的論戰外，這“文藝大衆化”的問題也成爲了論戰中的一個主要程序。而且，在這一問題——“文藝大衆化”的問題之下，論戰的範圍還要比其他的問題

爲大。對這問題不但左翼與其他的人發生了爭論，就是左翼各個理論家底意見也不見得完全一致。不過，我們在作清算工作的時候，總是希望此次對這問題的討論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來，不要再像過去一樣，只是呼呼口號，鬥鬥嘴便算完事。

梁實秋教授曾經說過：“實在講最高藝術用任何方法亦不能傳達於大眾。……藝術自身有許多等級，所以藝術的鑑賞亦有許多等級，不能一概而言。”（見梁實秋著論文：“戲劇藝術辨正”；此文被集在梁氏所著“古典的與浪漫的”書中。）這當然是布爾喬亞底最高藝術的理論，中國勞苦大眾受到了這種最高藝術理論及在這一理論下所發生出來的文藝現象底隔絕，再加以其他一切客觀條件底阻礙，與近代的文藝世界幾乎完全絕緣了。於是舊社會底一般通俗文藝便重重疊疊地把他們包圍了起來，使他們始終跳不出“連環圖畫”，“章回小說”的圈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大眾從“連環圖畫”，“章回小說”中解救出來，給他們以新的文藝的食糧，便成爲了中國新興文藝運動當前的一個重大任務。這是被參加此次論戰的理論

家們所一致認可的。因為這兒沒有什麼爭論，所以我們也就無須把大家一致的意見再為介紹出來，以多佔篇幅。

可是怎樣大衆化呢？這便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了。因為文藝應該大衆化是一回事，大衆底文化水平低下又是一回事，而文藝必須向着前面發展另又是一回事，但解決起來必須要三者不相衝突，你想這是多麼麻煩的事呀！

易嘉先生在“北斗”二卷二期“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說：“紳商的‘智識階級’既然自命為‘智識階級’，那自然是比平民高出一等的人物了。所以他除詩古文詞四六電報之外造出了一種新文言的‘深奧而高妙’的新文藝。……而同時，煽動着烏煙瘴氣的武侯主義，岳飛主義……的反動的大衆文藝，從說書小唱直到電影；這是‘為民衆’的藝術！這是他們擺下的迷魂陣。他們會在‘大衆文藝’之中來反對禮拜六派嗎，來反對大衆文藝之中的林琴南嗎？當然不會。……但是，勞動民衆可需要反對這些烏煙瘴氣的東西，勞動民衆要自己創造革命的普洛的大衆文藝……這種新的文藝運動是開始了。這是五四之後的一個真正新的文化革命的浪潮。”

這是說：文藝要大衆化，便必須“勞動民衆自己創造革命的普洛的大衆文藝”。這大衆文藝底創造，是在“五四之後的一個真正新的文化革命的浪潮”中，換句話說，要創造大衆文藝，便必須澈底實行“五四之後一個真正新的文化革命”。

一般說來，這是對的。一九二八以來的中國新興文化運動，便是這“新的文化革命”底表現，不管其表現到了什麼程度。

但是，易嘉先生接着又說，“……中國的勞動民衆，都需要根據自己口頭上的說話，造出絕對白話的新中國文。只有這樣——完成民權革命的‘創造民衆的文字’的任務——才能夠開展新的文化革命的鬥爭，……”又說：“新的文化革命——絕對的白話文和羅馬字母寫的中國文的實現，不過是這個任務的一部分最低限度的一部分，必須積極的有系統的爲着這個去鬥爭。……”

同時，宋陽先生也說：“新的文學革命的對象是新式文
言的假白話和舊小說的死白話。而新的文學革命的目的，是
創造出勞動民衆自己的文學的言語。”……（點是原有的）又

說：“……因此，我們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首先提出來的要求不是文藝技術的問題，而是一些最初步的必須先解決的問題，例如中國所特別有的文字（言語，話）的問題……”又說：“至於方言文學用的文字，那就只有用羅馬字母拼音之後才能夠徹底解決。……”（見“文學月報”一卷三期宋陽著：“再論大衆文藝答止敬”）

這顯然是說：要文藝大衆化，便必須實行“新的文化革命”；在這中間，尤須努力文字，語言的革命，而且還要用羅馬字來拼音。

此路通嗎？止敬先生回答道：

“……原來文學作品當動筆寫下來的時候，文思汹涌，簡直是一句一句滾出來，每遇到有寫不出的字便會停滯，如果一個字一個字的寫法拼法都得意識地想一想，那就糟了！……所以用固有的漢字來拼‘土話’的音，既然不行，用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也有未便……”又說：“技術是主，文字是末”，即使讀出來得懂，要是技術方面還像前幾年的‘革命文學’，那就不能使大衆感動，仍舊不是大衆文學。”（見“文學月報”一卷二號止敬著“問題中的大衆文藝”。）

鬧了三四年的中國新興文化運動，直到現在才要來實行文字，語言革命，用羅馬字拼音，這是多麼進步的現象啊！

聽說中國統治階級曾經提倡過，而且現在還在提倡用注意字母拼音的辦法，可是，事到而今，還沒有看到什麼成效。易嘉和宋陽先生現在要來用羅馬字拼音，創造“絕對的白話文”，大概是因為他們比統治者更富足，更有辦法吧？大概是因他們能夠給中國勞動大眾創立無數的學校，編輯無數的羅馬字拼音法，教科書，去教授一般勞動大眾，創造“絕對的白話”吧？不過，據說勞動大眾比資本家要窮苦若干倍，他們爲着生活，沒有好多時間來學羅馬字拼音法，而我們底易嘉和宋陽先生聽說也和我一樣，是“寒士”，“窮光蛋”！（註）

至於完全打倒所謂“新文言”和“假白話”。而創造出來的“絕對白話文”，我們還沒有看到過。最好是請易嘉先生們創作幾篇“絕對白話文”的東西出來以作一般模範，看看究竟“絕對”到了什麼程度，是否是要把“我，你，他”廢除了而代以“阿拉，儂，伊拉”？

我以爲勞動大眾是很窮困的，他要忙於生活，忙於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他不能整日整夜地來學習“羅馬字拼音

法”，創造“絕對的白話文”。因此，在目前的新興文化運動中，不能專門妙想天開地還要去用“羅馬字拼音”，打倒一切固有的東西來創造什麼“絕對的白話文”。中國現在所流行的白話及白話文，雖不見得爲每一個大衆所聽得懂，雖不見得爲每一個識字的勞動者看得懂，但除去一切方言外，一般的普通話是爲大部分的大衆所了解的；除去一切歐化文字外，一般普通場合的白話文大致是爲識字的人所能看懂的；我們應該利用這種普通的白話及白話文來創作東西，來創作適合於大衆的新的內容和形式的作品，用不着再去創造什麼“絕對的白話文”，更用不着用什麼“羅馬字來拼音”，與其去教大衆學習“羅馬字”，創造“絕對的白話文”，倒不如多做一點識字運動好點。

易嘉和宋陽先生底反對固有的一切文字，語言，創造“絕對的白話文”，用“羅馬字”來拼音，這個主張當然是很“左”的。可是，“極左”每每容易變成“極右”——

歐戰以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發生了經濟恐慌。布哈林見了這種形勢，便說這個恐慌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沒亡。可是一到資本主義來了一個暫時的安定時，他便宣

佈資本主義是在“恐慌，安定……”的形勢下，有機地發展；此次的安定算是“第二時期”，現在就是“第三時期”，以後還有“第四時期”第五時期……以至於無窮！

中國某文學家在前幾年大家都在高唱普羅文學時，他也努力普羅文學運動，甚至在一篇小說裏寫作一個女革命家用飛機散傳單，做革命的“宣傳煽動”工作的故事，來表示他底徹底。但是一到幾個普羅文藝刊物被封，普羅作家受了通緝，“民族主義文學”出現時，他便拚命地向右邊跑去，高呼“民族主義文學萬歲”了！

周全平老爺在某公當道，人們正嚷着什麼高潮時，是多麼徹底呀！可是形勢一變，他老爺便捲款而逃，跑去當資本家去了！

.....

這些都是由“極左”跑到“極右”甚至於……的事實。

不幸我們底易嘉和宋陽先生今朝已由“左”走到了“右”。這事實在下面兩個意見中顯示了出來。

第一，易嘉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說：“新的文化革命之中，革命的文藝運動將要是一般革命鬥爭的強有力的隊伍。

它應當反對一切封建殘餘的文化上的束縛，肅清封建殘餘對於羣衆意識上的影響，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奴才思想，這樣去澈底的完成五四所開始的偉大的鬥爭。……它還要開展自己的鬥爭，不但反對封建殘餘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思想上的壓迫，而且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

易嘉先生在反對一切之後，對於資產階級是寬宥了。起初他是只“反對，肅清一切封建殘餘……”，並不反對資產階級。後來雖是“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但都是要在“開展自己的鬥爭”之後，而且還是在“不但……而且”這樣的形勢之下來附帶地反對。

我們當然不會像一般罵街的潑婦樣，因此就說易嘉先生爲資產階級作了什麼什麼；而且這是中國革命問題中紛爭着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在此詳加論究。不過，我有幾個問題要向易嘉先生請教，即：——

A. 易嘉先生說資產階級投降了封建殘餘，五四文化革命底任務並未完成，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底主要任務，是要完成五四所未完成的任務。由此，是否可以說目前的新興

文化運動底任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樣？

B. 宋陽先生說：“現在中國的出版界，的確是一種新文言佔着統治地位”。這話是什麼意思？這種“新文言”是否是資產階級投降了封建殘餘之後所創造出來的？

C. 易嘉先生所謂的“新文言”不但資產階級底學者在運用，就是一般左翼文人也在運用。在此情形下易嘉先生是否還要堅持“反對一切新文言”，創造“絕對的白話”的主張？

D. 易嘉先生說目前的新興文化運動，是在“完成民權革命”。“官方”(蘇汶)也說目前中國革命底性質是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若依此，則目前的新興文化運動，便是資產階級性的了；普羅文學運動，也是資產階級性的普羅文學運動了；……這是否有點笑話！？

E. 如果易嘉先生說不能這樣機械地推論，說文學與政治不同，那我就要問：為什麼易嘉先生要說“文藝永遠是，到處都是政治的留聲機”呢？

第二宋陽先生也在其同一篇文章中喊出了“反對一切新文言和死白話”“用羅馬字拼音”“創造絕對的白話文”這類的口號之後說：“……必須在最初一期運用淺近的描寫方

式。採取舊小說的‘形式上的形式’……羣衆將要接到一些形式上和征東征西傳相像的‘作品’，而內容是不同的。……”

張天翼先生也說：“詩歌可以採用民歌，山歌，大鼓詞等的形式，叫大家唱得上嘴，而且懂。……劇本可以採用京劇形式，再慢慢發展到歌劇。（近年來哈拔羅符期克等地的京戲是循這條路走的，而且試驗得成功了。）（見“北斗”二卷三四期四五九頁）

採取“京戲，山歌，大鼓詞”的舊形式創造新興文學，在“征東征西”似的舊形式中，放着新的內容，這不是“舊皮囊裝新酒”的辦法嗎？這不是加強包圍大衆的“連環圖畫”的圈子的辦法嗎？罵了一陣封建殘餘之後，又走來握着它底手說：我還得利用你底舊形式，因為這適合大衆！世間還有比這再滑稽的事情嗎？

“文藝大衆化”運動，是一種進步的運動，絕不是要開倒車，要復古，要把文藝還原於“連環圖畫”，“章回小說”以及“哭七七”等舊的形式。一切工作都是很堅苦的，不要希圖一點小的便宜而就把根本的原則都不要了。要知道，新的文藝內容是需要新的形式的。如果要用舊形式來裝新內容，那便

會要使新的文藝退後，失掉“藝術價值”，結果成爲蘇汶先生說的“不要文學！”

自然，這並不是要像易嘉先生一樣，必須“打翻”，“肅清”一切，再創一個什麼“絕對的”東西來。舊的形式對於新興文藝並不是全無用的，其中之某些部分還是新興文藝形式所不可少的因素，新興文藝必須要繼承，不必一定加以全部地“肅清”。而且，在某種情形下，暫時地，部分地也可以利用這種舊形式來創作，以應付大衆一時的急需。但這絕不能當作一個大的計劃來運用，更不能幻想在這中間產生“福祿培爾，托爾斯泰”，因爲這兒是暫時的利用而已，不是一個主要的，長久的工作方針。

總之，我們是要把大衆從“連環圖畫”的圈子裏解救出來，不是去加強這圈子。在目前，主要的，我們應當：努力介紹和創作馬列主義的東西，普遍地與一般布爾喬亞，封建殘餘底一切思想論戰；批評一般麻醉大衆的舊的文藝，以新的形式創作為大衆所要求的一切文藝作品；在中國經濟問題，革命問題，文藝問題……上，一般地實行公開的理論鬥爭；建立新興的正確的理论基礎；加緊大衆底識字，讀書運動，

以提高其文化水平；努力一般術語名詞之統一運動，努力語言底統一運動，……………這樣，以展開中國新興文化，文藝及文藝大衆化的運動。（關於大衆化的許多技術問題，在此無須詳論，因為說的人也太多了。）

在“文學月報”一卷三期上有一篇不知道是易嘉還是宋陽先生著的文章。“論弗里契”。我看了之後，本來打算在此發表一點關於文藝批評（科學批評與黨派批評）的意見，現在想來，覺得沒有十分必要。因為這篇文章所說的理論都很空泛而不具體，如果批評起來，除積極地發表自己底意見外，實在起不到好大的批判作用。同時，我相信在這篇文章中所談的問題，一定不很簡單，將來必要在中國文壇上引起論辯。到大家論辯起來時，再來發表意見也不算遲。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便就略而不論。

五 結論

易嘉先生說：“……錢杏邨那樣的幼稚的馬克思主義學生，東扯一些，西拉一些，在文藝理論和批評上表現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他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不了解。……”（見“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如此說來，易嘉先生及一二左翼理論家們當然很深刻，

不“幼稚”；很無產階級化。沒有一點“小資產階級底劣根性”，很“了解證辯法唯物論”，不會犯什麼錯誤的了。然而事實總是出人意料之外！在這次論戰中，易嘉先生們底表現，不但不是比錢杏邨先生更高明，而且在許多地方反是比錢先生更爲“幼稚”。雖然易嘉先生們嘴裏在說“了解辯證法唯物論”，可是實際上却是機械的絕對主義在支配着他們底腦袋。

因爲文藝對社會有反的作用和影響，易嘉先生們便說：“文藝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文藝這個武器可以“肅清對於現實的錯誤的觀念”可以“革命地改變現實”。——這是比錢杏邨先生底“文學可以創造生活”的錯誤意見還要錯誤的主張。

因爲文藝有階級性，易嘉先生們便說：“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其間接直接有意無意地是會擁護資產階級的。——這又是多麼機械的絕對觀念啊！”

因爲資產階級有文字，語言的革命，易嘉先生們便以爲無產階級也非來一次文字，語言的革命不可，主張“肅清一切新文言和假白話”，“用羅馬字來拚土語方言的音”，“創造

絕對的白話文”——這是機械觀念底更進一步的發展。

此外，這種機械的絕對主義在另一個問題上也同樣表現了出來。易嘉先生說：“……就是五四時候最初主張推翻禮教的人，都聽見鄉下人劈掉神主牌位，打掉泥塑菩薩，就急得發瘋，就拚命的反對，而且反對真正的民權主義，而要恭請紳商買辦‘一律平等’的參加普通選舉的國民會議。對於他們——‘科學’和‘民權’的旗幟，已經早就丟在中世紀的毛坑裏去了。……”（見“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不知道在目前中國的形勢下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心政治口號。不過像易嘉先生那樣的絕對論——只要是叫“普通選舉的國民會議”者，就是要‘恭請紳商買辦’來做什麼……，就是把“科學和民權的旗幟丟在中國世紀的毛坑裏”。——，我是覺得有點武斷。因為我曾風聞伊里奇到一九一七年也曾不止一次地用“憲法會議”的口號，若依易嘉先生那樣絕對的論調，則伊里奇不是也勾結了“紳商買辦”（借用）嗎？同時，聽說“官方”現在還在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絕對自由”的口號，若依易嘉先生，則“官方”不是也是在勾結“紳商買辦”來“一律平等”地爭“絕對自

由”嗎？這就是易嘉先生底“正確”，這就叫做“馬列主義”，實在有些令人難懂！

總之，錢杏邨先生錯誤了，易嘉先生們也並不比錢先生正確，他們是一貫地“墮落了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之信用，每一個真實唯物史觀的信徒都有抗議的權利”（胡秋原）！

其實錯誤也不要緊，只要接受批評，勇於改過，亦不失其為正確。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錯誤”還是“正確”底一個步驟。但是，假如在“錯誤”之後，又加在“橫蠻”，那便糟了！

從錢杏邨到易嘉先生的少數左翼理論家們在文藝理論上曾經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錯誤，有時候他們自己也承認。但是，假如有人公開地給他們指出來時，他們便要說這是“惡意的嘲笑，進攻”了！於是他們就要即刻“動員廣大的羣衆”來說這批評他們的人是“什麼反動”，“什麼派”，“什麼狗”……企圖在這種謾罵的方略之下來掩飾自己底一錯再錯，而且現在還在繼續錯的理論。在作理論鬥爭時，有時候，特別在他們底許多小刊物上，甚至一點道理不講，只是破口大罵。他們是專門用“鑿棍主義加帽子主義”（陳雪帆）取勝的。至於什麼“克服”，什麼“自我批判”，只不過是他們抵制

批評，維持錯誤理論的一種工具罷了！

“……老實說，祇有正在沒落的階級才懼怕真理，不要真理，因為每個客觀的真理對於他們是不利的。……”（周起應）對呀？但是你們爲什麼要迴避理論鬥爭，動輒就說批評你們的人是受“錢口袋的支配”，是“什麼派”，“什麼狗”，“什麼反動”呢！動輒就實行“警棍主義加帽子主義”呢？

尤有甚者，是在中國新興文化運動中，有許多重要工作，他們不做，別人做了，這站在他們應站的立場上是必須加以贊助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的都是完全相反。他們對此不但不贊助，反而要“吃乾醋”，說這是“坐在亭子間裏空談理論”，是在“緩和革命鬥爭”，是有什麼了不起的企圖，非加以反對乃至“肅清”不可！

這種現象，恐怕只有咱們中國才有！

“在‘目前’這情形下，愚盲是幸福的，而沉默是聰明的。”這是蘇汶先生底“明哲保身”的格言。不過，我是一個頭等的傻瓜，當大家都在“沉默”，追求“幸福”的時候，我却來說了這許多僥倖話。這些僥倖話在易嘉先生們看來，當然算是**罪大惡極**，不但應該罵爲“狗”，而且還須“碎尸萬段”，以

除“禍根”。我想，假如易嘉先生們真的對自己理論一點都不動搖，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理論地指出了我底“錯誤”時，就是罵我兩句，甚至要大辟也不要緊。因為這麼一來，或許還可使我變“聰明”些，知道“沉默”着去追求“幸福”。但是，假如要蠻不講理，不論是非黑白地加以謾罵，甚至造謠攻擊個人，那我確是不敢歡迎的。因為我以“警棍主義加帽子主義”並不一定是“馬列主義”。

註：我以為用羅馬字拼音的辦法，未始全不可用，不過，在目前形勢之下，要以“用羅馬字拼音”，“創造絕對的白話文”為文化運動的主要任務，却是非常錯誤的。我反對以“羅馬字拼音”創造絕對白話文為文化運動之根本任務，認為這一工作，須要在全國真統一，大眾知識水平較高之後才能發生效用，才能完成，目前只能當作一個附帶的工作來做。

一九五三，一三，二〇夜。

一九三二年之內音界

張世傑

一

一九三二年，在中國，也算是多事的一年；跟了東北的事件，迎着新年，在中國的文化中樞上海，又發生了戰事，接着又是四川內戰。音樂和別的一般藝術一樣，是需要着地方的安甯和經濟的餘裕的。音樂之在中國，本就很不景氣，更受了種種的影響，其萎靡不振自不待言了。現在姑將我

個人所知道的一九三二年一年間的國內音樂界，作一個概括的檢討。

二

大約是因為國內音樂界不振的緣故吧，在國內一向還沒有一個全國樂人的調查表。至一九三二年為止，據我知道，在國內活動着的樂人共有二十餘人，茲照着姓氏的筆畫多寡為先後列表如下：

姓 氏	事 業	所 在 地 方
王 自	作曲家	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
王瑞燭	理論家	南京
仲子通	聲樂家	上海
李樹化	作曲家	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
杜庭修	聲樂家	未詳
冷韻清	鋼琴家	上海私立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宋居田	聲樂家	成都四川藝術專科學校
沈秉廉	歌曲作詞家	上海商務印書館
吳夢非	理論家	浙江省立高級中學

邱望湘	作曲家	上虞春暉中學
胡周淑安	作曲家	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
馬思聰	提琴家	未詳
唐學詠	作曲家	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科
陳嘯空	作曲家	武昌私立藝術專科學校
徐希一	理論家	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程懋筠	聲樂家	杭州市立民衆實驗學校
湯鳳美	鋼琴家	上海藝術專科學校
趙元任	作曲家	北平
黎青主	作曲兼理論家	未詳
劉天華	中樂改進家	北平(今年去世)
劉質平	理論家	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潘伯英	提琴家	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錢君匋	作曲家	上海
繆天瑞	理論家	上海
豐子愷	理論家	上海
蕭友梅	作曲家	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
譚抒真	提琴家	

這中間，演奏家只以作教授者爲限。

現在把少數樂人的值得注意的行動，略略說一說。聲樂家杜庭修于這一年中(?)在大中華公司灌了四張唱片，所唱的歌曲都是中等程度，有送別（豐子愷等編歌曲集六頁）秋夜（錢君匋編中國名歌選六五頁）等八首曲，頗可爲中學生的鑑賞唱片及中學教師的參考。黎青主本在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編輯樂藝季刊的，但商務被毀，樂藝停刊後，他也就離開該校了——且有一說謂已離開上海了。劉天華本是北平國樂改進社社長，主辦音樂雜誌，他死後，該社無形解散，音樂雜誌也停刊了。繆天瑞先年是在武昌藝術專門學校，這一年重回了上海，專事著述。譚抒真早就離開上海回到故鄉山東去，這年聽說曾重來上海過，但未聞有何種活動。此外尚有聲樂家趙梅伯去國未回；傅彥長等停止了音樂活動。

三

至一九三二年爲止，國內共有音樂教育機關如下：

名稱	主持者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蕭友梅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音樂系	未詳
新華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	潘伯英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	李樹化
中央大學藝術科	唐學詠
四川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	宋居田
武昌藝術專科學校圖音系	陳嘯空

上海美專音樂系本為劉質平所主持。自一九三〇年起了風潮，劉氏離校以後，該校曾有廢止音樂系之說，暫時曾由劉校長主持一學期(?)，現在情形不詳。劉質平離開上海美專，即和徐希一等同在新華藝專音樂系活動着。因為美專和新華兩校原是勢不兩立的，所以教授們有時不免有所偏袒。國立藝專的音樂系是這一年中才開辦的，一九二九年曾開辦過，但不曾得到教部的同意，還是中止了。現在終於辦成功了，實在是件可喜的事。四川藝專音樂系，這一年中本來很有可觀的成績，因該校這年特派教授宋居田來滬購辦全隊管絃樂樂器，練習好後，預備到各處作旅行演奏，不幸，四川忽然起了內戰，學校所在的成都成了戰事中心地之一，這副樂器大約也要落得個散失無遺了吧。

四

說到音樂書物，真是寥寥無幾。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所辦的樂藝，頗有蒸蒸日上之勢，主編的是黎青主，一位中國樂界出色的人才，印刷也十分精美；開初幾期似乎沒有甚麼，頗嫌空虛，但最後幾期——六期七期吧——着着充實起來了，且時有討論和批評的文字的出現，可是因爲一二八的戰事，刊物的刊行處商務印書館被毀，也就跟着停刊了。這實在是很可惜的，北平國樂改進社編的音樂雜誌，也于這一年中無形停刊，原因據說是因爲社長劉天華的死，他死後便無人負責幹這事了，這也是很可惜的。

固有的只是毀去，新的却没有生出來，這怎不教人覺得悵然呢。只有在這一年中產生的——一個還是重生的——兩種雜誌裏，間或看見一些音樂的文字。即摩社編輯的藝術旬刊上，有幾期有繆天瑞的翻譯文字，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編輯的阿波羅復刊號上有一篇吳潤蓀作的文字。據說藝術旬刊以後將改爲月刊，我希望改爲月刊後能多載一些音樂文字。此外別的雜誌上，往常也常有關於音樂的文字的出

現，這一年幾乎完全沒有了，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只有圖書評論第一期上王瑞嫻評蕭友梅的作品的文字，這倒是值得注意的。關於這事頗有一提的價值。

蕭友梅的作品的好壞，只要略略學過音樂的人，便可以知道。他既不懂樂曲形式，也不懂和聲的運用法，自己亂造亂做（他指揮樂隊時，A. Foa就說他是在發狂），幾年前被他騙的人的確頗不少。近年來大多數的人都已覺醒了。不過王瑞嫻的批評也頗有些不妥的地方，譬如她先年批評黨歌（黨歌做得錯誤連篇，是盡人皆知的，又自作別論。）時（文見東方雜誌）在某段文中說轉回了的同和絃的四部並進行也認為不許的，這非但如黨歌作者程懋筠答她的話中所說的，不能以看讚美詩的眼光來批評，並且用十八世紀以前的嚴格對位法的進行拘束上尚且沒有的規則來批評了。她批評蕭友梅的作品時，也就免不了這樣。因為作曲是作曲，和聲習題是和聲習題，拿和聲習練的看法來看音樂作品，全然不對，是誰也知道吧。蕭友梅的作品，如王瑞嫻指出的地方，其實有些都是可以的。他錯的不在小部分，倒是他的大體佈局的完全不對。新霓裳羽衣曲可為這完全不對的代表作。

此外在某文藝雜誌上有些音樂的文字，所用的譯名竟還有模仿蕭友梅的，這不能不說是那部準“音樂家”張若谷尊爲“不能作普通樂理書看”(見張若谷所著音樂ABC)的樂學通論的餘孽。硬把西洋的東西譯成中國固有的名稱，既是不必要，也是愚笨的舉動。把 Chamber Music 譯作“房中樂”把 Clarinet 譯作“洋××”，那麼 Soprano 就可以照樣譯作“青衣”或者“洋花旦”——至少 Prima donna 可以這樣譯——Bass 可以譯作“洋大面”等了，看官，這麼譯法你不會覺得肉麻麼？創用這些的，固然是笨伯，仿用着的也不能不算是庸人。

這一年裏出版的音樂書，據我知道只有，

廣寒宮 錢君匋作曲，開明書店。

口琴名曲集，錢君匋編，神州國光社。

孩子們的甜歌錢君匋，陳嘯空著光華書局。

兒歌集(?)，胡周淑安作曲(慈善協會?)。

音樂的基礎知識，朱蘇典編，中華書局；

北新小學音樂教本四冊，邱望湘，沈秉廉合編，北新書局。

等等數書，真是寥落得可以。

五

最後，我們就不得不提到音樂演奏會，這自然只以上海一處而論。據我曉得的有兩個，一個是滬江大學開的，一個是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的。現在姑且把後一個的節目抄在下面。

名目：上海美專二十週紀念遊藝大會音樂會

日期：十一月十二三日晚八時

地址：貴州路陳英士紀念堂

節目：

第一部

鋼琴聯奏：Rosy Fingers.....Wachs

曾淑謹女士 陳光楣君

獨唱：Good Bye.....Tosti

斯義桂君

凡亞林奏：ROMance op. 50.....Beethoven

姚鏡澄君

- 鋼琴獨奏: Invitation to the Dance.....Weber
 丁善德君
- 獨唱: 玫瑰三願:.....黃自
 Where the Bee s^ucks Sullivan
 常文彬女士
- 凡亞林獨奏:Waltz..... Brahms
 胡靜翔君
- 混聲合唱: The Old Refrain.....Kreislel
 Bella Nopoli Bascouitz
 上海雅樂社

第二部

- 獨唱: Somewhere a Voice is Calling.....
 吳信德女士
- 鋼琴獨奏: Impromptu.....Reinbold
 陳光楣君
- 鋼琴凡亞林合奏(?): Sonata in T (?)Mozart
 戴粹倫君
- 鋼琴獨奏: Fantasie in c minor.....Mozart

易開基君

獨唱:Trade Winds.....Keel

應尙能君

Slipmateso Mine

來羅獨奏: Mr. S. Shevtzoff

鋼琴獨奏: Mr. B. Zakharoff

凡亞林獨奏: Mr. A. Foa

三重奏: Foa, Shevtzoff Zakharoff

這張節目單看起來很是不完備，樂器也太簡單了，樂曲也嫌淺近一點，稱作音樂會似乎還誇張一點吧。聽說該校同時尚有中國音樂方面的獨立的音樂會，內中有京劇等等，這未免太滑稽了。是一個專門學校呢，這一點身份應當顧到的呀！

中國音樂界，如果長此以往是沒有救藥的了。一九三三年已經到來，我希望中國樂人們能夠鼓着勇氣，出來做一些較有出息的事情，為音樂界爭一點光榮。

後

這一本小冊子，在到達親愛的讀者之前的時候，雖然或者多少已嫌遲了，然而供讀者作一番沈痛的回憶，或者更感覺一番酸楚與興奮也未可知。

過去的一年，是世界經濟恐慌，政治危機，思想不安，更加深刻的一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恐慌的激化，失業者的增加，政治的動搖，法西運動的激進，革命的危機，文化上的頹廢，所謂“危機神學”之發展，同時蘇聯的工業化之厲進，急

進運動的擴張，左傾思想與左傾文學的發展……都表現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之破綻。

而過去的一年又是中國民族受難最烈之年，日本在其他帝國主義者各種程度的諒解下屠殺中國民族最烈之年。上海的屠殺揭開1932年之幕，而榆關的攻擊結束1932年。而同時在1932年日曆的每一頁上都濺滿了中國民族爭自由獨立的血花。

從國際到中國的事實，都告訴我們的出路，只有澈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從民族革命到帝國主義制度之絕滅，是我中國民族唯一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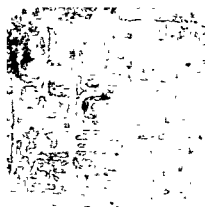
這一年來各方面的清算，就是希望能使我們親愛的讀者更驚心動魄于自己的命運，因此更凜然于自己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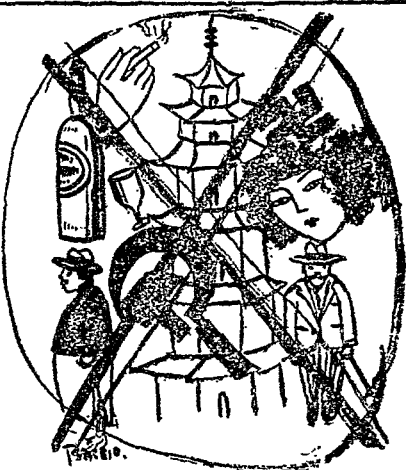
我們為感謝本誌的讀者，除了讀書雜誌本身力求充實與精采而外，并決定臨時發行別冊附錄，對於定戶一律贈送，而也以極低廉的代價，致送于一般的讀者之前。這一本，就是履行我們預約的第一聲。本來可以與第一期讀書雜誌同時印出的，然而因為等待幾篇預約的稿子耽擱了幾天；後

來又因為趕印其他的書，遷延到現在。同時使我們覺得非常惋惜者，便是張栗原先生的一篇一年來之世界哲學，胡秋原先生的國際文藝運動的一年間與朱雲影先生的一年來的中國創作界，因為他們的忙碌，不能久待，遂付缺如；而嚴靈峯先生的一篇一年來之中國思想界，錢君匋先生的一年來的中國畫壇，也因為許多原因而割愛。但雖然如此，讀者在這裏總可以看出一年來世界及中國的一個縮影罷。

以這小小的禮物，贈送于愛護本誌的讀者之前，作一個紀念。并希望讀者都能在1933年奮發自己的新生，更希望能在1933年的清算中，在世界在中國能有使我們更愉快的事實。

編者，1933年一月末日。





讀 書
與
出 版

THE READING
AND
PUBLISHING

彭芳艸·徐翔穆編

書報介紹與批評中外出版界的消息

請看趣味的，新聞的，批判的，
小品的，豐富的，大眾的——

——連絡讀者，作家，出版家的
讀書與出版半月刊

有中外出版界評論，有中外書報的批評，

有中外書報的介紹，有中外作家的消息，

有中外文化界情報，有諷刺小品短篇詩文。

聽！世界文壇上之交響曲
看！國際著作界之走馬燈

考茨基著

湯啓浩
葉芳譯

實價一元八角

基督教之基礎

研究中國社會
史者不可不讀

考茨基在這一本書中，一方面，成功了以唯物史觀分析一種西方文化根源之企圖，他方面，却證明了唯物的觀點實為研究任何歷史的唯一可靠的研究方法。想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及其意識形態者，不可不讀此偉大的巨著。

上海河南路 神州國光社刊行 第六十號

分店：北平宣內街；廣州財廳前；南京花牌樓

經濟政治批判會編

國際經濟政治年報

倏忽三版

第一輯〔1931年1月—12月〕

插圖三十餘幅

實價一元五角

第一輯內容一般：

第一部分

1931年的國際經濟
國際經濟之回顧與展望
現在世界經濟一般危機之根本問題

第二部分

總論：

1931年的國際政治之鳥瞰

分論：

地中海霸權的爭奪
法帝國主義與反法集團的鬥爭
歐美帝國主義間的衝突
日帝國主義遠東爭霸權
蘇俄對對外關係
弱小民族反帝革命高潮
軍備擴張與軍縮會議

附錄

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經濟網
法意海協定大綱
德奧經濟同盟協定
胡佛緩債宣言
胡佛聯佛爾共同宣言
國聯處置東北事件之決議案
中、日、英、美、俄對東北事件之外交公文
第三國際為日本進攻中國告世界勞動者宣言
李維洛夫出席歐聯大會演說
法俄不侵犯協定
司汀森對拉丁美洲態度宣言
溫甘協定
麥唐納對耶露撒冷態度宣言

第二輯（1932年1月—12月）明年出版！
更光怪陸離的局面！更奮發豐富的內容！

上海河南路 神州國光社刊行 第一三六號

分發行所：北平宣內大街；廣州財廳前；南京花牌樓；濟南廣埠路

分發行所

濟南
北平
廣州
宣
內
大
南
京
花
財
牌
樓
前
街
路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一九三二年的世界與中國

印 翻 許 不 權 作 著 有

印 刷 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發 行 者

會 獻 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編 者
讀 書 雜 誌 社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兩加郵費)

